

# 新视界

## NEW VISION

### 学术讲堂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 ..... P1

### 学术论文

美欧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 P11

### 国关人物

唐世平 ..... P25

### 海外南开人

一碗给出国党的鸡杂汤 ..... P50

### 毕业生特辑

..... P60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 编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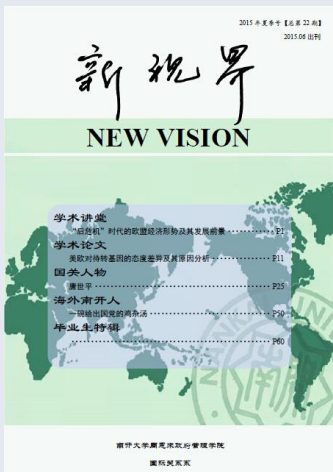
六月的校园，是离别的月份。校园里弥漫着即将迈入社会的丝丝兴奋，空气中也游荡着缕缕有离别的感伤。这一季的《新视界》对于我，想说的话太多太多。毕业季，一个特殊的季节，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从大二进入系刊，到大四即将离别。惊讶的发现其实，时间才只有短短两年，我却感觉与它相处甚久。仿佛还能感受青春洋溢的美好……

而新一期的《新视界》正是凝聚着编者乃至所有国关师生热情与青春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我们可以看到“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自转基因技术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议，针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安全问题的探讨；有卡佳·德罗兹多娃和库尔特·泰勒·巴茨从另一种方向来证明，一些从信息理论中得到的非常简单的定量方法，是如何能够巩固比较案例研究的；还有老主编海哥带来的“一碗给出国党的鸡杂汤”，给出国党的学弟学妹们讲述出国的那点事……细心品读，《新视界》一如既往地呈现着无限的精彩：“英才飞扬”中碰撞思想的火花；院系活动中的校外短讯；以及毕业生特辑给南开学子们带来的最新动向；“读编往来”倾听读者的心声，了解读者的需求，各个栏目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回想起来，我是留恋系刊的。大学一半时光都留给了它。在系刊中学到很多很多，编辑的能力，访谈与约稿的小技能等等，这些是说的出的，还有更多说不出的感情。在系刊，有老师的关怀，有学长学姐的帮助，以及靠谱的学弟学妹们和一群忠实的读者。

时光总是易把人来抛，快到让人还未来得及留恋，细细品味。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趣处吧。新的时刻即将来临，希望各位对系刊的热情不减，继续为系刊的发展和完善添砖加瓦，丰富和创新，不断探索《新视界》的“新视野”，与君共勉。

刘芮宁  
2015年6月雨中



## 新视界

###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主办



2015 年夏季号  
【总第 22 期】  
2015.06 出刊

主编：刘芮宁

副主编：刘 志

本期执行主编：宁鹏举

编辑部成员：

丁敏潇 郭 超 胡阳阳  
江昊宇 姜忆楠 李安琪  
李冰莹 李 萌 李天翼  
李 漩 李志宇 刘 志  
马 刚 宁鹏举 裴 瑶  
彭宁楠 宋一宁 唐铭兴  
杨 雪 杨至远 姚丽丽  
赵姝婧 赵天畅

实习生：

许译丹

封面设计：宁鹏举 刘芮宁

# 目录

编者的话 .....(I)

## 学术讲堂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 .....江时学(1)

## 学术论文

美欧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徐振伟(11)

## 时事观察

红场阅兵：历史与现在 .....马 刚(23)

## 国关人物

唐世平 .....(25)

## 他山之石

减少不确定性：适应比较案例研究的信息分析  
.....卡佳·德罗兹多娃 库尔特·泰勒·巴茨(35)

## 海外南开人

一碗给出国党的鸡杂汤 .....吕 海(50)

## 英采飞扬

联合国是否未能实现其宗旨？以当代乌克兰为例 .....谷天一(53)

# 目录

## 毕业生特辑

- 万象南开,百年一幻 .....(60)
- 院长寄语 .....(61)
- 毕业感言 .....(62)
- 国际关系系 2015 届部分毕业生毕业去向 .....(63)
- 新视界人物纪念 .....(65)

## 新书架(二) .....(68)

## 院系活动

- 学术交流 .....(71)
- 师生活动 .....(76)
- 校外短讯 .....(77)

## 国际关系科研简报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81)
-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85)
-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93)

## 读编往来 .....(98)

##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101)

## 征稿启事 .....(107)

###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2010年6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组、新闻组和网宣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

**【编者按】**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曾说过，欧洲债务危机是“欧盟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是一场金融危机、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同时也是信心的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界定债务危机？这一危机是否得到了解决？欧盟经济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态势？其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江时学作出了他的判断……

主讲：江时学

时间：2015年4月3日

地点：南开大学范孙楼

**主讲人简介：**江时学，1997年12月至2008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美研究系主任；2008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主任，兼任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和拉丁美洲。

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

### （一）债务危机的定义

何谓债务危机？据我所知，国际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有人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债务危机的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主权信用评级是否被连续、大幅度调降；二是与主权债务相关的信用违约互换（CDS）的息差是否大幅度上升；三是新发债券收益率是否显著上升。

这一定义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将其作为判断的标准似乎有难度。例如，何谓“连续”？何谓“大幅度”？何谓“显

著”？

我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陷入债务危机，主要看它有没有提出纾困（bail-out）的要求。在严格意义上，一个债务国只有在提出了纾困的要求后，才能被视为陷入了债务危机。

迄今为止，只有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提出了纾困的要求。意大利、西班牙虽然面临着多方面的经济困难，但它们都没有提出纾困要求，因此不能被视为陷入了债务危机。

众所周知，美国和日本的债务负担更加沉重，但也没有提出纾困要求，因此这两个国家不能被看作陷入了债务危机。

2011年下半年，意大利经济形势不断

恶化，许多媒体认为，贝卢斯科尼领导无方，将意大利送入了债务危机泥潭。但贝卢斯科尼却说：“我们意大利餐馆人满为患，一派兴旺发达，哪有什么债务危机？”

由此可见，贝卢斯科尼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陷入债务危机的标准是餐馆里的人多不多。这一判断似乎言之有理。在经济危机中，工资水平下降，人们当然要厉行节约，不去餐馆享乐了。我认为，意大利债务负担确实很重，经济形势也不好，但不能说意大利陷入了债务危机，因为它并未提出纾困的要求。

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 20%，青年失业率过 50%，一些储蓄银行被政府接管，但我们不能据此而断言西班牙陷入了债务危机，因为它没有提出“纾困”的要求，没有喊“救命”。

如何判断债务危机得到解决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无法得到公认的关于“解决债务危机”的定义。2013 年初，我在布鲁塞尔一智库做访问学者时，曾问过许多经济学家和欧盟官员这一问题：欧洲债务危机得到解决了吗？我得到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较多的人说：“最危急的时刻过去了。”

债务危机的解决是否意味着：GDP 摆脱负增长，债务和财政赤字下降到 60% 和 3% 以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 6% 或 7% 以下，重返国际资本市场，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的“三驾马车”停止纾困，政府大楼门前没有示威游行，国际上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莫迪和惠誉）不再将希腊等国的国债降级，国际媒体不再报道债务危机，等等。判断

债务危机是否得到解决，是符合所有上述条件，还是符合其中一个条件？

无论如何，自 2013 年下半年起，或是在进入 2014 年后，欧洲债务危机可被视为得到基本解决。例如，曾接受“三驾马车”纾困的希腊和葡萄牙终于摆脱了负增长，爱尔兰经济已从 2013 年的 0.2% 上升到 3.6%。爱尔兰和葡萄牙甚至已退出了纾困，即不再需要外部救助。

在讨论欧洲债务危机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危机的走势有无转折点？转折点在哪里？何时出现的？

我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形势的转折点出现在 2012 年 8 月 2 日。是日，欧洲央行宣布，必要时将实施“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此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都大幅度下降，债务危机形势明显好转。这和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很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港元受到“金融炒家”的冲击。中国政府公开表示，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港元。这一震慑作用十分有效。

其实，在欧洲央行正式宣布 OMT 之前一周，即 2012 年 7 月 26 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就已经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说，欧洲央行将为解决欧洲债务危机而“豁出去”（Whatever it takes）。这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三个字”。有人认为，这三个字使欧洲债务危机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从而“拯救了欧洲货币联盟”。

直到今天，OMT 从未被投入使用，因此，有人认为，OMT 是欧洲央行有史以来最大的“吓唬人”（bluff），因为“在 OMT 要被使用的时候，实际上就没有必要使用



了”(By the time the OMT would have to be used, it wouldn't have to be used)。换言之,在欧洲债务危机形势极为严峻之时,“吓唬人”居然能力挽狂澜,因为它发挥了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

如果说 OMT 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那为什么欧洲央行迟至 2012 年 8 月 2 日才宣布?这或许与德国的立场有关。2013 年初我在访问欧洲央行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时,也曾听那里的经济学家说,因为德国同意推出 OMT,所以德拉吉才能说出“豁出去”三个字。

且不论欧洲央行宣布 OMT 与德国的立场有多大关系,可以断言的是,作为欧盟和欧元区的“领头羊”,德国在债务危机爆发后的立场和态度始终受到媒体、政界和国际金融界的关注。一些分析人士曾指出,2009 年 10 月希腊新政府修正前政府的有关经济数据后出现的金融动荡,如能得到欧盟和欧洲央行的及时应对,希腊形势不会恶化到诱发欧洲债务危机的地步。而希腊的问题当时之所以未能引起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持消极和观望的立场。德国非常不愿意看到“道德风险”的出现,认为希腊对其经济问题必须“咎由自取”。

那么后来德国的立场为什么会改变?除了债务危机形势不断恶化以外,可能美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有人认为,希腊是美国放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即美国试图通过高盛公司为希腊做假账等方式来制造债务危机,使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搞垮欧元和欧元区经济。这一观点被称作“阴谋论”。我

在因特网上看到的报道与“阴谋论”截然相反。据报道,在德国因考虑要不要救助希腊而丧失救助的良机时,美国曾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敦促德国和欧盟采取果断措施,以避免希腊问题进一步恶化。此外,美国财长盖特纳曾无数次致电欧盟和欧洲央行的主要官员,为其解决欧洲债务危机提出建议。毫无疑问,欧元区或欧盟的崩溃对美国来说并非福音。

虽然欧洲央行宣布了 OMT,而且收效显著,但在德国,反对欧洲央行出手救助希腊的声音时有所闻。德国议会议员 Peter Gauweiler 和 3 个企业家(Heinrich Weiss、Patrick Adenauer、Juergen Heraeus)甚至向德国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诉讼,认为 OMT 违反了《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第 123 条。他们的诉讼代理人是莱比锡大学法学教授 Christoph Degenhart。2013 年 6 月 11 日至 12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举行了 OMT 听证会。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在听证会上指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实施的包括 OMT 在内的一系列货币政策,违反了欧盟的相关法律及宪法的民主原则。2014 年 1 月 14 日,德国宪法法院作出裁决:OMT 超出了欧洲央行的权限,而且违反了欧盟的有关法律规定,即欧洲央行不得从事货币融资(monetary financing)。该法院还要求欧洲法院为 OMT 附加条件。

但在 2015 年 1 月 15 日,欧洲法院佐审官(Advocate General) Cruz Villalon 就德国公民 Peter Gauweiler 等人诉德国联邦政府案(Case C-62/14)出具的法律意见认为,OMT 原则上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

不冲突，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欧洲法院的这一意见为欧洲央行推出量化宽松（QE）提供了法律依据。

## （二）欧盟经济的“日本化”

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却不尽人意。在一定程度上，欧盟经济已呈现出“日本化”（Japanization）的特征。

首先，欧盟经济复苏乏力。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欧盟经济复苏乏力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欧元区在2015年陷入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为30%，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40%。根据欧洲统计局2015年3月6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9%，欧盟为1.3%。

其次，债务率居高不下。根据欧洲统计局2015年1月22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第四季度末，欧元区的债务率为92.1%（低于第二季度末的92.7%，但高于2013年第三季度的91.1%），欧盟为86.6%（低于第二季度的87.0%，但高于2013年第三季度85.3%）。最高的三个国家是希腊（176%）、意大利（131.8%）和葡萄牙（131.4%），最低的两个国家是保加利亚（23.6%）、卢森堡（22.9%）和爱沙尼亚（10.5%）。

再次，通货紧缩业已形成。根据欧洲统计局2015年1月16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12月欧元区的年通货膨胀率为-0.2%（为200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盟

为-0.1%，低于2013年11月的0.3%和12月的1.0%。

最近，欧洲经济学家较为关心通货紧缩，认为这个问题已制约了经济复苏，因此欧洲央行应该有所作为。

通俗地说，通货紧缩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下降。关于通货紧缩的利弊，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他不仅反对通货膨胀，而且还反对通货紧缩，因为通货紧缩也是有害的。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持久的通货紧缩对现代经济来说是极具破坏力的，应该被有力地制止。”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在担任旧金山联储前主席时曾说过：“如果通货紧缩继续恶化，我们会发现我们处于一种不断恶化漩涡中。在这一漩涡中，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下跌，经济活动进一步衰退。”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题为《不要担忧通货紧缩》（“Don't Worry About Deflation,” 1998）的文章中却写道：“通货紧缩如同一个人的体重不够，是一个相对而言容易得到解决的问题，而通货膨胀则较难得到解决。”《彭博商业周刊》编辑克里斯·法雷尔（Chris Farrell）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地评价通货紧缩。他说：“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害怕通货紧缩？这取决于价格为什么下跌。在一个重债国家，坏的通货紧缩来自‘需求冲击’……但通货紧缩并非总是坏的。温和的通货紧缩（mild deflation）有时意味着经济充满活力，具有创造性，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好的通货紧缩来自积极的供给冲击，如一系列重要的创新推动成本和价

格下跌,同时创造出新的市场和机遇。”这一观点不难理解。技术进步使电脑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这样的价格下跌可被视为“良性”,无疑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通货紧缩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它不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打击就业,加重债务负担(甚至可能会增加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加剧经济萧条。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欧盟经济呈现出“日本化”的特征,但它并非一无是处。例如,欧盟出口贸易依然强劲有力。2015年1月,欧盟的经常项目顺差高达158亿欧元(2014年1月为64亿欧元)。欧洲的一些智库认为,如果石油价格继续下跌,欧盟有望在2016年成为经常项目顺差最大的经济体。毫无疑问,欧盟能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与德国强大的出口能力有关。

在讨论当前欧盟经济形势时,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货紧缩的根源。通货紧缩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因此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原因是债务危机的后遗症。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都实施了财政紧缩。“勒紧裤腰带”不仅打击了投资,而且还损害了经济活力,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减少了许多人的收入,从而削弱了消费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货币政策不当。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出现通货紧缩的原因肯定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出现问题。许多人认为,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较多地考虑了德国的利益,而德国总是希望保持价格稳定,因此,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就是德国的货币政策。

在欧洲债务危机形势极为严峻的2011年,欧洲央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听从德国提出加息的要求。这与当时欧盟经济的形势是背道而驰的。当时,美国和英国为刺激经济而奉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德国如此惧怕通货膨胀?这与心理因素有关。众所周知,1921年至1924年,德国遇到过恶性通货膨胀。当时德国邮票的面值高达50亿马克。1922年6月,德国的生活费指数为41,半年后却上升到685,增长了约16倍。可以想象,这一可怕的经历在德国人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因此,遏制通货膨胀压力是德国人极为关心的货币政策目标。

第三个原因是石油价格下跌。欧盟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很强,因此,石油价格下跌后,进口费用减少,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第四个原因是欧元汇率。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的币值依然较为坚挺,使欧元区经济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量化宽松政策(QE)的冲击。欧元币值的坚挺对德国的影响似乎不大,而竞争力不强的希腊等国则受害匪浅。受单一货币政策的制约,这些国家无法使欧元贬值,因此只能通过压低本国工资水平等方式来提升竞争力。而工资水平降低是不利于消费的,也不利于提升价格。

在分析欧盟的通货紧缩时,有人提到了中国。例如,克里斯·斯特里特(Chris W. Street)认为,中国是欧元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中国的低通货膨胀率加剧了欧元区的通货紧缩。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在 2015 年 3 月 1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韩国 KBS 记者向李克强总理提问:“中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是通货紧缩的输出国,对此您怎么看?”李克强总理答道:“国际上对这个提法有多种解释,比较一致的是一个国家的物价综合水平持续出现负增长,我们国家 CPI 或者说物价总水平一月份是正增长,二月份还比一月份同比更高,所以不能说中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虽然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比较低,但并不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缩,你说叫‘输出者’,实际上我们是‘被通缩’。我给你举个例子,去年,我们进口了 3.1 亿吨原油、9.3 亿吨铁矿石,量是增的,没有跌,但是价格下来了,主要是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对这种‘被通缩’的问题,我们有应对,也有进一步的准备。当然,我们更希望世界经济能走出低迷,实现复苏。”李克强总理的回答表明,将欧盟的通货紧缩归咎于中国是毫无道理的。

### (三) 从负利率政策到 QE

面对欧洲债务危机留下的众多后遗症,欧洲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利率政策和 QE。

2014 年 6 月 5 日,欧洲央行把基础融资率降到 0.15%, 边际放债率降到 0.4%, 存款率降到 0.1%; 9 月 4 日又再次降低到 0.05%、0.30% 和 -0.20%。

欧洲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动机是鼓励商业银行放贷,以增加投资。因此,负利率对个人储蓄者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有些商业银行却对企业的大额存款也实施

负利率政策。据报道,在德国,公司的存款如果超过 50 万欧元,不仅不会从银行得到利息收入,反而会向其支付一笔费用。

应该指出的是,一些德国人既反对 OMT, 也反对负利率政策,因为负利率政策违反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即确保价格稳定)。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在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央行中,欧洲央行开创了负利率政策的先例。该报告认为,美国和日本等中央银行还没有实施过负利率政策,而瑞典和丹麦实施负利率政策的成效似乎不是非常明显。有趣的是,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曾使一些银行的电脑系统陷入了困境,因为这一系统最初没有将记账单位设计成正数和负数两种输入法。

与负利率政策相比, QE 的力度似乎更大,因此更为引人注目。2015 年 1 月 22 日,欧洲央行宣布,决定从 3 月开始实施“扩大化的资产购买计划”(an expanded asset purchase program), 每月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总额为 600 亿欧元的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和欧洲机构发行的、以欧元计值、具有投资等级的债券,总额达 1.1 万亿,直至 2016 年 9 月。

“扩大化的资产购买计划”就是 QE。关于这一计划将在什么时候会结束,欧洲央行网站上的原文是这样表述的:

They are intended to be carried out until end-September 2016 and will in any case be conducted until we see a sustained adjustment in the path of infla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aim of achieving inflation rates below, but close to, 2% over

the medium term.

这一段文字中关于 QE 何时结束的表述似乎有 2 种理解：一是在 2016 年 9 月结束，不论通货膨胀率是否回升到 2%；二是在通货膨胀率回升到 2% 后结束。第二种理解蕴含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在 2016 年 9 月通货膨胀率并未回升到 2%，那么，QE 将不会停止。

2015 年 3 月 4 日，德拉吉签发了在 3 月 9 日正式启动 QE 的文件（DECISION (EU) 2015/[XX]）。

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欧洲央行的 QE 姗姗来迟？许多人认为，欧洲央行早该实施 QE 了。

2011 年 12 月 21 日，欧洲央行执委会委员、意大利人洛伦佐·比尼·斯马吉（Lorenzo Bini Smaghi）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时说：“英国和美国的央行之所以实施 QE 政策，是因为它们认为存在着通货紧缩的风险，而欧洲央行则认为没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条件发生变化，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流动性，那么，我认为欧洲央行会实施为欧元区量身定做的 QE 政策。”在这以前，德拉吉也说：“我们不会以毁掉欧洲央行的可信度的代价来达到（实施 QE 的）目的。”

我认为，欧洲央行之所以迟至 2015 年 1 月才决定实施姗姗来迟的 QE，或许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欧盟和欧元区出现了实实在在的通货紧缩；二是德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变化；三是 2015 年 1 月 15 日欧洲法院法官对 OMT 是否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从而为 QE 的出台创造了法律条件。

OMT 与 QE 有何异同？首先，它们的宗旨不同。OMT 的目的是降低国债收益率，即降低借贷成本；而 QE 的主要目的是应对通货紧缩。其次，OMT 仅仅是购买“有问题”国家的 3 年期以内的国债；而 QE 则面向所有欧元区成员国（包括德国），国债的期限在 3 年以上，具体数额取决于它在 ECB 中的份额。第三，OMT 需要冲销，因而不会产生流动性，而 QE 则不需要冲销。

欧洲央行的 QE 政策能不能成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在欧元区，信贷的供给取决于银行，而非金融市场。言下之意是，欧洲央行的 QE 不会取得明显的成效。

还有人认为，QE 会压低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价格，从而鼓励这些国家继续举债。此外，欧盟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而是要“多管齐下”，继续推进改革。

欧洲央行的 QE 政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2014 年的双边贸易额高达 6151 亿美元，即每天的贸易额高达 17 亿美元。因此，欧盟的 QE 必然会对中国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欧洲央行希望 QE 政策能够达到三个目标：降低利率、提升通货膨胀预期和降低欧元汇率。欧元的贬值使人民币“被”升值。这似乎是不利于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但是，QE 有助于欧盟经济复苏，而欧盟经济复苏是有利于扩大中国对欧盟出口的。此外，欧元贬值后，中国在欧盟的投资以及赴欧洲旅游或求学的中国人会受益匪浅。

如前所述，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首先关注的是确保价格稳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后危机”时代，欧洲央行要不要提高 2% 这一通货膨胀目标？有人认为，多年前确定的 2% 这一目标过低，现在已难以适应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欧盟经济的现实。在他们看来，适当提供通货膨胀率，有利于刺激经济，有利于增加就业，有利于减轻债务负担。但也有人反对，突破 2% 这一目标会加大通货膨胀风险，会强化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因此最终是不利于欧盟经济增长的。

#### （四）欧盟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如何判断“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欧盟经济是一蹶不振还是凤凰涅槃？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基肖·马博巴尼认为，欧洲对于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正在变得愈益无足轻重，因为世界在快速变化，而欧洲却在沉沦。欧洲过于沉溺于调整内部的安排，这无异于在沉落中的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重新摆放椅子。

皮尤的民意测验问道：“你认为你的子女的生活会好于上一代吗？”各国给出肯定回答大不相同：德国人为 28%，英国人 17%，意大利人 14%，法国人 9%，而中国是 82%。由此可见，欧洲人对其前途较为悲观，中国人则充满了乐观。为什么反差会那么大？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和心理上的“后遗症”不容低估。

虽然当前欧盟经济呈现出“日本化”的特征，但我们不必为欧盟经济的长期发

展趋势悲观。

第一，“容克计划”的实施有助于加快欧盟经济复苏。2014 年 11 月 26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为刺激经济复苏，欧盟将实施一个总额为 3150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媒体称之为“容克计划”，Juncker Plan）。2015 年 3 月 10 日，欧盟财长会议批准了这一计划。

第二，“后危机”时期欧洲人的消费能力将快速提高。欧盟经济已走上复苏之路，只是复苏乏力。经济复苏为扩大消费创造了机遇。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复苏和消费会相得益彰。事实上，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消费对复苏的促进作用业已显现。

第三，欧盟成员国的许多企业在国际上拥有很强的竞争力。例如，在 Fortune 500 的前 100 大企业中，欧盟有 33 家。这些企业都是跨国公司，业务范围超出了欧洲。我们不能说欧洲债务危机没有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一影响似乎是有限的。在“后危机”时期，这些大企业将为欧盟经济复苏作出更大的贡献。

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3-2014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排名前 20 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德国、瑞典、荷兰、英国、丹麦、奥地利和比利时榜上有名。

第四，欧盟拥有很好的投资环境，是外国投资者青睐的投资场所。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潜力大，科技发达，劳动力素质好，政局稳定，政策的连贯性强，法制体系健全，腐败行为较少。这些特点有利于欧盟吸引外资。

第五,欧洲模式并未失效。欧洲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social market economy)。欧盟委员会主管就业、社会事务和包容的官员(EU Commissioner responsible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 László Andor 说,该模式的特点是介乎于自由放任与计划经济之间,是一种类似“杂交”(hybrid)、“鸡尾酒”(cocktail)的模式。该模式把社会和市场结合到一起,很好地解决了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六,德国经济充满活力。2014年,欧盟28国的GDP总量为13.9万亿欧元,欧元区19国为10.1万亿欧元,德国为2.9万亿欧元,占欧盟的21%和欧元区的29%。这意味着,只要德国经济保持其活力,欧盟经济和欧元区就充满希望。近几年形势表明,德国经济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灿烂的。

第七,欧洲一体化进程将继续推进。许多人认为,欧洲一体化具有“危机倒逼”(crisis-driven)的特点。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就在人们担忧希腊会不会退出欧元区、欧元区会不会崩溃的时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先后加入了欧元区。2015年2月18日,欧盟委员会同意构建“资本市场联盟”(Capital Markets Union)。2月25日,欧盟委员会同意构建“能源联盟”(energy union)。这两个联盟在建成后对欧盟经济的贡献将是十分巨大的。

第八,“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有利于促进未来欧盟经济的发展。TTIP问世后,欧盟和美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将大幅度上升。有人认为,TTIP将使欧盟经济和美国经济的GDP增长率提高0.5

个百分点。

第九,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有利于扩大欧盟的出口,有利于扩大欧盟的对外投资,当然也有利于新兴经济体扩大对欧盟的投资和出口。

应该指出的是,欧盟经济的发展前景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为重要:一是债务危机的后遗症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失;二是人口老龄化日益显著,迫使欧盟必须将本来可以投入生产领域的资金用于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三是欧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四是能源需求严重依赖外部。

综上所述,欧盟经济的发展前景不容悲观。

### (五) 希腊是否会退出欧元区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有人说,希腊曾经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但现在可能会成为西方文明的坟墓。这一说法言过其实,因为一个国家的衰落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掘墓人”。但是,国际上担忧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人委实为数不少。

在2015年1月25日的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领导人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获胜。该联盟成立于2004年1月,由十余个左翼小党组成,主要是当年希共国内派成员。2012年6月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反对党。2013年召开首届党大会,正式完成从竞选联盟到政党的转变。齐普拉斯在竞选时表示,他将与为希腊提供纾困的“三驾马车”重新谈判纾困的条件,即希腊不应该为获得外部资金的救助而“勒紧裤腰带”。因此,

许多人担心，如果“三驾马车”与希腊的谈判无果而终，希腊可能会退出欧元区。

我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不大。齐普拉斯和希腊人民深知，退出欧元区并非解决希腊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

希腊经济会因这一过激行为而陷入崩溃。

“三驾马车”与希腊谈判的过程将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相互作出让步。

[整理：胡阳阳、江昊宇、宁鹏举、赵姝婧]

[责任编辑：赵姝婧]

[校对编辑：杨 雪]

### …………… 2015 年 4 月中日首脑会谈 ……………

2015 年 4 月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会议时，应日本方面的要求，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正式会谈，此次中日首脑会谈主要涉及改善中日关系、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以及近期比较热门的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投行等问题。

首先，中日两国首脑对于共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达成了重要共识，习近平和安倍晋三都表示希望加强对话沟通，积极发展双边关系，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已经取得的成果双方都表示高度认可，并同意在此基础上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与安定做出贡献。

其次，在中日历史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了认清历史事实的重要性，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历史，而日方也表示愿意继续坚持包括“村山谈话”在内以往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并表示日方“在反省过去大战的基础上，作为和平国家发展至今，这种姿态不会改变。”

最后，关于东海和钓鱼岛问题，双方都同意在和平、合作、友好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海上紧急联络机制；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问题上，日方表示已经认识到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亚洲地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愿意同中方探讨有关亚投行的问题。

资料来源：冀勇：《日本各界积极评价中日首脑会谈》，《法制日报》，2015 年 4 月 28 日，第 9 版。

[整理：唐铭兴、李天翼]

[责任编辑：唐铭兴]



# 美欧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徐振伟\*

**摘要:** 自转基因技术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议, 针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安全问题, 各方相持不下。而这种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欧这两个发达国家及地区对待转基因的态度截然相反甚至激烈对峙。本文从地理、气候等先天因素和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其它因素来具体分析这两者态度差异的原因以及美欧差异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 美国; 欧洲; 转基因; 差异

三十一年前的五月, 将外源基因导入细胞以获得某些生物原本不具有的新性状的技术出现了。这在当时或许并不轰动, 但该技术的最初研究者可能无法想象他们的这一举动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困惑与争论。随着实验的深入、科研发展、技术的应用, 人们发现这项技术在科学层面上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 在伦理上有一些争议, 这项技术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不断的争议, 在今天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称——转基因。

当转基因的产品开始越来越堂而皇之地进入人类的生活, 尤其是在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食物问题上, 转基因似乎越来越醒目, 又似乎越来越模糊。与之俱来的是整个世界对于转基因激烈的争议。于是, 人们困惑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争吵不休? 谁能给我明确的答案?

世界其它地区的困惑与争论或许部分源自于美欧两地对于转基因态度的分歧, 而这两者正是在科学领域最具话语权的代表, 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眼光总是会向西看, 然而当他们发现西方众神的神通都不能辨明转基因此物是仙是妖, 他们怎么会不困惑?

## 一、转基因在美欧的不同境遇

### (一) 转基因在美国

最初的转基因技术就是在美国出现的, 并且, 美国一直保持着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在 1978 年, 转基因的设想大致成熟, 到 1983 年, 这一技术正式出现。到 2013 年, 美国已有 6900 万公顷的农田上种植了转基因作物, 占美国可耕地面积的 43%, 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甜菜、苜蓿、番木瓜和南瓜等。美国 93% 的大豆、93% 的棉花、86% 的玉米和 90% 的油菜系转基因品种。此外, 80% 的包装食品都使用转基因作物作为原料。可以说, 转基因在美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甚至已经形成了专门的转基因产业。在转基因产品与技术的研制、应用与输出上, 美国也占据着优势地位。近几年, 仅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的生物技术种子及具有生物技术特性的种子(包括给其它公司颁发许可证的)占其世界范围内专供基因工程的种子市场的 87%。<sup>①</sup>转基因在商业上的发展已历经二十多年,

\* 徐振伟,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非传统安全、粮食安全、转基因问题。

① 张彩霞:《跨国公司农业生物技术垄断、影响及启示》,《生态经济》2010 年第 3 期, 第 80 页。

总体来说,美国联邦政府对待转基因的商业化是不反对的,在很多政策上都表现出较为宽松的倾向。在 1980 年代,随着转基因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美国联邦政府曾专门为转基因的发展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以此来处理相关事务。而经过讨论,该工作小组最终给予白宫的结论并未反对转基因。虽然美国国会没有出台专门针对转基因的法律法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对于转基因的监管。美国的农业部(USDA)可以依据《联邦植物保护法》、《联邦植物害虫法》、《联邦植物检疫法》、《病毒、血清、毒素法》、《联邦肉类管理法》、《家禽产品管理法》等对转基因进行监管,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则可依据《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灭鼠剂法》、《有毒物质控制法》、《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进行监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是基于 1992 年颁布的《食物、药物和化妆品法案》。这三个主要的监管部门分管着力于转基因产品上市的不同阶段,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转基因食品上市起主要监管职责,如果转基因产品产生了问题,其可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sup>①</sup>主要起到事后处罚的作用。与之对应的是农业部下属的专业检测机构为待上市的转基因产品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把关,保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此外,美国高度重视转基因的生态风险,所以美国环保局也在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体系之内,主管转基因食品环境监测,<sup>②</sup>三部门依据上述的法规,对转基因实行全面监管。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监管体系并未明确将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区分开来,在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的危害时,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产品受到的监管几乎是一样的,这对于转基因的普及是毫无阻力的。美国在转基因方面奉行“实质等同”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是来自基因改造作物的食物之成分,与人们通常在食物中找到的成分,比如蛋白质、脂肪、油以及碳水化合物,是相同的或大体相似。按照美国生物学家的说法,通过生物技术被导入植物的基因,其所制造的蛋白质与人们数百年来所摄入的蛋白质非常相似,“如果提取抗农达大豆的样本,它所含的经改造的酶与天然存在于植物中的酶实际上是相同的:变化非常微小,因此,在安全性方面来说,受操纵的酶与自然的酶并无显著差异”。<sup>③</sup>

长久以来,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一直压迫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发展,许多国家深受其害却又无可奈何。而转基因农作物在美国同样享受着高额的农业补贴,再借助其发达的农业贸易体系,美国的转基因开始“入侵”它国。这可以说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于转基因的支持,也可以说,美国在转基因方面向全球扩散。

但是美国的州政府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致,个别州的民众和政府反对转基因的声音很大。早在 2002 年,一项由俄勒冈州民众倡议、关于给转基因产品打标签的公投在该州举行,这一最早在美国策划的倡议最终流产,原因在于贴标签的代价过于昂贵。在 2007 年,由于两千多民众的呼吁,加利福尼亚州曾有议员提出议案试图规定在加州销售的转基因

① Mark A. Pollackand, Gregory C. Shaffer, *When Cooperation Fails: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4.

② 陈亚芸:《美国转基因食品立法解析》,《公民与法》2014 年第 2 期,第 6 页。

③ 玛丽-莫尼克·罗宾:《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8 页。

产品必须做标识, 但该议案并未获通过。然而在 2013 年的 6 月, 美国东北部的康涅狄格州却成功通过一项法案, 该法案明确规定在该州的转基因食品必须贴上“基因工程生产产品”的标签, 这也成为美国首个州正式针对转基因的立法。

## (二) 转基因在欧洲

与在美国相比, 转基因在欧洲的发展要坎坷许多。美国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可以说是支持鼓励, 而在欧洲, 多数国家对于转基因的态度极为冷淡甚至是抵制。仅 2009 年, 欧洲农地只有 0.05% 用于种植转基因作物, 少于全球用作转基因种植用地的 1%。<sup>①</sup>转基因在欧洲不得人心, 并导致欧盟专门为转基因出台多个法案, 以限制转基因在欧洲的发展。其中几个主要的法案按时间顺序如下:

1. 欧共体 1990/202 指令: 第一个指令要求对基因工程的封闭使用之前一定要对人体健康、环境做出评估, 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对于可能产生对人体或者环境危害的实验成果, 不允许其进行。<sup>②</sup>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早在 1990 年就对转基因产品颁布了一个指令即《故意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的指令》, 该指令的目的是协调各国之间对向环境中释放和向市场投放转基因生物的法律。指令根据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目的的不同, 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监管方法。该指令在科研开发和市场化两方面做了极为严格的要求, 尤其是在其市场化的过程中, 要满足三个要求: 一是在科研过程中获得环境释放许可; 二是通过环境方面的风险监测; 三是该产品符合欧共体的法规。这一系列规定说明, 欧共体对于转基因产品进入市场有着多么严格的要求。

2. 欧盟 258/97 号条例: 该法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一种新食品, 转基因成分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关键性的原料, 与传统的“自然食物”是不同的。在上市之前, 要进行严格的安全评估, 在上市之后要有强制标示制度, 并且欧盟的标签制度极为严格, 只要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都要进行强制标示, 且标签必须注明特征和改变性质所用的方法, 以使消费者确知食品情况并自愿选择。<sup>③</sup>

3. 欧盟 2001/18 指令: 该指令是对欧共体 1990/202 指令的进一步完善,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肯定预先防范原则在转基因管理方面的地位; 二是强化了对转基因产品的风险监控; 三是对公众意见的听取。

4. 1829/2003 及 1830/2003 号条例: 两个条例力图通过促进各个成员国的合作、交流, 欧盟食品安全局的统一筹划, 共同构建更加严格的、透明的、欧盟统一的转基因生物的审批、

---

① Joseph Zacune, “Combatting Monsanto: Grassroots Resistance to the Corporate Power of Agribusiness in the Era of the Green Economy and A Changing Climate,” March 2012, <http://viacampesina.org/downloads/pdf/en/Monsanto-Publication-EN-Final-Version.pdf>.

② 孙静: 《美欧日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 第 659 页。

③ “Regulation(EC)No. 258/9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January 1997 concerning novel foods and novel food ingredients,” January 1997,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1997R0258:EN: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14 年 12 月 3 日)。

检测、上市标准，并且将转基因饲料纳入到监管体系之内（即使这些饲料并不被用于饲喂生产动物食品的动物）。<sup>①</sup>除了监管体系，欧盟还需要建立“可回溯”的转基因产品控制体系，保证已上市的转基因产品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尽快销毁污染源头，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5. 欧盟 2004/35 指令：这一规定为欧盟内部各国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但各国可以出台监管规格更为严格的法规并在其国内优先适用，也即，这类似于一个兜底的框架，给予欧盟各国自由选择权。

作为一个大的整体，欧盟的态度并不完全代表其内部国家的态度。从上述的欧盟 2004/35 指令可以推知，欧盟内部有的国家其对转基因似乎更无好感。法国即为典型的一例。在法国，法国民众多次向欧盟提交法案试图彻底杜绝转基因玉米在该国土地种植。法国国内反对转基因的斗争席卷了该国的各个社会成员，从环保组织到农民、工会以及消费者联盟以保护当地产品。结果，关于转基因的讨论超越了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促成人们思考专利种子的道德问题。这些担忧包括：小型农业的消失；对传统和有机农业作物及食品的污染风险；因为对自给自足农业的破坏和对传统农业以及食品生产进程的破坏导致的损失会带来贫困与饥饿的问题。自 2008 年至今，包括地球之友法国分部、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在法国创立了反对孟山都联盟并组织大量的活动来揭露和挑战孟山都的宣传攻势。该联盟的另一目的是为了与被孟山都侵害的受众建立沟通对话机制，以帮助保护其基本权利并对该公司施压。<sup>②</sup>在法国的邻国——德国，多次发生反对转基因的游行示威活动，甚至于德国联邦政府通过的转基因方面的法律遭到宪法法院关于其是否违宪的审查。面对 2005 年首次引进种植的转基因玉米，德国环保组织和农民团体发起了提倡非转基因种植的草根运动。来自各个组织的农民发表声明避免使用转基因，到目前为止 200 个非转基因地区已经在德国全境建立起来。同时，尽管欧盟有严格的规定，转基因食品和饲料必须贴标签，但仍然存在以转基因作物为饲料养大的动物售卖的批准漏洞。基于此，德国的食品生产者给他们的肉制品、蛋制品和乳制品都贴上了非转基因标签。在欧盟之外的瑞士，曾通过全民公决，在 5 年内完全禁止转基因相关产品的销售，将转基因“关进笼子”，可称为欧盟之外反转基因最坚决的代表。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民众开始联合起来，2011 年 8 月，来自欧洲各国的 400 位农民、环保人士、消费者和社会活动家联合倡议在奥地利召开了第一届欧洲食物主权会议。会议最终声明呼吁反对转基因的使用和恢复非转基因种子生物多样性。这一声明符合欧洲公众的意见：拒绝转基因是朝着恢复食物生产系统努力的重要一部分，而这一系统保障了欧洲民众的食品健康与安全，同时还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sup>③</sup>

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在转基因方面奉行“预先防范”原则，即在转基因技术研发和商业化应用之前应该充分考虑该技术所蕴含的一系列潜在风险，并将这些风险严格控制在

<sup>①</sup>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Decision of 6 November 2013,”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3th November, 2013, p. 3.

<sup>②</sup> Joseph Zacune, *Combating Monsanto: Grassroots Resistance to the Corporate Power of Agribusiness in the Era of the Green Economy and A Changing Climate*, pp. 7-8.

<sup>③</sup> 《叶瑶：欧洲地区对孟山都的反对》，人民食物主权，2014 年 5 月 24 日，<http://www.shiwuzq.com/food/focus/monsanto2013/20140524/26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 年 12 月 6 日）。

监管范围之内。欧洲民众反对美国的“实质等同”原则，认为这一原则是美国政府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为生物技术公司谋利，“转基因生物的根本问题是，只有孟山都公司会从中获得好处：风险是对别人而言的，而美国的管理机构则放弃了他们评估和监督的角色。食品监管程序的不透明性将这个问题抛给了美国的消费者”。<sup>①</sup>当实质等同原则被证明适用于一种生物或食品，该食品就被看做与传统方法培育出的同类食品同样安全，而不必进行任何其它评估，而当实质等同原则并未被证实，也并不必然意味着食品不安全，也并非必须要求进行深入细致的公共卫生检测。欧洲民众进一步认为，实质等同原则从未真正得到确切界定：一个天然食品及其转基因替代品之间的差异要达到何种程度，才不被认为“实质”足够“等同”，这一点根本未得到确切定义，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严格定义得到过立法机构的认可。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这一概念对工业企业来说很有用，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则难以接受。并且，美国决策者对实质等同原则的依赖也阻碍了对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具有的危害性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sup>②</sup>可以说，从政府到民间，从上层精英到普通民众，欧洲都弥漫着一股反转基因的情绪。

## 二、美欧态度不同的原因分析

### （一）地理、气候等先天因素的差异

目前转基因的发展主要在植物上，其产业推广也主要在农作物方面，其中，又以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四种作物为主。与其它农作物相比，这四种作物更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的种植，这对于土地的平坦、广阔等都有一定要求，而美国正满足这些条件。美国国土广袤，几乎占据了整个北美洲的三分之一，地形多变且复杂，东海岸沿海地区有着海岸平原，在长岛等地也有一些冰川沉积平原。海岸平原的后方是起伏的山麓，延伸到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高1830米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为止，<sup>③</sup>而且由于幅员辽阔和众多其它地理特征，美国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气候类型。在美国，辽阔的平原为大规模种植提供了可能，多样的气候和地形为各种作物的生长提供空间，统一的政府管理可以使得种植与推广规模化、高效化。相比之下，欧洲则体现为一种“小国寡民”的生存状态，欧洲的平原被分割为多个国家，平原面积远远不及美国，虽然农业生产也很高效，但是面积的限制使得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无法像美国那样普及，虽然有“欧盟”的统一管理，可是各国利益毕竟无法统一，战略定位和政策实施也不可能完全相同，缺乏了扩大规模的可能性。所以说，美国在地理上的优势使得转基因的产业化更容易。而从气候上来说，欧洲北部气候寒冷，本就不宜农业发展，转基因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在这里微乎其微，所以其对转基因的漠视也是理所当然。对转基因技术需求的不紧迫导致了他们对于技术本身更加谨慎的态度。

### （二）经济因素的比较

① 玛丽-莫尼克·罗宾：《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47 页。

② 同上，第 184 页。

③ 来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B0.A3.E5.80.99>（最后访问时间：2014 年 12 月 3 日）。

1. 传统农业的影响。美国的传统农业十分强大，但是单兵作战的农民并不多，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农场主手里。这些农场主等同于资本家，利益至上，势力强大，甚至足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其眼中，转基因高产、抗逆等特性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农场主不仅支持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同时还大力推动政府部门对有关转基因的放行。同时，由于美国近年来大力发展生物能源(最典型的是用玉米生产生物乙醇)，对玉米等作物的供需关系有巨大影响，这为转基因的产业化带来了机会。而在欧洲，农业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发展有机农业。鼓励农场实施休耕，减少粮食作物面积，增强林地的生态功能建设，通过推行有机食品生产减少化肥、农药等污染。<sup>①</sup>转基因作为一种环境上“有风险”的作物，在欧洲推广遇到阻力也是情有可原的。

2. 贫富及贫富差异。是谁在消费转基因食品？假如所有的转基因产品都做标识，转基因与非转基因能够明确区分，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富人会先选择非转基因食品。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在价格上会形成差异，这也就意味着最终消费转基因的是穷人。其实转基因得以出现本身就在于其廉价和经济性。而这对于富人是没有吸引力的。

欧美皆富。但总的来说，美国的贫富差异较大，美国的穷人比例比欧洲高，美国的穷人队伍更庞大。在欧洲，由于许多国家（如卢森堡、瑞士等）本就是十分富裕，加上欧洲的超高社会福利，大多数民众在食物消费方面“不差钱”，所以对于尚有争议的转基因食品来说，他们是有实力抵抗的，他们富裕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食用转基因黄金大米来“平衡膳食营养”，也没必要通过转基因高产玉米来降低食物价格，转基因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却要让他们冒着“危险的”风险，这一点自然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而美国内部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斗争，许多福利政策都难以顺利推行。虽然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比欧洲差，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支柱主要是一些高科技企业和一些处在产业链上游的企业，这些企业虽然有极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与美国下层贫民关系不大，而可以大量雇佣下层普通民众的低端产业（例如普通制造业）被大量转移，这导致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大量穷人的存在，使得转基因作物在美国拥有市场基础，再加上部分企业的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在美国已经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3. 产业特点的不同。无论转基因被多少权威人士支持，在普通大众眼中，转基因产品始终要比非转基因的产品低一等。有很多消费者在消费时，对这一点颇为关心。在欧洲部分国家，例如冰岛，由于气候寒冷，农业不发达，但是其不多的农产品往往选择走高端路线，只面向高端消费者。冰岛的羊肉和奶制品一直以来享有盛誉，号称是纯天然食品，但由于一次转基因饲料的传闻，冰岛的羊肉和乳制品市场却大受影响。由此可以想见，类似于冰岛这样的国家，其农产品走贵族路线，一定要保证“血统纯正”，试想一些化肥农药都不敢用的国家对于转基因是避之不及的。

相反，美国的农业以大规模机械化、科技化为特点，不仅养活了本国的人口，还大量

<sup>①</sup> 陈锴：《欧洲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及启示》，《世界农业》2011年第6期，第58页。

出口国外,这样的产业特点决定了美国不可能纠结于一项技术的耸人听闻的危险,更何况转基因食品已经通过了很多把关,并没有证明其具有任何危险性。美国农业政策的长久目标是稳定和提高农场主的收入,平衡市场供求,维持价格的稳定,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并不断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美国农业要考虑的因素和承担的任务要远远多于欧洲,决定了它不可能以“自然”为唯一导向,必须运用科技来帮助农业进步,才能保证其战略目标稳步向前。

### (三)文化和伦理因素的差别

1. 文化背景。作为新大陆的美国和作为旧大陆的欧洲,虽然在文化上是同源的,但历经两百多年,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已经越来越大。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开放性,一种无奈的开放性,因为除了本土的极少数印第安人,现在的美国人几乎都可以说是外来人口。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体现在社会问题上,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在科学上。从这点来说,转基因在美国得以快速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与美国相比,旧大陆上的欧洲给人的印象似乎更加保守,更加严肃和谨慎。在对待转基因问题上,美国人的理论是“无罪推定”,既然不能在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是有害的,那么转基因就是安全的。而欧洲人对转基因危害性的看法则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然不能保证转基因的安全性,而这一问题又涉及人们最为重要的健康甚至性命,那么谨慎一点似乎正是欧洲人的作风。其实准确来说,欧洲人是在等待,等待转基因的安全性在科学上和实践中被更多证明,例如,当初瑞士全民公投,在5年内禁止转基因,其实这5年就是在观望。

欧洲人在人文素养方面总体要高于美国人,欧洲普通民众对于人与自然、科技与社会的思考也更加深刻和复杂,对于转基因这类涉及自身安全与发展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度更高,所以民众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也比美国更强烈。欧洲人具有强烈的哲学情怀,在欧洲大地诞生了无数哲学大师。正是这种民众间普遍的哲学情怀使得欧洲人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所以欧洲人对于转基因的畏惧要比美国人强烈。

2. 伦理因素。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欧洲影响深远,该理论认为是群体中的个体具有性状差异,这些个体对其所处的环境具有不同的适应性;由于空间和食物有限,个体间存在生存竞争,结果,具有有利性状的个体得以生存并通过繁殖传递给后代,具有不利性状的个体会逐渐被淘汰(达尔文把自然界这种优胜劣汰的过程称为自然选择);由于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物种就可能出现性状分歧和导致新物种的形成。<sup>①</sup>按照这种理论,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认为,当下存在的物种才是“自然”的,一切通过人为手段的强行干预会导致基因突变,给农作物及其相关的生态系统带来剧烈的变动,最终引发生态环境的紊乱。<sup>②</sup>这种自然“进化论”对欧洲人的自然伦理观具有深刻影响。从自然伦理上讲,欧洲人

① 毛盛贤:《生物进化论的发展》,《生物学通报》1995年第1期,第5页。

② 新能源与低碳行动课题组:《低碳经济与农业发展思考》,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觉得转基因终究是异物，是反自然的，违背了自然的进化规律，并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而在美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被美国人广泛认可，有个别极端的州甚至立法来禁止。美国人并没有欧洲人那么明确的自然伦理观，反而受宗教影响更深，认为一切皆是上帝的旨意，转基因同样是上帝的造物。

3. 国情因素。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文化的开放和包容使得美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力较强。同时，美国之所以敢于对转基因食品市场采取宽松型监管，重要原因在于其产品损害赔偿数额惊人，加上美国人好诉的传统和发达的信用体制，足以促使食品制造商只有在经过严格科学实验和评估，确信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后才敢投放市场。由于产品责任巨额赔偿制度的缺失，欧盟和日本不敢依赖于转基因食品生产销售者的自律，必须通过加强政府的外部监管、规定转基因食品上市的严格程序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sup>①</sup>美国立法认为，如果转基因不能被证明有风险并且会产生实质性的危害，就可以认为它是安全的，即“科学可靠性”原则，体现了美国人对于科技的信任甚至崇拜，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国力上后来居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的飞跃，美国人有这种科技情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 （四）政治因素的歧异

1. 政治原因。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生物技术，转基因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前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更多的变成了政治议题，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美国政府和跨国生物技术公司认为欧洲人抵制转基因是基于政治考量而非科技因素，<sup>②</sup>政治因素的干扰使得转基因争论变得复杂化，且愈益白热化。美国在转基因方面的技术遥遥领先世界其它地区，这等于说，美国在转基因的相关问题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并且，美国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所以，美国在向其它国家推销转基因时显得理直气壮。而在其它某些国家看来，转基因似乎也颇具诱惑。但有些欧洲国家未必这么看，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对别国的生物入侵，是美国对全球种植业市场的攫取，如果转基因技术是危险的，那么就是美国人试图通过转基因技术本身危害全球民众的身体健康，达到“弱其国民”的目的，即使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美国的技术垄断也有可能使本国粮食安全暴露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因此，转基因的推广本身，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而美国的转基因“入侵”也的确对一些国家造成了困扰。中国的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大的大豆产业基地，许多豆农以此为生，在过去一直发展良好。但后来该地引入了转基因大豆，导致许多本土的非转基因大豆滞销，无数豆农叫苦不迭。同样的例子在印度、阿根廷等地一样常见。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欧关系早已貌合神离。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下，欧洲传统强国未必心甘情愿继续充当美利坚大哥的马仔，伴随着欧洲的一体化，欧盟在很多时候表现出反

① 刘旭霞、李洁瑜、朱鹏：《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法律制度分析及启示》，《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27页。

② “Jonathan Stearns, EU Nations Back Flexibility on Biotech-Crop Cultivation,” June 2014,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06-11/eu-nations-set-for-breakthrough-on-biotech-crop-cultivation-law.html>.



美情绪,尤其是作为欧盟轴心国之一的法国,历来就有一种反美情绪。<sup>①</sup>在转基因问题上,既然美国已经在许多方面形成垄断,欧洲人就会觉得转基因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私有武器”,无论其在科技上是否安全,都会引发很多不可预知的后果,怎敢轻易引狼入室。

2. 民意的影响。如果一个家庭中,父亲反对转基因,那么极有可能在其教育下的子女也会反对转基因,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如果某人的三个朋友都反对转基因,而他又对此毫无主见,那么他对转基因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去,这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欧洲民众反对和抵制转基因已经颇有年头,并且一些反转基因组织来源于环保组织,他们反对化肥、农药等一切“非自然”的耕种模式,这些组织势力强大、根基深厚,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如今更是有靠环保起家的“绿党”政治势力,对于人工干预作物生长环境持反对态度的民众,怎么会赞成对植物的基因进行操作?这种民意的惯性持续至今,所以今天许多欧洲人对于转基因还是没有好感。在美国,这种惯性其理亦然。而且,欧洲的民主相对于美国的民主来说,似乎更加单纯。美国的所谓民主夹杂着太多复杂的东西,在一些人看来更像是“资本家的民主”。欧洲民众的声音对于政府的影响似乎更大,而在美国,尽管反转基因的人也有一部分,但是他们对于政府的影响力显然不及孟山都这样的大公司。

在关乎民意的问题上,还应注意到大国与小国的不同。美国只有一个国家,而欧洲有数十个国家,美国地域广阔,而欧洲有不少国家从国土面积上来讲只是小国。大国的声音注定是难以单纯的,其必然是综合了各方的声音而得到的一个妥协声音,部分地区即使有尖锐的声音,也难有大的影响。而欧洲不同,国小则国情相对简单民意相对集中,同时也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较大的影响,所以其声音纯粹,政策干脆。比如,北欧五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他们的国情就是不适合转基因,那么他们就是要反对转基因。但假如北欧诸国不是拥有绝对主权的国家,而只是一个大国家的省或者州,那么即使他们那里不适合转基因,他们也发不出反对的声音或者他们的声音也终将受到其它省或者中央政府的影响。其实欧盟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就远比欧盟内部国家的态度暧昧。例如,欧盟食品安全局的一些官员认为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同样安全,目前全世界并未出现一例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而中毒的情况。<sup>②</sup>同时,欧盟当前正在酝酿和讨论自愿退出(opt-out)机制,力图采取灵活措施,让各个成员国选择是否同意欧盟的转基因法案,并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该机制力图给转基因开个门进入欧盟市场。<sup>③</sup>

### (五) 技术差异

<sup>①</sup> 法国反对转基因运动中一个关键特征和结果是民众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认识的提高。同时,法国科学家掀起一场揭发转基因内幕的全国性舆论风波。科学家认为孟山都的除草剂是危险有毒的,而法国的市场误导性宣传则使其被认为是可以生物降解和环境友好型的产品。为此,法国环保组织起诉孟山都,法国法院判定其涉嫌虚假广告和欺诈宣传。

<sup>②</sup>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Decision of 6 November 2013,”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p. 2.

<sup>③</sup> Jonathan Stearns, “EU Nations Back Flexibility on Biotech-Crop Cultivation,” June 2014,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06-11/eu-nations-set-for-breakthrough-on-biotech-crop-cultivation-law.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14年12月1日)。

美国在生物方面的科技实力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在转基因的研究方面，最初的转基因技术就是在美国出现，并且，美国对于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相当大，除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还有数千家生物技术公司，它们是转基因技术发展以及产业化的主力军，其力量强大无比。相比之下，欧洲在转基因技术方面的研究显得不那么热情，在技术上已经严重落后于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性加上美国高额补贴使得美国转基因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形下，欧洲各国尤其是大量占有欧洲粮食市场的法国为保护本国利益，不仅自己抵制转基因，同时还呼吁欧盟禁止转基因。

这种技术差距的形成，可以很大程度影响美欧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在美国看来，其在转基因方面拥有他国难以匹敌的技术优势，这样的优势自然要尽力发挥运用，所以美国政府对转基因的“走出去”是大力支持的，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使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对于欧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在转基因技术上的劣势已然形成，在此问题上并无太多话语权，若放开转基因，所谓“物美价廉”的转基因产品必将对本国传统产品产生冲击甚至碾压，专利上的垄断又使得本国产品毫无招架之力，极有可能对本国的粮食和经济安全产生不良影响。欧洲民众特别警惕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在欧洲市场的经营和运作。他们认为如果外源基因进入到玉米或小麦的野生品种以及传统品种中，将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并且会带来知识产权争端，即孟山都公司认为任何种植物一旦其中包含有一种受专利保护的基因，那就归它所有，“如果这一原则不受质疑，那就意味着该公司可能最终会控制欧洲乃至全球的基因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全世界共同的财产”。<sup>①</sup>所以，多数欧洲国家并不愿意为转基因“放行”。

### 三、美欧态度差异对中国的启示

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欧美两者在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上差异明显，有上述各方面的原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上述各种因素逐渐累积了欧美两者间的这种差异。

随着转基因在全球的不断普及，以及这一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转基因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样，中国也遇到了这一问题，并为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困惑。如果中国对此问题的争论是基于欧美两者之间的差异，那么这种争议是不理智的。美国人支持转基因并不代表中国就该支持转基因，同样，也不能因为欧洲的反对中国就跟着反对。对转基因的支持与反对，无关乎智慧，从以上分析可知，这是由于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

转基因其实是一个大范畴，对于转基因的支持与反对也并非一言可以蔽之，与转基因相关的产品有许多，转基因技术与产品也是有着很明显的差别，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取舍才是中国智慧的体现。在欧洲国家中，也有部分国家对转基因的态度暧昧，西班牙就是其中最支持转基因的国家。<sup>②</sup>抗虫害的“Bt转基因玉米”自从1998年开始就在西班牙种植，并且这种

<sup>①</sup> 玛丽-莫尼克·罗宾：《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第262页。

<sup>②</sup> 西班牙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区集中在其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地区，种植面积达到了137000公

转基因玉米在玉米螟重灾区几乎达到了全覆盖性的种植。但西班牙对转基因是选择性支持的,西班牙所支持的主要是转基因玉米,因为在西班牙东北部的玉米常常遭受虫害侵扰,难以治理,而防虫的转基因玉米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和气候多样,部分地区环境恶劣,或者有虫灾,或者土地沙漠化盐碱化,或者过于干旱,等等,出现不适宜常规农作物种植的情况。如果能有克服此类问题的转基因技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在这些地区是可以适当发展转基因的。

中国的传统农业仍旧是以家庭单干为主,所以规模受限。这对于普通农民来讲,其种植转基因的经济效益是无法与美国等相比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农作物相比,必须要有极大的经济效益上的优势,才可能得到推广。如果中国的农民在种植转基因时不能将转基因作物的优势发挥出来,那么,其竞争力是无法与外国产品相比的。试问,中国的农民能够发挥出转基因作物的优势吗?恐怕在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都不能。

从技术上来讲,中国的转基因技术甚至连欧洲、日本都不如,更不用说与美国比。在我们没有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技术之前,对转基因的开放其实就是变相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美国有技术优势,而中国农民没有,如果两者同场竞技,自然不公。但是,假如完全将转基因隔之门外,这会造成封闭,我们不能接触先进的技术,恐怕永远要在技术上落后。所以,我们应该以学习的态度来面对这些技术,在科学研究上要大开其门,大力支持相关研究,只要想办法使得美国转基因产品与中国传统产品不在同一条件下竞争,在当下实际上是一种好的契机,由于公众心理上尚未完全接受转基因,外国技术不可以对我国传统产品产生毁灭性打击,技术的垄断也尚未形成,恰好可以利用这个公众心理与技术进步的落差大力推进我国转基因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待到公众态度逐渐接受转基因,我国转基因也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推广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产品也比推广外国产品更加容易一些。即使转基因最终被证伪,也一定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是永无休止的争论。

其实对于不同转基因作物应区别对待,比如,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大豆,这两者虽同为转基因作物,但是所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大多数民众对于转基因棉花的态度是较为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棉花不是食物,似乎对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而转基因大豆则不然,这是直接食品,很多人一想到自己吃进肚子里的是所谓的“转基因”,可能是某种奇怪的东西,可能对人体有一些奇怪的影响,心理的恐慌自然难以避免。所以,反对转基因者大多数其实是反对转基因食物,但是,转基因食物只是转基因的很小的一部分,即便我们基于民意要谨慎对待与食物相关的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但其它的非食物类有益的转基因作物应该得到更多认可。

当然,既然与转基因相关的国际贸易被赋予了政治色彩,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更理性的做法是呼应欧洲。中美贸易常有摩擦,其中许多摩擦是美方的刻意刁难或者赤裸裸的歧视,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条款,中方企业常常有苦难言。在转基因贸易方面,我国与美

---

顷,转基因作物占据了西班牙全国玉米产量的 30%。

国也是争议不断。2014年8月16日，我国退回1467.4吨饲料用的美国黄玉米，该玉米含有MIR162转基因成分，2010年开始在美国商业化种植，但是迄今未取得中国农业部进境销售和使用的许可。但因其价格低廉，自2013年起我国广东、浙江、山东、福建等多个口岸相继查获多起该种玉米违规进口事件。<sup>①</sup>转基因产品的贸易问题及争议，已经成为我国学者关心和担心的焦点。是否某些国家会向我国输出一些“不安全”的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借助自由贸易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当做转基因产品的“小白鼠”？进口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又应该如何界定？转基因贸易不仅仅是转基因产品贸易，还有转基因技术的输出，我国批准的转基因种植品种中，有很多是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国外大公司的专利产品，这些产品在中国的种植无疑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了巨大隐患，并且在农民自主留下种子是否侵权等问题上，存在专利权的争议。在转基因贸易问题上，中方反转是理直气壮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方都不会因反转而受损。

综上所述，中国在面对转基因时的态度应该是：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有条件、有选择地发展一些有益的转基因技术和推广一些转基因作物，并非盲目支持或反对，而且，即使发展转基因，也要保证是自己的转基因，核心技术一定是在自己手中，而非舶来的转基因。

[责任编辑：许译丹]

[校对编辑：姜忆楠]

---

① 刘志强：《我国退运 125 万吨美国转基因玉米》，《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1 日，第 4 版。

## 红场阅兵：历史与现在

马 刚\*

5 月 9 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了此次庆典。本次红场阅兵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不仅是因其规模为历年之最，还因对七十年前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再次肯定，更是对俄罗斯当前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关注。

正如本次红场阅兵的主题分为历史和现在两个部分，时间的线索总能勾起观察者对过去的记忆以及现在情境的思考。十年前红场阅兵时西方领导人齐聚一起，坐在普京旁边观看红场阅兵的是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七十四年前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和提升士气，斯大林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典礼并发表著名演说。两百年前拿破仑进攻莫斯科并将其付之一炬，红场遭遇毁灭。五百年前伊凡三世在城东开拓“城外工商区”，标志着红场范围的初步划定。红场，这块“美丽之地”，见证了俄罗斯近半历史的荣辱盛衰，在近日，又一次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

俄罗斯红场阅兵给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但究其国内外形势而言，虽有好转，但整体而言并未恢复到乌克兰危机以前的局面。对俄罗斯人及总统普京而言，2014 年是在煎熬和重压之下度过的。时至今日，这头北极熊也是被困的焦头烂额。伴随着乌克兰问题发展进程的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比制裁危害有过之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油价下跌以及卢布的大幅度贬值，这使得财政收入一半受惠于油气出口的俄罗斯经济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同时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正如 2014 年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五环变四环的败笔一样，普京在年底召开的 G20 峰会上受到了西方政要的边缘化对待。这一切，仿佛使得俄罗斯有点喘不过气来。

但是，国际形势终究是变化万千的，在经历了 2014 年漫长的煎熬之后，最近国内外有所缓和的形势回报了俄罗斯人的努力。外交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五月中旬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这至少意味着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有所缓和。经济方面，今年 4 月以来，受宽松货币政策预期的刺激，资金入市抄底，令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回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RB 指数）4 月至 5 月上涨了 5.5%，原油价格 1 个月内上涨 20%，铁矿石价格也上涨了 25%，这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同时，最新数据显示，西方制裁和油价下挫引发货币危机 5 个月后，俄罗斯经济正在企稳。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称，俄罗斯经济已经度过最艰难时期。民调方面，根据列瓦达研究中心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普京有超过一半多的支持率，民意基础仍然雄厚。俄罗斯的国内外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要恢复到乌克兰危机以前的境况，俄罗斯人还需要更进一步努力。

---

\* 马刚，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红场见证了俄罗斯的历史，也必将见证其未来的发展。俄罗斯民族为何一再面临内外交困都能自我保全而在亚欧两大洲中左右逢源，在诸多强国的角逐中独领风骚，这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有着紧密关系。地处亚欧两大洲，幅员辽阔，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影响，在历史中，俄罗斯这只雄鹰总会在东西之间摇摆，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俄罗斯复杂的两面性格：单纯而又复杂；热爱自由但又崇尚专制；拥有奴性但又充满反叛精神……尤其让人为之折服的是俄罗斯人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所迸发出的非凡的爱国主义激情、勇气、耐力和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牺牲精神。如在 1812 年卫国战争中，面对强大的拿破仑军队，俄罗斯军民毫不畏惧，英勇杀敌，终于把侵略者赶出家园；1941-1945 年卫国战争中几个举世闻名的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通过这些保卫战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民族在遭遇外来侵略、保卫家园时具有超强的凝聚力和爱国精神。红场，见证的不仅是俄罗斯的那份不屈的历史，更是俄罗斯人强烈的凝聚力和爱国情怀。

这次红场阅兵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当年坐在普京旁边观看阅兵的是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而今年坐在普京身边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伴着《喀秋莎》的旋律，由 102 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方队从容、昂然地走过红场，在出场排序上，中国仪仗队也得到“特殊对待”。按照字母排序，中国本该排在第九位，但却调整到“末位”。一位军方人士解释了这种微妙调整展示出的深层次含义，“中国方队排在‘国际方阵’的最后一位，其后就是主宾国俄罗斯方队，展示了中俄关系紧密相连”。现代以来的中俄关系的最大特征是时好时坏，面对美国主导的单级格局的现实，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中俄两国能够走多远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红场阅兵的多元寓意令人玩味，不过，其主题始终未变，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人类一直面对的难题和考验，红场阅兵的历史和现实也深刻地体现着这一永恒主题。回想战争，和平才变得弥足珍贵，为了和平，也需要时时回想战争，正如普京总统所言，在 70 年后的今天，历史再次告诫我们要回归理性，让我们警醒。

[责任编辑：李天翼]

## 唐世平

**【编者按】**唐世平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难得一见的天才。生物学博士出身，半路出家至国际关系学界，竟然做得风生水起，乃至享誉国际。唐世平博客名号“潇湘剑客”，自称“剑动三军气，衣飘万里尘”，足见其视野与霸气。在研究进展相对缓慢的中国国关学界，唐世平正依凭其个人努力，及其俊秀弟子，为中国国关研究开疆拓土，进而于世界国关学界占据一席之地。本期《国关人物》就将带领大家走近中国国关大师唐世平，撷取其有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以及中国地区和安全战略的代表性论文，以感受其理论观点与政策眼光。

### 学者简介

唐世平，1967年1月24日生，湖南郴州人，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校聘关键岗位一档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著名学者，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专家，其原创的“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在世界范围享有影响力。

1985年，唐世平本科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系，获古生物学学士学位。1988年，硕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获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同年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获得分子生物及遗传学博士学位(1995年)与国际关系(亚洲研究)硕士学位(1999年)。唐世平学



成归国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工作，历任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07/1999-11/2002)、亚太研究所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12/2001-12/2005)、地区安全中心副主任(08/2002-12/2005)、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11/2002-12/2005)。其间，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所Sasakawa访问学者(07/2002-08/2002)、宁夏回族自治区外贸厅厅长助理(挂职)(10/2002-09/200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04/2005-07/2005)。2006年，唐世平离开中国社科院，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S. Rajartnam国际研究院担任高级研究员(03/2006-07/2009)。2009年唐世平回国，进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工作至今(08/2009-)。

唐世平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主要分为四个大的领域：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国际政治的大理论、地区安全及中国的安全战略、国家的行为和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广义制度变迁理论、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和科学实在主义等)；制度经济学(国家的学习能力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和广义制度变迁理论)。著有《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0)以及*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8000 B.C. to the Fu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等多部中英文专著。

## 一、理论观点

### （一）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一旦提及社会科学的范式理论，我们便会想到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中系统阐述的概念，但随赞誉而来的是大量学者的不断质疑，《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作者唐世平教授也同样表明：“此文的‘范式’专指基础范式，‘学派’或‘理论’指基础范式的组合后得出的结果。我将不讨论我所指的‘范式’和库恩的‘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标签其实一直都受到质疑，更是因为我的讨论可以无须他们的标签。”这是理解原文内容部分首先需要做的概念界定和澄清。

社会科学研究内容涉及的点多面广体大，怎样透过纷繁林立的理论学派乱象，开辟出一条比较清晰而又全面的认识道路？本文作者指出，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还原到极致，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科学中其实只有十一个基础范式。并且其又可以划分为二大型，即基石性范式（*bedrock paradigms*）和整合性范式（*integrative paradigms*）。九种基石性范式是：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两种整合性范式是社会系统范式（*social system paradigm, SSP*）和社会进化范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 SEP*）。这些基础范式如手电筒般照亮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或区域。而除了社会进化范式之外（它在其最完整的时候，能够综合其它所有十种范式，所以能够相对完整的理解人类社会），每一个基础范式都只能照亮人类社会的某个有限局部。这样就意味着单个基础范式有限的认识作用与复杂纷繁的人类社会现象之间具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这复杂系统及其历史，我们需要使用全部十一种基础范式，并将它们“有机地综合”（*organic synthesis*）在一起，尽管更少范式的组合可以充分理解更特定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这是本文表达的核心思想。

作者在详细阐述这些范式之前做了详细的必要说明，其中值得重视的有：原文是在最低限度的“科学实在主义”意义上讨论社会科学；用“社会力量”（*social force*）和“社会实体”（*social entity*）作为方便的标签；为了给出这些基础范式的明晰和精确的定义，用最纯粹的形式来给出这些基础范式的核心假定；明确呼吁社会科学中需要更合理的综合，但并不提倡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作者以最纯粹的形式阐述九种基石性范式所持有的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从而明确表明他们不同的认识论偏好明确或不明确地事实上是基于他们在本体论层次上的不同假定。

在原文中，作者详细探讨了各范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观点、原则、例证以及本体论的优先性，并且指出了对应范式走向综合应该注意的方面。在这里，首先需要重点明确优先性这个概念。简单地说，如果力量 B 最终不能够脱离力量 A 而起作用，那么力量 A 相对于力量 B 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因此，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是关于在广义上，那个力量更加根本的这样一个问题。与此相反，本体论的比重则是在不同情形下不同：如果力量 A 相比



力量 B 对构成某一社会事实的贡献多,那么力量 A 就相对力量 B 拥有更多的本体论的比重。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是由本体论的比重所决定的:如果力量 A 就相对力量 B 拥有更多的本体论的比重,那么力量 A 就应该被赋予相对力量 B 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

现以物质主义这一基石范式予以说明。作者认为,物质主义在本体论上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即使我们不得不发明认知标签和认知理解去描述客观物质性的事物和事实,这些事物和事实是独立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之外的。第二,甚至需要观念输入的“社会事实”也不能没有物质力量的输入而存在。换言之,观念力量总是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起作用,并受物质力量限制:我们无法逃离物质世界。在上述观点基础上,物质主义进一步指出,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具有超越观念力量的优先性,尽管它也承认,观念力量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而且是需要正视的重要力量。

物质主义在本体论优先性上的立场很容易证明:第一,物质力量可以独立存在于观念力量之外,观念力量却不能。毕竟,在(智)人出现前,这个星球不存在观念力量:一切皆为物质。第二,甚至人类在产生观念后,也不能完全逃离物质世界。毕竟,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他们的大脑由物质材料构成。

在认识论上,物质主义明示或蕴涵二个原则:第一,用物质力量解释社会现象总比用观念力量好。第二,只要有可能,人们应该把观念解释还原为物质解释。物质主义最突出的例子包括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宣称,物质权力而非观念力量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国家普遍追求物质权力。历史唯物主义则主张,物质性的生产力是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上层建筑主要是观念的。当然,作者对其它基石性范式也有精彩而独到的见解,但限于篇幅有限,不一一枚举。

这九种基石性范式既多且杂,可不可以予以整合而以一种更加简约的形式用来看待社会事实呢?作者认为那就是社会系统范式。社会系统范式告诫我们,不要使用简单化的方法理解社会,如寻求简单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线性思维,试图给出特定力量的比重,把个体因素引起的效果累加起来理解整体等。相反,我们要用互动、反馈和路径依赖等来理解社会动态。社会系统范式使我们得以理解社会系统内部的动态,但却不能让我们理解系统的大转换(transformation)。要理解社会系统的转换,我们需要社会进化范式。社会进化范式给社会系统范式增加了时间维度,从而包含了社会系统范式,相应地就包含了所有基石性范式。这样,社会进化范式就具有社会系统范式的所有特征,但还可以解释社会系统在穿越时间时出现的转换。因此,社会进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最终范式。

作者认为过去数十年间社会学派之争集中于何者更具有认识论的优越性,但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这些不同学派的相互抵触的优越性之争。并且指出,一个学派对社会的理解能力主要由以下四个维度决定:

1. 这个学派整合了多少种基石性范式?
2. 该理论包括了那些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吗?

3. 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机整合了基石性范式? 换言之, 该理论包括社会系统范式的一些要素吗?

4. 对于寻求解释社会变化的学派而言, 该学派包括了社会进化范式的一些要素吗?

对此, 作者以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和冲突学派, 理性选择方法为例给予了说明。

人类始终面临两大任务, 其一是怎样认识社会, 其二是怎样改造社会。假如人类社会的全貌是一头大象,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呢? 也许, 每一个社会科学范式只是看到了这头大象身体的某个部位, 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 有时不能仅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为论。所以, 我们要更清楚地认识人类社会, 需要一个更加综合的范式视角, 但是怎样综合, 这又是社会学家需要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 (二)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

唐世平提出了一个理解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论范式, 并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争提供了一个社会进化论的解决办法。

他认为, 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 并指出了在这一深刻变革背后的根本机制和三个辅助机制。自从沃尔兹的结构主义的革命以来, 国际政治主要的大理论都是系统理论。然而, 系统理论仅仅是动态的理论(即在系统中的事物不停地彼此相互作用), 却不是进化的理论, 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一个系统怎样演化为另一个不同的系统。没有加入进化的因素, 系统理论只能理解一个系统内的动态性, 但是不能解释一个系统怎样进化为另一个系统。因此, 系统理论不能对跨越时空的国际政治提供充分的解释——只有社会进化方法的理论才可以提供这一充分解释。因此, 国际政治必须成为一个社会进化的科学: 国际政治的学者必须“给达尔文应有的尊敬”。套用赫曼·米勒(Hermann Muller)的话, 国际政治科学领域没有进化论的一百五十年已经足够了。

两个系统——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是进化论方法的天然领域: 只有用进化论方法, 才能充分理解这两个系统。进化论方法考察的是由生命主导的系统。与生物进化中只有物质力量发挥作用不同, 社会进化中有一个全新的动力——精神力量——发挥作用。精神力量赋予了社会进化具有生物进化中所没有的全新特征。这些系统不可避免地随时间而发生改变, 其改变的进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变异、选择(即消灭且保持某些表型/基因型)、遗传(即复制及传播某些表型/基因型)。只要这个系统存在, 该过程就将会无限进行下去。进化论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对生命的奇迹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且完整的解释, 非进化论或者部分进化论的方法都不能提供这样的解释。进化论方法是精妙的, 它只需要一个机制: “变异-选择-遗传”。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 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 而国家获得安全的唯一方式就是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因此, 除了内部发展和武装自己之外, 一国必须通过扩张和征服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这一逻辑——“征服或被征服”, 是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根本机制。而且, 这个根本

机制是不可替代的。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正是因为国家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行事,世界才会发生变革。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的内在机制将最终导致该系统的灭亡。

随着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至晚期,系统中的选择将越来越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利而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有利。这一选择倾向的基础通过国家消亡而增加的国家的规模达到。国际体系将逐渐演化成这样一个系统:系统中的大多数国家将放弃通过征服作为寻求安全的方式,因为他们接受了征服是困难的而且不再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观念。由于这些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更多的是得到更严厉的惩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将最终接受“征服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观念。在从失败中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征服是困难的”这一观念也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国家间信仰的转变——从“征服是容易的且是有利可图”的转变成为“征服不再是容易且有利可图的”。在“征服不再容易且无利可图”的观念被国家普遍接受之后,通过防御战略而不是征服战略寻求安全的观念必然成为下一个在国家间传播的观念。这一观念的传播将强化国家信仰的转变——“从征服是容易的且是有利可图的”以及“征服性战略是获取安全的较优方式”转变为“征服不再是容易且有利可图的”以及“防御性战略才是获取安全的较优方式”。

新自由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关系更加复杂一些。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用以支持其理论的实证案例都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自由主义的自觉的时间限制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它清晰地表明,尽管新自由主义也假装想证明新自由主义适用于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但是他们早就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在时间上的局限性。新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理论也许能用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却对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几乎毫无用处。新自由主义者承认他们的理论在时间上的局限性是正确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只能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进化而来,却不可能直接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进化而来。只有在一个以“共同生存”为逻辑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合作才能成为一种可行的自救方法。而只有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来源于重复合作交往的观念和规则才有机会被固化为国际机制。重复的或制度化的合作需要有一个客观基础,而这一客观基础只能由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化所提供。

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且该系统的本质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正因如此,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来分析。因此,那些试图证明某一个大理论是相对于其他理论而言更“科学的”、更优的理论其实是在做无用功。这些辩论应该让位于使适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个理论更加完善的研究。在没有首先确定某个理论要解释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前,我们不大可能知道哪一个大理论是更优的理论:国际政治理论是有时代性的,而不是无时限的。因此,一个国际政治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个过去的时代,并不代表其自然会成为一个更好或最好的引导国家现行和未来安全政策的理论。一个能很好地解释过去的理论可能是“科学意义上”的好理论,但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与未来的好向导。更具体地

说，米尔斯海默过去是对的，但是现在是错的，将来也将是错的：他的政策建议将给今天及未来的世界带来灾难。相对地，杰维斯过去是错的——他的政策建议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是自杀行为，但是现在他是正确的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将是正确的。最后，基欧汉过去是错的——他的政策建议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也是自杀行为，但他在二战之后也许在变得越来越正确，而未来可能更正确。正因如此，当一国决定采用某一特定国际政治大理论来指导其政策时，它的决定不能仅建立在对某一理论的科学价值的评价上，而首先必须看其所在的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而后再决定某一理论是否适合他所处的世界。用一个来自于并适用于一个特定时代的大理论来指导另一个时代的政策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即使被选择的大理论在“科学意义上”是个好的理论。

## 二、政策视角

### （一）中国的安全战略

唐世平先生在《理解中国安全战略》一文中对中国安全战略做了非常系统的介绍与解释，在这篇文章中，唐世平先生先是对中国的安全行为进行了简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然后对于中国目前的安全战略的本质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唐世平先生阐明了中国安全战略的理念基础以及一些处理周边地区和世界安全事务的基本思想，此外，唐世平先生也告诉了我们他认为世界对中国应该期待什么和不应该期待什么，最后，唐世平先生对于中国现在的安全战略面临的挑战和可能发生的演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唐世平先生认为，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存在很深的误解，许多观察家过分地强调中国是一个扩张性的国家，唐世平先生承认我国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安全战略，但是他强调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的现实主义，并明确指出我国现行的安全战略的本质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安全战略。此外，唐世平先生批判了“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论断，他认为中国既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有限的），这体现在追求国家的统一这一方面，也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追求的是融入当今的国家秩序而不是推翻。正是因为国际社会上对于中国的安全战略存在着如此严重的误解，所以唐世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地解释了中国过去和现行的安全战略以及我国安全战略的一个未来的走向问题。

首先，关于中国过去的国家安全战略，回顾新中国历史上的安全行为，唐世平先生认为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获得安全：第一时期（1945至1985年），集体防御和安全合作在我国安全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时期（1985至1989年），我国基本上放弃了明确的集体防御，更加强调安全合作和松散的集体防御；第三时期（自1989年以来），中国除了继续坚持以安全合作为核心的安全战略，同时也开始慢慢接受集体安全战略，并且集体安全在我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

其次，关于中国现行的安全战略，想要理解中国的安全战略，我们就必须弄明白我国安全战略的理念基础，唐世平先生认为我国的安全战略有四个理念基础：第一，追求一个富强

且被外部世界尊重的中国，这是自 1840 年以来就存在的安全理念；第二，中国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第三，自我约束；第四，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唐世平先生通过这四个安全理念告诉我们中国现行的安全战略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性质的，并兼备一部分新自由主义的特征。

唐世平先生认为中国现行的安全战略存在着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安全环境的重要影响，中国一直致力于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二，中国致力于维持一个好的周边环境以抵御中美关系恶化时的安全压力；第三，中国已经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或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和组织；第四，在合作方面，中国对待经济合作比对待安全合作更为积极，对集体安全的态度仍然较为谨慎。唐世平先生由这四个基本特征总结出：中国的安全战略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思想作为主导思想。

然后，关于中国安全战略的未来，唐世平先生认为中国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加新自由主义的安全战略将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两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和两大国内辩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第一，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国对中国采取怀有敌意的行动将会动摇中国安全战略的思想基础；第二，地区信任问题，其他地区国家对中国持久的不信任也有可能导致中国无法、甚至不愿意继续执行这种并不具有侵略性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安全战略；第三，“和平与发展”的辩论，对“世界对中国是否是友好的？”“人类是否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深刻塑造中国未来的安全战略；第四，“中国应不应该在国际上积极寻求责任”的辩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将影响中国安全战略未来的走向。

最后，唐世平先生认为我国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核心，加上一部分新自由主义的安全战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安全战略正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国际上，一些国家将中国视为其必然的安全威胁，许多国家并不能以和平、平稳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日益强大，这种强烈的不信任将摧残我国实施现行的安全战略的耐心和决心。国内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的日益强大后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表现为大众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要求中国过分地追求一些国际上的地位和权力，这并不符合现行的安全战略的主旨。

## （二）中国的地区战略

在《中国的地区战略》中，唐世平大致描绘了中国的大战略，尤其是其核心理念与实践。其次，考察了中国的地区战略，重点是其目标、战略思想和结果。最后，展望了中国的地区战略的未来和对地区及中美关系的影响。

唐世平认为，发展是解决中国当前以及今后面临的一切重大挑战的唯一办法，中国的大战略必须服务于发展这个中心目标。他将中国大战略的中心目标概括为：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发展（经济、社会与政治）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环境（安全、经济和政治）。

中国的大战略由四个核心理念组成。第一，基于中国的领土、人口、文化、历史以及不

断增加的财富，中国完全有理由跻身大国俱乐部。第二，邓小平意识到了“安全困境”的存在，这一认识对中国的战略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自我克制”。即不要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争夺领导权，不勉强承担中国无法担负的责任。第四，“做负责任的大国”。随着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中国的经济繁荣与安全保障都高度依赖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肩负起义务和责任。

唐世平对中国大战略的实践总结出了四个显著特征。第一，“大国外交”。基于大国的自我定位，其目标是与所有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在国内外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唐世平在文中也提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是中国资金、技术与市场的主要提供者，中国的大国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中心的”（U.S.-centric）。第二，执行睦邻友好、稳定周边的战略来地域中美关系有可能发生的变化。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以及中美关系的阴晴不定，中国执行温和的政策，那么大多数地区的国家将不会采用强硬的联合遏制政策，从而改善地区安全环境。第三，在地区与全球的多边机制和倡议中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第四，中国对愿意承担的责任仍是极其谨慎的。

唐世平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其大战略。由于亚洲是中国所有的国家利益（安全、经济和政治）都同时存在的唯一的一个地区，中国在亚洲制定的实现地区战略的方式是一个同时追求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综合方式。中国地区战略的目标是以“安全-经济-政治”为轴心的。在安全方面，首要目标是与地区内的主要强国（美、俄、日、印度）均维持一种至少可以正常运转的关系，以免中国再次在大国中陷入孤立。第二个目标是尽可能维持与地区内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以防止一个针对自己、得到其他大国支持的遏制联盟形成。在经济方面，通过成为地区内国家的市场和投资、技术提供者，使中国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以缓解地区内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恐惧并防止本地区国家联合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在政治方面，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以实现地区政治影响。

唐世平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理念。第一，尽可能与所有地区国家建立全方位的合作或伙伴关系。第二，显示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最有效的方法是担负起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通过自我克制和接受约束的态度来传达自己的善意。第三，只要美国不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就可以与一个“霸权强国”共存。第四，在融入地区的过程中选择“美国方式”，通过开放国内市场而让地区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机会，希望地区内国家更能接受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五，地区主义加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在中国显示良好意图和表现出接受约束的态度方面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地区多边主义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关键之一，也是中国塑造国际政治的最好办法。

唐世平总结到，在地区战略的理念与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地区战略实践更加积极、灵活和广发，可以概括为：积极参与、自我克制、提供保证、开放市场、促进相互依存、创造共同利益、减少冲突。

对于中国地区战略的未来及其启示，唐世平认为，与中国国内围绕“和平与发展”的争

论紧密联系的两个外部因素,将一如既往地影响中国地区战略的未来。第一,由于美国仍处于中国战略考虑的核心地位,影响中国未来地区战略的第一个外部因素将是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意图以及美国怎样看待中国与地区内国家的互动。影响未来中国地区战略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善意的地区战略与积极的政策成果之间的自我加强的良性循环是否能够继续下去。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对地区内国家的良好意图有信心。

唐世平对中国的地区战略进行了总结和展望。他认为,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艰难寻求,从而对自己在地区内的角色更加肯定。只要中国保持对外部环境的乐观评估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自我认同,中国目前的地区战略将会持续下去。亚太地区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地区内国家和美国的战略取向。唐世平在文中最后对中国地区战略的选择与结果进行了整理。

### 三、人物评价

#### (一)《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

在对围绕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安全困境的基本议题的极为深入和富有穿透力的分析中,唐世平带领我们深入到国际冲突的理论和经验争议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现实主义、信号、信任和合作问题提出了大量的洞见。

——罗伯特·杰维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这是一个深思熟虑和富有创造性的支撑防御性现实主义基础的尝试,而且也国际关系的进化理论铺垫了基础。对学术实践者和学生而言,本书都值得一读。

——理查德·内德·雷柏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

唐世平身处大博弈之后——没有什么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连贯理论。挥舞着锋利的弯刀,他无畏地跋涉在现实主义的丛林,同时打开那些寻求理解和制定“宏理论”的有用途径。所有世界政治的学者都应一读本书。

——杰弗里·勒格罗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 (二)《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

在这本令人激动的新书中,唐世平主张“社会演化范式”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基础。令人深思且洞见深刻,唐世平对国际政治转型以及它与国际关系理论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诠释。通过详实的论据,唐世平表明,他的研究路径不仅能够促进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而且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国际政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詹尼弗·斯特林-福克 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唐世平教授提出了一个大胆且令人深思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历史性的经历了从狩猎-采集社会相对良好的社会关系,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再到防御性现实主义系统,最终来到一个更加以制度性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系统的演化过程。诸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类的常见国际关系理论,仅仅能够解释有限的而非完整的历史。在提供了一个国际系统从

起点到如今的演化的总体脉络的同时，唐世平的社会演化诠释囊括了以上这些常见的理论观点。

——亨德里克·斯普鲁特 西北大学巴菲特国际和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演化”一词在社会科学中通常只是被当成一个隐喻来使用，但是在唐世平的富有洞察力和重要的研究中，他严肃地对待演化，进而展示了国际关系到底是如何演化的。通过这一研究，他修订并调和了许多我们所熟知的理论，并且重新精彩地阐释了战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真正气势恢宏的诠释。

——罗伯特·杰维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唐世平提供了一种非决定论者和非还原主义的，因而也是有别于演化心理学的，社会演化视角。唐世平的“有利变异”是一个好的想法，而“有利变异”是否能够存活取决于它所处的背景以及它的支持者所掌握的权力。他的方法事实上就是一个好的思想：如果有好朋友的话，将促进国际关系的演化。

——理查德·内德·雷柏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院国际政治理论教授

[整理：胡阳阳、马刚、裴瑶、唐铭兴、彭宁楠]

[责任编辑：胡阳阳]

## ..... 街头政治 .....

2014年的香港“占中”运动让“街头政治”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就字面上的意思，街头政治指在街头从事的政治活动。实际上，街头政治指一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为达到一定目的，发动民众在街头进行示威或围困、冲击政权机关的活动，是一种政治斗争形式。但是，街头政治并不等同于街头暴力冲突，因暴力冲突易导致迅速的警力配置，街头政治多采取相对平和的静坐、游行等形式。

街头政治多发生于“民主欠发达”国家，该类国家的社会中现代化发展迟滞，民主制度尚未成熟，受社会分化和选民分裂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国际势力的煽动，会引发一国的政局动荡、社会混乱，严重可致民族冲突、国家分裂。在实践中，街头政治多为一国反对派向当局施压的有效措施和夺取政权的捷径。因此，在许多学者眼中，街头政治是颜色革命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手段，二者实质上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他国内政的通道与进行“选举干预”的重要手段。

[整理：李天翼、唐铭兴]

[责任编辑：唐铭兴]



## 减少不确定性：适应比较案例研究的信息分析

卡佳·德罗兹多娃 库尔特·泰勒·巴茨\*

**摘要：**日趋增加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主要集中在这样的优点上，那就是深入的案例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统计结果的理解。本文从另一种方向来证明，一些从信息理论中得到的非常简单的定量方法，是如何能够巩固比较案例研究的。我们选取几个杰出的“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研究，运用信息理论方法进一步使这些研究的成果得到完善，这一点是通过为它们所含有的不确定性和影响力，提供系统的、可比较的和可复制的测量而实现的。本文所推荐的分析工具是足够简单的，它们可以被各种不同的学者使用，用于加强比较案例研究的成果，并确保为供选择的解释和从多重研究中积累的知识之间的区别，提供最大限度的区分手段。我们的方法特别服务于国际研究中的政策相关案例的定性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并不适合更加复杂或更加缺乏适应性的定量研究工具。

20 世纪后期的方法论论战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平息了，这一判断基于一种被显著认同的见解，即不论是概括性的集合研究中的实证研究，还是更加关注案例研究中的深入理解性研究，都存在着各自的优势（Coppedge 1999）。这种和解带来了一种新兴的研究兴趣，便是使用“多样性方法”，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对特殊问题的分析中结合起来（Lieberman 2005）。这种多样性方法首先关注在相同的实证问题中，把大样本分析和小样本分析并行使用。在本文中，我们赞成把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展现一种量化的却又简单并可理解的方法，去巩固小样本的案例研究。

我们所推荐的方法适用于传统统计学的不足之处。与现有的定量工具相比，它为小样本研究补充并提供了更大的优势。为此，我们利用信息理论，提出了一种严密的却又简单并明显可以理解的用来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Shannon 1948; Cover and Thomas 2006）。我们尤其关注政策相关的比较案例研究，它们涉及到可以影响到一种不确定结果的多种因素间相互影响的评价问题——在少量案例数的约束下，对聚集起来的可比数据的重大挑战，以及可能会对这些研究造成影响的潜在的非常重大的政策影响。在传统上我们的研究方法是这样的，并旨在加强这样的状况，那就是在国际研究中案例研究方法的频繁使用，以及为在多重案例中产生并积累政策相关知识提供明确的设计。

“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是由 Alexander L. George（1979）所提供的一种方法，它作为一种对日益增加的定性研究方法的系统应用的回应而提出，并源于对政策相关的经验主义归纳（Eckstein 1975）。在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中，一系列理论上具有积极性的关键变量是

---

\* 本文原载于《国际研究季刊》2014 年第 3 期（*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3, September 2014, pp. 633-645）。作者叶卡捷琳娜（“卡佳”）·德罗兹多娃（Ekaterina (“Katya”) Drozdova）是西雅图太平洋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她的研究兴趣是国际安全与反恐。库尔特·泰勒·巴茨（Kurt Taylor Gaubatz）是奥多明尼昂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副教授，他是《选举与战争》一书的作者，在国际法以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关系上有一些著作。

被认可的，它们的变化通过几个详细的定性案例研究得到了分析，并源自于系统性的总结。尽管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方法是非常系统性的并善于分析的，但我们仍然认为它的实证应用常常不能提供明确的分析。利用信息理论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为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的优点和缺陷提供一种系统的定量解释，并减少经常与其结果相互关联的不确定性。

我们利用信息理论，解决不确定性，在比较案例研究的样本非常少的世界中，为传统统计学中有代表性的不足之处提供分析工具。少量的观测次数限制了相关或回归分析等经典的统计检验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对于根本的数据分布，信息理论方法并没有做出假定，因而便不会受到许多传统统计学中正态分布假定或其他已知分布情况的限制。我们所推荐的方法旨在帮助定性研究者系统地评估并减少与小样本案例有关的不确定性，与为深入案例研究所探讨的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这种方法使用案例来研究数据，通过系统的分层的方法来强化定性分析的结果，并在一些直观的和简单的计算的帮助下，把来自于定性分析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行比较。

对于这样一种方法，我们首先会简要回顾一下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方法，以及它的优点和缺陷。紧接着，我们会概述信息理论方法，并将其与其他工具做出对比，以显示比较案例研究是如何作为对定量研究者，尤其是国际研究中的定量研究者的一种有帮助的补充工具而存在的。我们将通过对国际研究中的三个有代表性的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案例的研究，论证信息分析方法。在每个例子中，信息理论方法都强化了分析，这种强化是通过提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的定量数据，以及使用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所探寻到的定性研究的多重理论因素的相互影响而实现的。这一发现提高了我们对比较结果以及它们的政策含义的理解，并从信息分析的角度，为前进中的未来案例研究提供了建议。

### 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的优点和缺陷

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方法力图增加案例研究的科学性。它集中了系统过程的定性方法与大样本统计研究的概括性潜力的优点。George 和 Bennett 直截了当地解释了这种方法的逻辑：

这种方法之所以是“结构化”的，是因为研究者记下反映研究目的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在对案例的指导和使数据收集标准化的过程中得到解释，从而使案例结果的系统比较和累积成为可能。这种方法之所以是“有核心”的，是因为它只处理供调查的历史案例的某一部分（George and Bennett 2005:67）。

在一个典型的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中，研究者们确定研究问题以及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变量。然后他们使用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流程来选择一系列相关案例。这些案例可以是单一案例的不同横截面片段或时间片段，在这些单一案例的不同时间点上，因变量是有变化的。解释变量和输出结果的变化可以用来对最重要因素的确定做出定性评估。

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方法受到了对定性方法感兴趣的政治科学家的广泛支持。例如, Van Evera (1997) 提倡结构化、有核心的方法, 认为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之中。同一主题的还有 King、Keohane 和 Verba 的《社会科学设计》(1994) 一书。Carlsnaes (1992) 指出, 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对于建构主义学说而言, 是一个特别合适的工具。

使定性案例研究结构化、集中化和更加系统化, 可以进一步强化信息分析的基础工具。当一组案例因受到一个或两个中心变量的影响而明显地被排列起来时, 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是一种足够的分析工具。但即便是一些最杰出的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研究, 能做到如此清晰的也是罕见的。就像在大样本回归方法中, 我们需要一个严格的和可复制的方法来评估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对解释力以及它们阐明结果的能力, 而且这种方法对于定性学者来说是可理解的和有用的。信息分析使得对复杂的和不确定多元变量相互作用的明确和度量成为可能, 而对于结果的简单的直观比较, 却是不充分的并可能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三个著名的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阐明了这些挑战, 并对于我们所主张的后设分析方法来说, 充当了试验台的作用: Alexander George 和 William Simons 的《强制外交的局限》(George, Hall, and Simons 1971; George, Simons, Gordon, Sagan, and Zimmerman 1994); Michael Krepon 和 Dan Caldwell 的《军备控制条约批准的政治》(1991); 以及 William Durch 的《维和行动的演变》(1993)。尤其是 George 和 Simons, 以及 Krepon 和 Caldwell, 都被作为结构化、有核心的方法的样本得到了引用 (George and Bennett 2005)。令人惊讶的是, 所有这三个重要的研究, 都没有对结构化、有核心的研究方法中的各因素的相对影响力和重要性提供明确的结论。最过分的是 Durch 的书, 全书共提供了 20 个案例, 但没有对结果做出任何的综述和概述。在另外两个研究中, 作者们提供了对案例的概述, 但并没有对他们所研究的案例与政策输出结果因素的相对影响, 提供任何明确的指导。后两项研究都提供了一个表格, 总结了案例中供检查的各种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因素 (自变量), 但奇怪的是, 这一表格却并不包括案例的输出结果 (因变量值)。

此外, 实际的对表格的分析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读者的直觉判断。表 1 显示了问题的所在, 它展现了《强制外交的局限》的数据, 我们添加了“成功”一行来展示案例的输出结果。(在这个和随后的数据表中, 列表示案例, 行表示每个案例的原始研究中供分析的因素和变量。)

表 1 强制外交的局限

	<i>Pearl Harbor</i>	<i>Laos</i>	<i>Cuba</i>	<i>Vietnam</i>	<i>Libya</i>	<i>Nicaragua</i>	<i>Persian Gulf</i>
Success	N	Y	Y	N	A	Y	N
Clarity of objective	+	+	+		?		+
Strong motivation	+	+	+	+	+	+	+
Asymmetry of motivation		+	+		?		
Sense of urgency	+	+	+				?
Strong leadership		+	+	+	+	+	+
Domestic support	+	?	+		+		+
International support	+	+	+				
Fear of unacceptable escalation		+	+		?	?	+
Clarity of terms	?	+	+				

(Notes. Data from George and Simon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1994:288) with the addition of "Success" row showing case outcomes as described by the book's case studies. "N" refers to "No", "Y" to "Yes"; "A" to "Ambiguous", "+" indicates the presence of the row's factor in the corresponding column's case; "?" means tha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factor is present).

表 1 中的两个明显成功的案例，老挝和古巴，大部分自变量都是正值。这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个别因素的重要性，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成功的或模棱两可的案例。这个例子还表明，结果可能高度依赖于某一案例或变量集，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工具来检查这些潜在的依赖。

Krepon 和 Caldwell 对军备控制条约批准的研究同样地模棱两可。他们的结果如表 2 所示——我们添加了“批准”一行来展示案例的输出结果，这些输出结果在原始研究中再一次奇怪地缺失了。这种缺失的表现进一步表明了累积在定性研究分析中的困难。Krepon 和 Caldwell 直截了当地表示，仅从他们的 7 个案例研究中就得出结论的挑战是“令人畏惧的”（1991:399）。它们对结构化、有核心的方法的评价是，“对于案例中成功与失败的最重要的部分来说”，它不能“提供清晰的排列顺序”。我们所推荐的方法可以纠正这一问题。

表 2 军备控制条约批准

	<i>Versailles Treaty</i>	<i>Washington Naval Treaties</i>	<i>Geneva Protocol (1926)</i>	<i>Limited Test Ban Treaty</i>	<i>ABM</i>	<i>SALT II</i>	<i>INF</i>
Ratification	N	Y	N	Y	Y	N	Y
Perception of substantive treaty benefits	+	+	+	+	+		+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	+		+	+		+
Perception of president as defender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		+	+		+
Perception of president as experienced in foreign affairs					+		
Presidential skill in handling executive-congressional relations		+		+	+		+
Quality of presidential advice	+	+		+	+	+	+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	+	+	+	+		+
Support of senate leadership and pivotal senators		+		+	+		+
Support of military leadership	+	+		+	+	+	+

(Notes. Data from Krepon and Caldwell, *The Politics of Arms Control Treaty Ratification* (1991:465) with the addition of "Ratification" row showing case outcomes as described by the book's case studies. "N" refers to "No", "Y" to "Yes"; "+" indicates the presence of the row's factor in the corresponding column's case; "?" means tha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factor is present).

Durch 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演变》（1993）被明确地设计成了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研究，但它既没有对兴趣变量的概述，也没有对案例的总结。对案例的阅读使得案例中存在的一组问题变得相当明确。我们从我们对案例描述的阅读中总结出了一个数据集。我们所总结的 Durch 的数据版本如表 3 所示。

表 3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演变》中的基础数据

	UNSCOB	UNTSO	UNEF I	UNEF II	UNDOF	UNOGIL	UNIBIL	UNYOM	UNHCR/P	UNHMOG	UNIKOM
Success	Y	N	Y	Y	Y	N	N	N	Y	Y	Y
Local Consent			+	+	+						+
Great Power Support	+	+	+	+	+	+	+	+	+	+	+
United States Support	+	+	+	+	+	+	+		+	+	+
Attitude Change			+	+	+						+
Domestic Conflict	+					+	+	+	+		
International Conflict	+	+	+	+	+	+	+	+	+	+	+
UNSC Initiative	+	+		+	+		+			+	+
Local Initiative	+					+		+	+		
Third-Party Broker			+		+			+	+		
Political Mission	+					+	+		+		
Military Mission		+	+	+	+		+	+	+	+	+
Narrow Mandate			+	+	+	+		+			+
Broad Mandate	+	+					+		+	+	
Mandate Revision		+		+					+		

(Notes. "+" indicates the presence of the row's factor in the corresponding column's case; an empty space indicates otherwise).

表 3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演变》中的基础数据 (续表)

UNMOGIP	UNTEA	UNGOMAP	ONUC	UNTAG	UNAVEM I	UNAVEM II	MINURSO	ONUCA
N	Y	Y	N	Y	Y	N	N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尽管是一些最杰出的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方法的例子，但这些研究却没有一个能够对输出结果中假定因素的相对影响做出清晰的评价，也没有一个能够评价比较的结果。前两项研究都对它们的比较结果提供了表格的总结，却都没有包含案例的输出结果。联合国维和研究甚至没有提供任何跨案例的总结表格。

这些样本反映出了评价变量与输出结果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困难之处，尽管是对每一个案例的细致的、深入的、实质性的定性分析，对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评价却依然不甚可靠。人类的大脑可以非常有效地把握住定性信息，但随着因素的增多，系统性的比较也会越来越困难。把表格中的解释数据和输出数据组合在一起的简要步骤，有益于对结果的视觉上和直观上的比较。但如果要真正地对包含这些数据的模式做出评价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系统的和可复制的方法论。在这里，我们推荐使用信息理论来阐明这些模式，以利用结构化、有核心的案例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为受识别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影响力，提供系统的、可比较的和可复制的测量方法。

### 信息理论与政治科学

信息理论是来源于传播学的概念，主要用于回答关于信息在不确定（嘈杂）环境中进行传递的基本问题，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有可能缺乏理解信息的能力，或者信息在其传递过程中可能会被曲解。在 1940 年，通信专家就认为通过通信渠道提高信息传播速度会提高错误率和失真率。然而，Claude Shannon 提出只要信息传播速度低于通道容量，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但通道容量只能通过通道噪音频率特性来计。此外，Shannon 还认为像演讲或音乐这样的随机过程有着不可简化的复杂性（再往下的信号将不能再被压缩），他将其命名为信息熵（对应热力学熵），并论证出如果信息熵远低于通道容量，那么近乎于零误差的通信将成为可能（Cover and Thomas 2006）。

继早期的通讯应用和密码技术（Shannon and Weaver 1949）之后，信息理论已在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物理学、统计学、分子生物学、分析化学、金融学（Verdu 1998; Guizzo

2003; Cover and Thomas 2006) 以及社会科学。最新的研究进展还将信息理论的方法用于研究复杂的生物系统——包括自然 (Samoilov 1997; Samoilov, Arkin, and Ross 2001) 和社会系统 (Drozdova 2008; Drozdova and Samoilov 2010)。

Shannon 在 1948 年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 (包括率先使用术语“比特”来指代一段数据) 为数字通讯革命铺平了道路 (Guizzo 2003)。早在 1990 年,《美国科学》就称这篇文章是“信息时代的大宪章” (Horgan 1990)。除了为近乎所有与数字通信、存储和加工的发展相关事物提供基础以外, Shannon 的观点还为其他种类的噪声数据中存在的信息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估方法。Shannon 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分析噪声能够提供大量与这些信号相关的信息。

除了越来越多地在广泛领域中用于信息分析, 这些方法还被发现对政治科学有一点相关作用。信息分析的基本直觉仅提供了一种方法, 来了解给定因素存在与否能多大程度减少给定结果存在与否的不稳性。在政治学和国际研究中的数据会不可避免地由于人类行为固有的概率性和随机性因素而“嘈杂”, 因此信息理论应该能为这一领域做出巨大贡献。政治学家已经适时地注意到 Shannon 关于信息和通信的著作——1984 年, Philip Converse 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长就职报告的开场白中, 称其为“流动的研究” (1985)。少数注意到信息理论的政治学家已经将其用作一种理解政治信息和交流过程的方法 (Lowry and Marr 1975; Oppenheim 1978; Congleton 2001), 还有的创造性地将其用于理解不确定性 (Midlarsky 1974)、问题多样性 (McCombs and Zhu 1995)、政党结构 (Dodd 1974; Molinar 1991) 以及其他制度特征 (Rapoport 1974; Sheingate 2006)。

Drozdova (2008) 提议使用信息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 来研究组织是如何使用科学技术和人际网络, 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的。在该项研究中, 信息分析断定基于理论导向的组织 and 因素样本共同的最有意义的变量, 能够反映组织的任务和环境, 这种任务和环境为了给他们供选择的生存战略提供深入的比较调查研究, 提供了供选择的差异明显的组织案例。在这里, 我们建立这种方法, 以推广信息理论作为一种提高定性案例研究方法的综合分析。

### 国际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分析：一种信息理论的方法

如上文所探讨的杰出的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案例所示, 当结果由读者的直觉来评估的时候, 这种完善且性质严格的方法将会失去其严谨性。人们仓促之间很难理解和比较大量因素, 这样就会出现相关重要性因素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由此产生了从案例研究生成的信息中获取更多认知的机会。

信息理论方法通过对以下问题的定量的回答来评估和减少不确定性:

1. 什么是不确定性的量级?
2. 怎样才能知道一个不确定结果的观测因素理论上与结果是否相关?
3. 在结果中多种因素的相关影响是什么?
4. 什么因素在减少结果不确定性中是最有用的?

### 5. 个体案例在分析结果中的影响是什么?

信息理论提供了系统回答这类问题的工具,采用了不确定性的概率方法以及一个变量中关于另一个变量的相关信息。

这一方法对于决策者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因为决策者总是需要在大量不确定性和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做出决策。案例研究倾向于指出大量可能的重要因素,但是哪一个(些)应该优先考虑?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可能的变量因素中哪一个能给我们关于可能结果的最优信息,而这些认知有助于改善决策。

交互信息是一种关于给定因素的认知如何减少结果不确定性的方法。它并不一定会消除不确定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能提供一个系统的关于存在于一个结构化案例分析中的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理解。越是交互的信息能越大地减少不确定性——或者提供更好的认知。一个有着高度交互信息的变量相比于其他独立分析的变量来说,可能更具解释性和预测性。举个例子,这一方法不同于回归分析且在假设时限制较少。我们没有假设并检验一个特定的定量建模关系,而是评估定性案例研究产生的信息认知。这一更加适度的目标在小样本观测值和未知因素分布的现象研究中是更为合适且精确的。

要素和结果出现的频率被用于评估概率,所以必要的概率很容易仅仅通过计数变量和因变量出现和共生的次数来计算(演示如下)。该分析发现并系统地比较了每一个因素的熵,同时还辨明了每个因素减少熵的相对影响——也就是说,减少结果不确定性是基于观测因素的。(Samoilov 1997; Dhar, Chou, and Provost 2000; Provost and Fawcett 2001)。数值结果接受关于结果不确定性中每个相关影响因素不清晰的排序和系统评估。最终,这一方法提供了一个关于理解和提高案例比较结果的强有力且严格随机的方法。同时,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直觉上、数学上可应用的方法。只要你会数数,你就可以做这个研究。

## 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

我们所推荐的方法采用基于简单频率计数的计算,可以归纳为四个步骤——量化、计数、计算及比较。

### 步骤 1: 量化

将积极的变量赋值为 1, 其他为 0, 用于量化案例研究的数据。

我们论证这种二值化在三个著名的结构化例子中的用法,集中比较上面所讨论的(表 1-表 3)。对于每个研究,首先收集每个案例中相互排斥的二值结果集,作为步骤 2-4 中信息分析的数值。

### 步骤 2: 计数

计数每个结果和要素同时出现的次数来评估基于要素和结果频率数的条件概率。

要素 X 和结果 Y 同时出现时记作(x, y)。一个二元系统有四种可能性:(x = 0, y = 0), (x = 1, y = 0), (x = 0, y = 1), (x = 1, y = 1)。

我们计算每一种可能性在一个给定案例研究中出现的次数，并将这些简单频率计数用于概率计算。结果  $y$  的条件概率基于要素  $x_i$  的值，是由除以两个值共同出现的联合概率计算出的，写做  $p(x, y)$ ，这一因素发生的概率， $p(x_i)$ ，对应多有可能的组合如下（在表格 7 中逐步演示了一个案例的所有计算过程）：

1. 要素和结果值共同出现时，记作  $\text{count}(x, y)$ ，对应每个组合： $\text{count}(x_i = 0, y = 0)$ ， $\text{count}(x_i = 1, y = 0)$ ， $\text{count}(x_i = 0, y = 1)$ ， $\text{count}(x_i = 1, y = 1)$ 。联合概率计算，记作  $p(x, y)$ ，每个值除以总案例数， $n$ 。因此，计算公式为  $p(x, y) = \text{count}(x, y)/n$ ，为每一个要素和结果的组合。

2. 计算概率，记作  $p(x)$ ，每个因素存在的可能性  $p(x_i = 1)$  是由正发生的除以总案例数，记作  $\text{count}(x_i = 1)/n$ 。没有要素互补可能性， $p(x_i = 0)$ ， $\text{count}(x_i = 0)/n$  或者只用  $1 - p(x_i = 1)$ ，因为总概率相加为 1。

3. 计算条件概率，记作  $p(y|x)$ ，由每一个联合概率除以每个要素概率， $p(y|x) = p(x, y)/p(x)$ 。

### 步骤 3：计算

将步骤二中的概率放入到信息分析公式当中。

$X$  作为自变量， $Y$  作为与  $X$  相关并由  $X$  推断出的结果（即因变量）：

1. 信息熵测量出  $Y$  的不确定性，用  $H(Y)$  表示。

2. 条件熵测量由  $X$  导致的  $Y$  的不确定性，用  $H(X|Y)$  表示。

3. 交互信息测量出基于  $X$  的  $Y$  减少的不确定性，用  $I(Y; X) = H(Y) - H(Y|X)$  表示，由此可以看出熵（由于没有任何附加信息而导致的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条件熵（假定我们知道一个因素是否存在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的区别（Shannon 1948; Shannon and Weaver 1949; Cover and Thomas 2006）。

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被步骤 2 中收集的简单的数计算。这些基于概率的计算随后作为熵度的基础。Shannon 的核心观点是：联合事件的概率可以从乘法转变成通过使用对数的一个更加直观的加法方法。增加对数方法可以产生一个简单的凹函数，这个凹函数显示了结果的概率是 0.5（百分之五十的机会）的最大不确定性以及结果的概率为 1 或 0 的最小不确定性。对数的基础相当于单位，在这个单位中不确定性将会被表现出来。因此，2 个对数将会产生信息和不确定性的一个二元的方法。这种方法为复杂信息的二元编码铺平了道路。

出于我们要理解一个给定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的目的，当自变量和因变量完美地共同出现的时候，当凹函数的减少率与二者共同出现的衰减同步的时候，不确定方法就与零不同。附录中给出了明确的计算公式：

- 不确定性（信息熵）： $H(Y)$ 。
- 有条件的不确定性（由  $X$  导致的  $Y$  的熵）： $H(X|Y)$ 。
- 交互信息（减少不确定性）： $I(Y; X) = H(Y) - H(X|Y)$ 。

### 步骤 4：比较



结果提供不确定性和影响力的数量测定。

我们可以根据不确定性的减少来理解自变量的信息影响。 $H(Y)$ 测量出,任何观察都会有一个成功的结果有多么地不确定。对于每个因素来说, $H(Y|X)$ 测量出,考虑我们知道因素出现与否的案例是否会成功有多么地不确定。然后  $I(Y; X)$ 通过知道每一个自变量,测量出交互信息(不确定性减少或信息增益)。当交互信息接近于零时,意味着理论上的自变量几乎不可能得到合适的结果。当交互信息接近于原始不确定值时,意味着自变量几乎完美地预测了结果。不同自变量的交互信息结果的大小为他们的系统比较提供了一个数字比例尺,来显示他们对减少结果不确定性的相对贡献。

计算结果(见表 7)可以使我们对定性案例因素进行排序,并且使我们可以评估他们的相关的、累积的影响。因此这种方法通过提供一个系统的评估方法提高了定性案例研究的水平,这一方法可以评估变量的相关影响和案例研究所重视的变量中的信息增益。

我们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工作中并将其作为复查前文提到的杰出的案例研究例子的分析手段。

### 信息分析与强制外交的局限

回到 Alexander George 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强制外交的局限》(1971, 1994)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注重比较且分析丰富结构方法的信息理论的可能性的具体的例子。

George 和他的同事检测了 7 个案例( $n = 7$ ), 其中的 3 个是成功的结果( $Y = 1$ ), 4 个是不成功的或模糊的( $y = 0$ )。这就是我们的因变量。不确定性  $H(Y)$ 是 0.985, 这反映了成功的结果与其他的结果之间的分裂。最好的不确定性——输出结果的好坏各半——将会是  $H(Y) = 1$ 。(如果结果是全部成功或者全部失败,那么在预测结果时就不存在不确定性即  $H(Y) = 0$ )。我们接下来分析了每个因素在试图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时的影响。计算与结果值相关的每个因素值的出现,可以使我们计算出节点和条件概率。表 4 给出了《强制外交的局限》中使用的各因素的信息分析(表 7 给出了所有的计算)。

表 4 《强制外交的局限》中的信息

$X_i$	Conditional Entropy: Uncertainty of Y Given X $H(Y X_i)$	Mutual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Reduction in Y Due to X $I(Y; X_i) = H(Y) - H(Y X_i)$
Clarity of objective	0.96	0.02
Strong motivation	0.99	0.00
<b>Asymmetry of motivation</b>	<b>0.52</b>	<b>0.47</b>
Sense of urgency	0.86	0.13
Strong leadership	0.86	0.13
Domestic support	0.86	0.13
International support	0.86	0.13
Fear of unacceptable escalation	0.86	0.13
<b>Clarity of terms</b>	<b>0.52</b>	<b>0.47</b>

(Notes. The variables making the strongest contribution to reducing uncertainty are in bold).

表 4 显示,在强制外交研究中,交互信息值分为三个梯度。第一,动机的不对称和条款的清晰度作为提供预测手段的仅有的两个变量,交互信息值为 0.47。这种减少不确定性表明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对预期结果的近 50%负有责任。第二,从本质上来看,目标清

晰度和强烈动机并没有告诉我们强制外交是否有可能执行（交互信息几乎为零）。在强烈动机的案例中，缺少信息增益是明显的，这是因为强烈动机在每个案例中都出现了：这不能帮助我们区别成功和失败。目标的清晰度也是无益的，但这种情况是因为它在 2 个成功的案例和 2 个失败的案例中出现了，在另外 2 个失败 1 个成功的案例中却没有出现。其次它未能给区别成功和失败提供信息。第三，大多数的其他变量（紧迫感、领导能力强、国内支持、国际支持、无法接受的逐渐升级的恐惧）的交互信息值是 0.13，这个值相对于完全不确定被减少来说是很低的。这些变量显示了不同的模式，但相同点是他们没能很好地与成功和失败的模式相匹配。

研究结果表明了客观的、比较的结果分析。信息分析发现了两个最有益的变量，每一个都可以去除将近一半左右的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这表明了两个变量中的一个相当大的信息增益——面对不确定性的诸多来源以及国际外交中涉及的诸多因变量。其他变量的贡献相对不足。信息论的方法使整理通过度量去进行定性解释的知识获得的程度成为可能。

复杂的主题——和它的政策相关性——要求我们对剩余的不确定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强制外交的局限》阐释了如何通过利用信息理论的研究结果，帮助我们了解个案的影响。例如，两个都被认为是有益的变量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与除了一个案例以外的其他案例都相匹配——就是说，在老挝和古巴案例中，结果值是正的，这些变量的值也是正的，反之亦然。重要的是，尼加拉瓜案例与这两个变量都不匹配。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个案例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尤其是要关注这两个变量。

《强制外交的局限》中，尼加拉瓜这一章阐释了在基础案例研究（进行信息分析的原始数据）中定性研究的模糊性，这将导致不确定性仍无法被解释。尼加拉瓜案例讨论了作为“解释成功的限制”一部分的结果（George et al. 1994:188）。它提出在这个案例中强制外交的目标是使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政权更迭，并且承认这件事在 1990 年 2 月的大选中的确发生了，但仅仅发生在美国多年的强烈的强制外交的努力后。（因此，案例研究的作者使用“成功”这一术语，而且在表 1 中将这个积极事实的结果正编码为“Y”，即熵分析计算方法中的“1”）。这一章还通过对起因的质疑，讨论了在其他力量的影响下，强制外交对结果的贡献中可能出现的限制，这些力量可能已经对结果做出了贡献。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在这些案例中只有 3 个是成功的，这些问题（尼加拉瓜）中的一个可能会导致缺少在所有案例分析的 9 个变量中的 7 个变量中的信息增益。图 1 表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案分析影响的信息分析的可能性。它解释了当每个案例单独从分析中被除去时，交互信息值的变化。正如预期的那样，尼加拉瓜案例对动机不对称和条款的清晰度案例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没有尼加拉瓜的情况下，这两个变量都近乎完美地区别了成功和失败。结果和案例变量的对比表格加上被这些表格数据引导的信息分析，提供了一个对结果和挑战的更清晰的观察，这些挑战在这一分析中已经明确，而且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能被预期、被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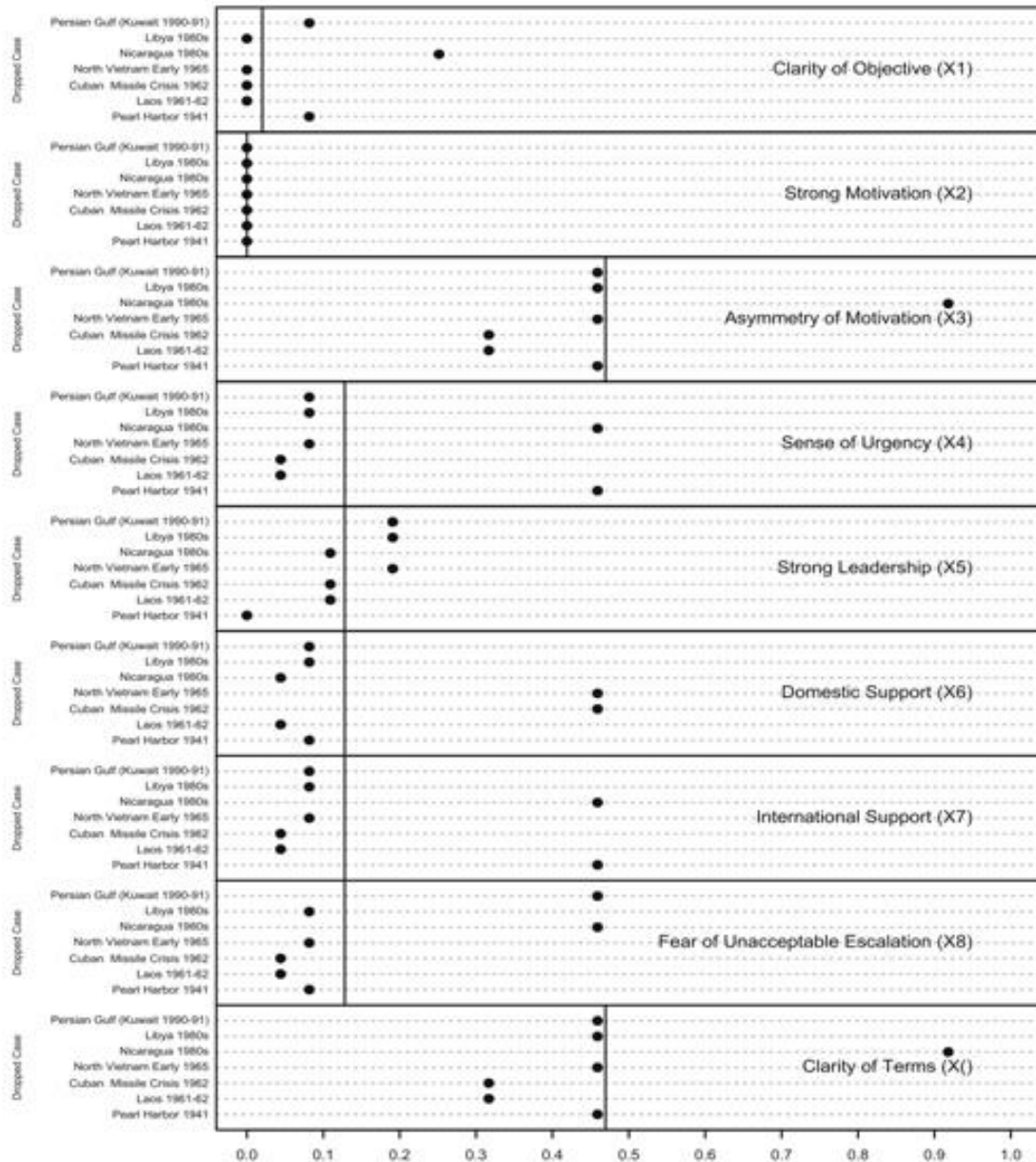


图 1 对个案效果的评估。本图显示了当每个案例单独从分析中被除去时，交互信息值的变化。点代表除去对应案例后的信息值。竖线表示其所含所有案例的总值。

信息分析给改进对比结果提供了案例选择的指导方针。服从被所有因素与输出结果值可能的组合所覆盖的二元分类的，经验上证据充分的变量和案例，促进了知识从定性数据中获益。当我们无法获得这样信息充分的文件的时候，信息分析仍然为提高案例对比的水平提供了手段。

### 信息分析与军备控制条约的政治

Krepon 和 Caldwell 的《军备控制条约批准的政治》（1991）一书中也有 7 个案例，但其中有 4 个成功、3 个失败。在这个例子中，两个变量完美地与结果相匹配：总统处理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关系的能力、参议院领袖与关键参议员的支持。这些变量中的任何一个正值都很准确地预测了条约的批准。表 5 给出了信息分析。

表 5 《军备控制条约批准的政治》中的信息

$X_i$	Conditional Entropy: Uncertainty of Y Given X $H(Y X_i)$	Mutual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Reduction in Y Due to X $I(Y; X_i) = H(Y) - H(Y X_i)$
Perception of substantive treaty benefits	0.79	0.20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0.52	0.47
Perception of president as defender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0.46	0.52
Perception of president as experienced in foreign affairs	0.86	0.13
<b>Presidential skill in handling executive- congressional relations</b>	<b>0.00</b>	<b>0.98</b>
Quality of presidential advice	0.79	0.20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0.79	0.20
<b>Support of senate leadership and pivotal senators</b>	<b>0.00</b>	<b>0.98</b>
Support of military leadership	0.79	0.20

(Notes. The variables making the strongest contribution to reducing uncertainty are in bold).

这里的结果不确定性和强制外交研究中的完全一样， $H(Y) = .985$ 。在这两个研究中，都有 7 个案例，4 个成功 3 个失败或 3 个成功 4 个失败。变量中的五个提供了最小差异信息， $I(Y; X_i) \leq .20$ 。变量中的其他两个是中间范围：总统的名气， $I(Y; X_i) = .47$  以及总统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捍卫者的认知， $I(Y; X_i) = .52$ 。最大交互信息与结果的不确定性近乎相等的两个变量对结果是最有益的（表 5）， $I(Y; X_i) = .98$ 。

因此，与 Krepon 和 Caldwell（1991:400）的陈述的观点相反，信息分析允许我们，如果变量没有完全的排序，那么至少要根据它们对军备控制条约批准产生的影响，并通过该影响相对量的明确的定量的方法，将变量分类。随着 George 和 Simons 对强制外交的研究（1994），对每个政策相关变量来说，信息分析使我们能更加直接地理解相对影响，或由此导致的缺乏。

精确的信息分析结果得益于更多的案例以及尽可能多地将结果和变量相结合。这种动态在我们最后的案例再分析中被证明。

### 信息分析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演变

William Durch 运用有结构的、有核心的方法，从 14 个角度对 1945 年至 1992 年联合国实施的 20 个维和行动进行了比较（1993:12）。Durch 提出了 3 个假设：成功的维和行动需要当地认同；大国支持；同时需要交战双方的立场有所改变，例如他们有相互妥协的倾向。奇怪的是，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虽然这个分析是基于这些问题的，并且这些问题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被反复提及、检验，这里却没有依照案例列出各个因素的表格和结果的总结。然而，这个分析还是能够让我们画出表 3 这样一个总结表格。

单单创造出一个包含一个变量的表格已经提高了我们在视觉上理解 Durch 的研究的能力。但是随着变量的增加，视觉上的判断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不精确。

简单的信息能够增加分析的清晰度与精确度。表 6 对在表 3 提供的数据的基础上做出的信息分析进行了总结。除了显示了信息分析在结果中体现的原则，表 6 还提供了一种理解每个变量的效果的方法。在表 6 中，我们发现当地认同和态度改变（分别对应 Durch 关键变量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假设）是决定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与否的最有力因素，但即使是这两个变量的不确定性也只能减少到 50%（与潜在的不可靠性 0.971 相比，不确定性减少到了 0.506）。

除此之外, 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两个变量的影响力度都是差不多的, 因此几乎无法判断它们各自的影响。

其他变量的不确定性几乎没有减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大国支持和美国支持 (对应 *Durch* 的第二个假设的变量), 几乎对维和行动的成功与否没有影响。事实上, 表三显示大国的支持对于维和行动的存在与否有着决定性作用。除了关于西撒哈拉的公民投票的案例之外, 剩余的所有案例中, 联合国的行动都有美国, 或者大国的支持。

表 6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演变》中的信息

$X_i$	Conditional Entropy: Uncertainty of Y Given X $H(Y X_i)$	Mutual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Reduction in Y Due to X $I(Y; X_i) = H(Y) - H(Y X_i)$
<b>Local consent</b>	<b>0.465</b>	<b>0.506</b>
Great power support	0.826	0.144
United States support	0.826	0.144
<b>Attitude change</b>	<b>0.465</b>	<b>0.506</b>
Domestic conflict	0.96	0.011
International conflict	0.902	0.069
UN Security Council Initiative	0.941	0.03
Local initiative	0.941	0.03
Third-party broker	0.895	0.076
Political mission	0.911	0.06
Military mission	0.968	0.003
Narrow mandate	0.958	0.013
Broad mandate	0.97	0.001
Mandate revision	0.951	0.02

(Notes. The variables making the strongest contribution to reducing uncertainty are in bold).

当然, 是否有大国支持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有趣的。14 个变量中, 有 10 个都无法证明它们对维和行动的显著影响。这些变量包括: 政治背景、军事背景、地理背景、联合国干预的原因、联合国命令的属性、资金来源、操作性问题。这种由信息分析所显示的模式, 可能会通过减少可能出现的“多余的”因素或将一组变量通过“定量案例分析”(QCA) 结合起来的方式, 转向获得更多洞察力的机会 (Ragin1987; Rihoux and Ragin 2009)。信息理论方法的优势在于按照原有的框架来建构研究, 但 QCA 可以起辅助作用, 它或者其他类似的方法可以找出无用的变量, 以减少误差, 从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代替原有的研究设计。

如果想要研究当地支持与态度变化的影响, 需要更多针对这两个因素的案例。信息分析方法无法通过 *Durch* 的研究提供的数据将这两个共同出现的变量分割开来, 但它使得 *Durch* 的研究成果更加清晰, 更便于我们评价研究结果并进一步深入下去。

## 限制与扩展

信息理论为定量与定性研究提供了桥梁。然而, 正如我们先前分析的那样, 信息分析并不是解决小样本数据的原生缺陷的良药。对于案例与分析要素的选择仍然需要严格地基于理论研究, 而不是根据情况随意选择。当然, 存在着适用于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理论, 而数据分析又使得这些理论更为精确, 并且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特定假设的影响。

信息理论研究方法就随机变量和独立数据提出假设, 同时这些变量与数据在每一个案例中都会得到特别说明。结构化的、有重点的案例需要在理论建构的方面满足假设。这或许很难, 但这是包括结构化的、有重点的方法在内的所有案例分析方法所面临的困难 (George and

Bennett 2005)。数据分析使得潜在的假设更为精确，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重要性。在结构性的、有针对性的比较中，当任何符合理论标准的案例都被选择进来的时候，随机假设就是合理的。当一个现象具有足够的独特性可以被当作特殊的案例来研究时，就可以对它进行数据独立假设。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在数据选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会对后期整理数据产生限制。在面对一系列数据时，熵方法是一种直接的描述影响因素与结果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单纯从随机样本中对总体做出统计学推测的过程，研究者必须对推测的过程保持谨慎。

此外，前文提到的例子中还说明了一种限制，即熵方法无法将变化规律完全相同的变量区别开来。然而想要解决少量观测样本带来的数据限制却是没有捷径的。信息分析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变量的结构，同时强化我们对这些限制的理解。定量案例分析可以在进一步小样本数据的共线性分析中发挥作用。

最后一步是将信息分析置于所有小样本数据分析技术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正如上文所显示的，信息分析是一种可理解的、充分的工具，它使得结构化的、有核心的比较更为精确与系统化。它也可以在更复杂的小样本定量分析中发挥作用。这里我们指的是定量案例分析（Ragin 1987; Rihoux and Ragin 2009）、二对二因果关系检验（Braumoeller and Goertz 2000; Seawright 2002）与贝叶斯推理模型（Western and Jackman 1994; Dion 1998）。这些方法与我们的方法一样，希望提高小样本数据分析与多种方法分析的准确性，但是它们在具体的目的与使用者方面却是不同的。这些方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通过合并或减少相关变量，或将研究者的认知作为小样本分析的先决信息等方法，为我们的方法的形成提供了多种路径。所不同的是，信息分析在原有设计的基础上加强了定量分析，并且不需要作者改变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被学者广泛地使用。

## 结论

在对定量与定性分析进行补充的基础上，产生了研究多样性方法的潮流。不可否认的是，定量与定性分析均吸收了反事实理解（Fearon 1991）与科学方法（King et al. 1994; Van Evera 1997; Bueno de Mesquita 2002）的部分逻辑，而这股潮流正源于此。一般来讲，多样性方法复合分析将大样本分析的系统准确性与定量分析的深度与细致性结合起来。我们在本文中所主张的信息分析，可以通过给我们提供便于使用的工具——以更倾向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对比较案例进行更加系统化的深入研究。

当然，信息分析并不是解决案例太少、变量太多、数据缺失、有偏见的研究目的这些基本问题的捷径，它也并不能解决在定量与定性分析中，概念形成、实际操作与测量等过程中的潜在问题。

这个方法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设计研究方案。例如，数据分析可以说明在试验中，与其他变量相比，有些理论变量会有多么重要。因而，在未来的介绍中这些变量就会被更多地检测。在试验中有效的要素可以在寻找对比案例和建构理论中发挥作用。

最后, 针对政策分析与设计,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理论创设者在减少了不确定变量的基础上, 决定与分析他们所获得的信息。结构化的、有核心的比较方法为需要更深层次分析的小样本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它将科学方法的基本逻辑运用于定量分析之中。当变量的理论来源性与案例选择的严谨性可以得到保证的时候, 数据分析方法就能够为理论提供证据。但在我们本文所提供的例子中, 某些特定的案例的结果却依然是模糊的并且独立的。信息分析方法既不能改变变量的数量与结构, 也不能改变结构化、有核心的比较案例中所包含的信息量, 但他们可以使结果与特定因素之间的影响变得更加清晰。

信息分析有利于强化案例研究, 它计算简单, 并且是综合性的——综合了定性研究的精确性与定量研究的深度。学者们可以运用这里所提供的信息分析方法对先期研究进行评估, 设计新的研究, 以及说明他们的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在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世界中, 这一先前不受重视的研究方法, 应该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表 7 强制外交信息理论分析

Computation		Coercive Diplomacy Factors (Independent Variables)								
		Clarity of Objective	Strong Motivation	Asymmetry of Motivation	Sense of Urgency	Strong Leadership	Domestic Support	International Support	Fear of Escalation	Clarity of Terms
Data frequency counts: (x, y)	count ( $x_i = 0, y = 0$ )	2	0	4	3	1	1	3	3	4
	count ( $x_i = 1, y = 0$ )	2	4	0	1	3	3	1	1	0
	count ( $x_i = 0, y = 1$ )	1	0	1	1	0	2	1	1	1
	count ( $x_i = 1, y = 1$ )	2	3	2	2	3	1	2	2	2
Joint probabilities: p(x, y)	count ( $x_i = 0, y = 0$ )/n	0.29	0.00	0.57	0.43	0.14	0.14	0.43	0.43	0.57
	count ( $x_i = 1, y = 0$ )/n	0.29	0.57	0.00	0.14	0.43	0.43	0.14	0.14	0.00
	count ( $x_i = 0, y = 1$ )/n	0.14	0.00	0.14	0.14	0.00	0.29	0.14	0.14	0.14
	count ( $x_i = 1, y = 1$ )/n	0.29	0.43	0.29	0.29	0.43	0.14	0.29	0.29	0.29
Probabilities: p(x)	count ( $x_i = 0$ )/n	0.43	0.00	0.71	0.57	0.14	0.43	0.57	0.57	0.71
	count ( $x_i = 1$ )/n	0.57	1.00	0.29	0.43	0.86	0.57	0.43	0.43	0.29
Conditional probabilities: p(y x) = p(x, y)/p(x)	count ( $x_i = 0, y = 0$ )/count ( $x_i = 0$ )	0.67	*	0.80	0.75	1.00	0.33	0.75	0.75	0.80
	count ( $x_i = 1, y = 0$ )/count ( $x_i = 1$ )	0.50	0.57	0.00	0.33	0.50	0.75	0.33	0.33	0.00
	count ( $x_i = 0, y = 1$ )/count ( $x_i = 0$ )	0.33	*	0.20	0.25	0.00	0.67	0.25	0.25	0.20
	count ( $x_i = 1, y = 1$ )/count ( $x_i = 1$ )	0.50	0.43	1.00	0.67	0.50	0.25	0.67	0.67	1.00
Conditional entropy	$H(Y X)$	0.96	0.99	0.52	0.86	0.86	0.86	0.86	0.86	0.52
Mutual information	$I(Y;X) = H(Y) - H(Y X)$	0.02	0.00	0.47	0.13	0.13	0.13	0.13	0.13	0.47

(Notes. \*Undefined because there are no cases where  $x_i = 0$  for this variable).

[翻译: 宁鹏举、李 漩、宋一宁、李 萌]

[责任编辑: 宁鹏举]

[校对编辑: 胡阳阳]

## 一碗给出国党的鸡杂汤

吕海\*

我叫吕海，是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生，现在是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以下简称 CMU）公共政策与管理全球项目的硕士生（Master of Science in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 Global Track，以下简称 PPM）。由于是全球项目，所以我第一年是在 CMU 的澳洲校区度过的，今年八月会在 CMU 的本部匹兹堡校区继续学习。这次正好借“海外南开人”这个栏目，梳理一下我这近一年的留学旅程。由于现在已经不再继续学习国际关系方面的内容，所以本文更侧重讲讲自己出国的心路历程和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希望对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有一些帮助。

出国党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心态问题，面对陌生的环境容易产生很多消极的心态。以我自己为例，就在出国初期对自己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首先就是对新的课程内容的不熟悉而产生的挫败感。由于本科念的是国际关系，所以对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不太熟悉，在学习公共政策相关课程时面对每周动辄几百页的阅读也就更觉吃力。加上 PPM 项目综合性较强，还包含经济、金融、管理相关的课程，更别提 CMU 引以为豪的 IT 相关的课程了，虽然每天都能让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即使都只是入门类的课程，从未接触过的学科知识也让我感觉难度骤然上升。此外，作为母语非英语的国际生，对于老师们各式各样的口音（尤其是粗犷浓郁的澳洲口音）也是倍感无奈，而没口音的老师讲的内容又显得那么陌生。这些困难都让我产生了很强烈的挫败感，感觉就好像西西弗斯一样，每天好不容易将大石头推上高山，第二天发现了新的大石头静静躺在山脚。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这点在我所在的学院（Heinz College）尤其明显。因为虽然我们学院的公共政策与管理项目名声不错（在 U.S. News 的 Public Affairs 中排名第九），但完全不能跟学院内的另一个项目——信息管理系统硕士（Maste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以下简称 MISM）——相比，因为 MISM 的 U.S. News 的专业排名中位列第一。由于名声在外，MISM 项目的总人数也远远多于 PPM。而且，程序员们在就业市场中相对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一点在找实习的过程中也已经被事实证明：当我们 PPM 的同学们每天都在焦虑地等待回应的时候，MISM 的同学们已经在发愁到底该选哪个实习了。于是，每次在 MISM 同学问我“你说学你们这个专业今后能干什么”的时候，我的小玻璃心也是碎了一地的。

挫败感加上同辈压力，让人非常容易自我怀疑，比如会产生“弱者为什么要战斗”这种中二而又消极的想法，动摇自己的意志和决心。

而摆脱这种消极的状态则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经历。在某次随堂测验后，跟班里的同

---

\* 吕海，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硕士生，2014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学们一起去喝酒,然后我操着稀烂的英语跟一位美国同学大吐苦水,告诉他自己的不适应与迷茫。听完我的话,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嘿,你个老伙计!当初不是你自己选择来这儿的么?”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我想起当初自己做出选择时的豪情壮志和无限憧憬,再想想自己现在的消沉状态,不禁羞愤难当。“自己做出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啊!男人,就应该不畏艰险,去战斗,去冒险!”我这样想着,慢慢有种振作起来的感觉。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给这位美国同学点了杯好酒,然后潇洒地甩甩头,没付钱就跑出了酒吧。

经过这次酒吧谈话,我开始尝试用积极的姿态去解决问题。首先是正视不懂的问题,然后厚着脸皮寻求帮助。经济学有不懂的问题,就缠着出身经济学的同学问问题;金融有不懂的地方,就对有会计工作经验的美国同学死缠烂打;IT 课程有不懂的知识点,就觑着脸问 MISM 的各位大神。同时,也更加不要脸地问老师和 TA 各种问题。在各种追问中,我也逐渐熟悉了不同学科的话语体系,开始掌握正确的学习姿势。

其次就是端正心态,制定自己的目标。我开始把隔壁颇受欢迎的 MISM 专业的羡慕嫉妒恨转换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正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果自己也想要在以后的职场上更有竞争力,那就多学些实用的技能。比如说我自己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发现自己在数据库管理这一课程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自己也比较感兴趣,于是就下决心向数据分析这方面发展,于是选很多相关课程。虽然难度很大,但也收获颇多,对未来的定位也越来越清晰。

总而言之,如果在出国初期对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不适应,也一定要记得自己出国的初心,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也要有自己的坚持,不要人云亦云,盲从所谓的“大潮流”,而对自己妄自菲薄。受到其他“大势所趋”学科的同学的鄙视时,不要玻璃心,而是要立足现实和自己的兴趣,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手上的资源提高自己。

此外,留学生在英文应用方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更要抓住各种机会练习英语。正所谓用进废退,很多当初托福高分的程序员同学由于只跟中国人组队导致英语水平比出国前还要差,也让人唏嘘不已。还有很多同学可能觉得自己英语不好,所以不敢说话,我给这些同学的建议就是:“说自己的英语,让别人难受去!”反正说得不好折磨的是别人,自己何必如此难以释怀?此外,还有一个误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老外很喜欢叫上大家一起在课后或者周五去酒吧喝酒,很多很乖的同学就会想:“哎呀去酒吧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啊?!”这可就是天大的误会了。酒吧(pub)之于老外就如茶馆之于中国人,只是一种聊天休闲的生活方式,而且国外的 pub 基本没有大家害羞而又期待的事情发生,最多也就有几个醉汉发发酒疯唱唱歌之类的。想要看你脑中想的那种打马赛克的事情,还是要多花点钱去夜店(night club)才行的,咳咳。所以如果今后大家出国有这种社交的机会,一定要好好利用,不仅可以提高英语姿势水平(老外很喜欢纠正语法错误的),还可以扩展自己的人脉(networking),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

杂七杂八说了这么多,只希望能给大家的留学生活做出一点帮助。不管今后学习的是哪

个学科,也不管今后会有多少困难,请一定不要忘记自己之前为了出国所做出的付出与努力,因为这些记忆能帮你牢记你当时的决心和豪言壮语,也能让你记住:都装过逼了,哪儿那么容易跑?

[责任编辑:刘芮宁]

[校对编辑:刘志]

### ..... 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国家利益观的比较 .....

早期的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认为利益即权力,而权力又来源于国家实力,国家实力则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政府质量与外交质量等几个方面,这些物质力量成为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后来现实主义的的国家利益观发展为国家利益包含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国家尊严与荣誉。

而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则认为利益是由意愿决定的,利益是“想要的东西”,利益本质上是决策者头脑中的认知或观念。国家利益驱使国家认知他们,解读它们的含义,并依此决定怎样定义主观利益。

有一种观点认为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并不是推翻了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而是对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的一种批判性继承与发展,建构主义也认为物质力量构成了一定的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是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建构在界定国家利益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物质力量只有经过了国内文化观念的认知、建构才能成为一国的国家利益,进而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行为。总之,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国家只能尽力去实现它而不能选择它,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国家利益由观念决定,一国的文化观念可以建构该国的国家利益。

资料来源:王青:《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两种模式——利益认知与体系结构分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系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10月。

[整理:唐铭兴、李天翼]

[责任编辑:唐铭兴]

## 英采飞扬

**【编者按】**本期收录了2010级本科生谷天一同学的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作者以乌克兰问题为例，探究联合国是否能够有效地实现它的宗旨。在文章中，作者介绍了《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主权平等、保护人权的規定，并结合联合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中的表现，分析和评价联合国在维护其宗旨上的成功和失败之处。

### Whether U.N. Fails to Fulfill its Objectives? The Case of Contemporary Ukraine

Tianyi Gu \*

**Abstract:** It has been asserted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resolve the on-going conflicts in Ukraine demonstrates the inabi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to fulfill its objectives in U.N. Charter and to apply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se objective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success and failures of U.N.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most important global organization really realize its mission, to save humanity from hell. We find that because of structural limit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fails to provide solution to Ukraine crisis, U.N. still plays some positive roles to prevent the situation from becoming much worse. In Ukraine, the United Nations does not successfully fulfill its objectives, it does not completely fail neither.

**Key words:** UN Charter; objective; principle; Ukraine

#### 1. Introduction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potentially the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 ever known to the world of states.<sup>①</sup> However, the UN cannot solv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and fulfill its objectives as nation-states within their territory. Especially facing on-going conflict in Ukraine, the UN seems unable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as its tenet required that “to save humanity from hell.”

The Ukraine crisis began to deteriorate in late February 2014 and later reached full-scale conflict in the east Ukraine.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has since continuously deteriorated despite an earlier Minsk cease-fire struck in September last year. Recentl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adopted a resolution endorsing measures formed in Minsk On Feb 12 2015. However, the future of Ukraine remains bleak.<sup>②</sup>

---

\* Tianyi Gu is a undergraduat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Kai University.

① Ian Hurd, *After Anarchy: Legitimacy and Power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

② “United Nations/Ukraine: 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s resolution endorsing new cease-fire on Ukraine crisis,” *Asia News Monitor* [Bangkok], Feb 20, 2015.

Among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a contentious and popular issue i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achieve its assumed objectives.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Ukraine crisis by study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set up in the UN Charter. We will analyze the UN's ineffectiveness and achievements in Ukraine separately and then mak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 **2.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in the UN Charter**

Affected by the bloody experience of two world wars, in 1945 the United Nation was founded principally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settle disputes among states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s the fundamental document,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lays down four principals in Article 1 and seven principles in Article 2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organization is to operate.

The objectives set out in the UN charter includes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promoting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states, harmo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lthough all of these objectives are important f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human beings, hierarchy among them indeed exists. 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avoiding another tremendous world war is the primary concer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ile other objectives especially protecting and advancing human rights, to a large extent, are in a subordinate position. Here, we will focus on objectives and related principles in three aspects.

### **2.1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The United Nations is designed to eliminate the scourge of war, thus the first and primary purpo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mentioned in the UN Charter Article 1 is: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to that end: to take effective collective measur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removal of threats to the peace, and for the suppression of acts of aggression or other breaches of the peace, and to bring about by peaceful means, an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djustment or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or situations which might lead 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Related to this objective, the third principle in the Article 2 is:

“All Members shall settle their international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in such a manner that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justice, are not endangered.”<sup>①</sup>

---

<sup>①</sup>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pter I: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The United Nations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 last visited on March 22, 2015.

This objective requires international actors to solve their disputes by diplomatic and judicial means instead of wars.

## 2.2 Protect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ince the United Nation is built on the agreement among sovereign states, to protect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is an important aim of the UN, which is expressed in the first and fourth principles in Article 2.

“The Organizatio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 equality of all its Members.”

“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sup>①</sup>

## 2.3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the preamble of the UN Charter, “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s used rather than “we states”, which is regarded as a clear recognition that the new organization values individuals.<sup>②</sup>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purposes in the UN Charter emphasizes the UN’s attention on human rights issue.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nd to take other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universal peace.”

“To achie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promoting and encouraging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or fundamental freedoms for all without distinction as to race, sex, language, or religion.”

In fact, the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m in the UN Charter are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we pick some up and categorize into three aspect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m conveniently. Next, we will analyze whether these objectives and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se objectives are appropriately fulfilled in the contemporary Ukraine crisis.

## 3. Failures in Achieving Objectives

In Ukraine crisis, the United Nations does not completely fulfill its objectives. We will demonstrate that in three aspects.

Regarding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the United Nations does not effectively fulfill its objective to restrain conflicts. This failure are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

①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pter I: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The United Nations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 last visited on March 22, 2015.

② Sean D. Murphy,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est, a Thomson business, 2006, p. 320.

On the one hand, the UN has not offered any substantial proposal on the resolution on Ukraine crisis which would be accepted by main actors. Because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UN Security Council,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he Security Council had struggled to negotiate a mutually acceptable text for the resolution. Without reaching consensus among main powers, fighting has continu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Ukraine for a year after the first ceasefire settlement.<sup>①</sup>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 fails to dispatch peacekeeping forces to supervise the ceasefire. From the Minsk I took effect, both the interim President of Ukraine, Oleksandr Turchinov, and President Petro Poroshenko have appeal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send UN peacekeepers to monitor a ceasefire in eastern Ukraine. While pro-Russia rebels denounced Ukrainian government's call for peacekeepers and claimed that the presence of peacekeeping forces would violate the ceasefire.<sup>②</sup> In addition, Moscow is reluctant to vote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deployment of UN peacekeepers to Ukraine, instead, Mr. Putin would like to send peacekeepers under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a military bloc lead by Russia. As a result, the United Nation did deploy any peacekeepers in Ukrai.

Regard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is the key issue. The United Nations behaved powerlessly on that.

The UN took two activities on Crimea. First, at the request of the interim government in Kiev,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voted for condemning the referendum in Crimea, which was vetoed by Russia unsurprisingly. Secon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on March 27 was approved by 100 countries and 11 countries rejected as well as 58 countries abstained, which called on nations not to accept the Crimean referendum. Although it was a huge diplomatic achievement, this resolution did noth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of Crimea.<sup>③</sup>

Different from conflicts in other continent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which national sovereignty is the main obstacle for external forces to intervene, the problem in Ukraine is that one of a UN member's sovereignty is being violated but the strength is not enough to stop.

Regarding human rights, although the United Nations achieved certain success in humanity aid in Ukraine, but it is far from satisfying refugees' demands. More needs to be done, the officials stressed that they only have five percent of the \$316 million sought for humanitarian efforts in Ukraine. In some cities of Luhansk and Donetsk and surrounding areas,

---

① Derrick Mbatha, "Security Council endorses package of measures to resolve Ukraine crisis," *News and Media United Nations Radio*, Feb 17,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english/2015/02/>, last visited on March 22, 2015.

② Elizabeth Piper, "Ukraine calls for U.N. peacekeepers to observe ceasefire," *Reuters*, Feb 19, 2015.

③ Alexander Nekrassov, "Ukraine crisis: What's the UN doing about it?" *Al Jazeera*, Apr 21, 2014.

conflicts significantly has disrupted access to food and basic services, and the UN humanitarian aids cannot reach these most suffered places.

Three institutional reasons hinder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constructing a more harmony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irstly, the privilege of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blocks the solution when accidents involve their core interests. In fact, the UN Charter is itself based on a compromise between power and law. The basic weaknes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caused by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 equality of member states and the privileged position of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to veto.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requires all the permanent members to take measures, while a permanent member often use the veto power to serve individual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case of Ukraine, without Russia's obstruction, the UN is likely to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eace settlement.

Secondly, the UN lacks independent military power to take actions since member states would not surrender their sovereignty to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UN system are under great pressure from outside, and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tend to block the UN's actions.<sup>①</sup> Without a robust permanent military force, the United Nations has to improvise in dealing with conflicts.<sup>②</sup>

Thirdly, the regime of peacekeeping is questionable. The deploy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s are contingent on the consent of all parties in the conflict, which means that the unilateral disagreement from separatists can block any foreign intervention involving peacekeepers. In addition, "blue-helmet" missions could only patrol certain areas and have little authority to enforce compliance.<sup>③</sup>

#### 4. Success in Fulfilling Objectives

However, the United Nations by no means did nothing to fulfill its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in Ukraine.

First, regarding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the UN established a set of norms that everyone to live by. To make their actions effective, even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have to take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legitimacy into account.<sup>④</sup> Thus,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UN as 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framework, Russia cannot directly send army

① Druna Molina Faidutti,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Journal of Future Studie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olicy*, 2014.6.4, pp. 22-245.

② Robert Weine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ar in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19, No. 1, 2003, pp. 75-106.

③ Carol J. Williams and Sergei L. Ioiko, "Ukraine appeal for U.N. peacekeepers unlikely to succeed,"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9, 2015.

④ Tharoor Shashi, "Why America Still Needs the United N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5, Sep/Oct 2003, pp. 67-80.

to Ukraine although they maybe covertly support the rebels. And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both Russia and the West have to restrain the means they use, which successfully prevents the confrontations between super military powers. To prevent another world war is the original and the most crucial objective of the UN and the UN has successfully made this point till now.

Second, regard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which calls on nations not to accept the Crimean referendum showed tha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not tolerate Crimea's changing status, and to some extent, isolated Russia. Although it cannot change Russia's real control over Crimea,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it denied Crimea was a part of Russia. In addition, without the UN's actions, Russia even do not have to use the tactic of referendum.

Third, regarding humanitarian aid, the relief materials from the UN indeed mitigate peoples' pain in eastern Ukraine. The UN already has a significant humanitarian operation under way in Ukraine, delivering medicine, blankets, food, hygiene kits, and household items to those in need. The United Nations-led Preliminary Response Plan for Ukraine that calls for a more substantial and coordinated international support to Ukraine which covers both emergency needs and early recovery. The first UN humanitarian convoy brought a total of 62 tons of goods and materials. These supplies include vital medical products, which could prevent hundreds of children being born with HIV as well as save over 38 000 persons affected by HIV and 5000 persons affected by tuberculosis in Donetsk and Luhansk.<sup>①</sup>

### **5.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UN unable to fulfill its cardinal objectives and to apply principles faithfully and consistently to save humanity from hell, we have to know how far from contemporary situation in Ukraine to the hell.

Of course people in Ukraine are now suffering horrible pains which we outsiders cannot experience. Nevertheless, the United Nations do take some measures to avoid the situation to become even worse. Without the consensus among five permanent members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it is impossible for UN to solve the Ukrainian problem fundamentally, but it provide a crucial plat for super powers to negotiate.

---

<sup>①</sup> "UN delivers 62 metric tons of humanitarian aid to Ukraine," *Joint UN/WHO news*, February 19,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5/ukraine-medical-supplies/en/>, last visited on March 22, 2015.



Taking a step back, even though Donbas Arena has already fall into hell, the United Nations contributes to limit the scope of hell within Ukraine instead of total Eastern Europe or even the whole world. A new world war was prevented.

Overall, in Ukraine the United Nations does not successfully fulfill its objectives, it does not completely fail neither.

## 6. Conclusion

In former sections, we have analyzed the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in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ow the UN fulfill them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crisis to save humanity from hell. We focus on the UN's objectives of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which i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establish the UN, and other objectives on human rights in Article 1 as well as relevant principles in Article 2. We fi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failures to hold conflicts in Ukraine to a large extent demonstrate the inability of the UN to achieve its purposes, since the UN neither ensured the ceasefire settlement to be respected nor stopped Russia to annex Crimea.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ted Nations still play some positive roles in refraining both the West countries and Russia, providing humanitarian aids, which avert the situation become much worse.

We have to be clear about one point that the UN Charter does not establish a supranational state and the UN is not a world government. Thus, the UN cannot achieve all its aims regardless of member states' interests. But if we take a positive outlook, the UN has certainly developed a large network of mechanisms and structures to prevent conflicts and facilitating assistances to member states. At present,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fulfill its objectives and to apply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se objectives faithfully and consistently, because of not only external influence from power politics but also cumbersome internal procedure for amendment. However,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characterized as "organic instruments," therefore the creative and transformative practice could be a central force in driv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UN and making the UN more adapt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sup>①</sup>

[整理: 杨 雪、李冰莹]

[责任编辑: 李冰莹]

---

① Jessica Liang, "Modifying the UN Charter through Subsequent Practice: Prospects for the Charter's Revitalization,"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81, pp. 1-20.

## 2015 届毕业生特辑

**【编者按】**又是六月。六月的校园注定和毕业有关，和离别有关。而时间的流转常常是在不经意间，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迎来了大学生涯最不舍的时刻。回首大学四年，或有留恋或有遗憾。本期毕业特辑汇编学长学姐们大学生活的感言和恩师的寄语，统计了毕业生去向，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 【万象南开，百年一幻】

年华如风，流光飞度；  
南开四载，如梦似雾。  
溯思当年，懵懂初入；  
今朝别离，青春倥偬。  
幻梦如歌，长吟难驻；  
南开万象，此心永固。



#### 幻象·总理像

负笈干戈，济世为袖；  
公允大道，举誉环球。  
历史未锈，江山正守；  
天下识遍，此躯东流。

#### 幻象·主楼

敬礼育而鸣钟兮，发我气质；  
参天地而求途兮，启我慧光；  
格世故而容止兮，授我正意；  
歌荣辱而致一兮，曰其苍苍。

### 幻象·二主楼

天高地迥，英才蔚起；  
韬其光耀，器物方新。  
东傍源泽，大道在西；  
来者广厦，今者甲乙。

### 幻象·新开湖

新开之势，除却沧海；  
新开之水，寄我垂芒。  
春以载气，夏以载煌；  
朝承秋露，夕蕴冬藏。  
群骄绕岸，名士在旁；  
跃鲤之志，昔荣益昌。  
一湖一畔，与卿同撼；  
卫津百年，新开万象。



[图/文：刘雨洁 编辑：丁敏潇]

## 【院长寄语】

寄语 2015 届周政学院毕业学子：

人生自古谁无别？  
每逢毕业最关切！  
不舍南开恋师友，  
扬帆天涯创伟业！

——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院长）

## 【毕业感言】

于我而言，本科的毕业季洋溢着纵酒放歌与离愁别绪，两年后的今天，凤凰花香再起，同样面对《新视界》的毕业生特辑，心头芳馨静默。曾经千言万语，如今一时哑然，唯有教训几条，与君共勉。

其一，明确自己想要什么。别人的规划都只是参考，你需要的是内心的真正需求（你愿意用一生辛勤换取什么），以及一颗不会被外界干扰的心。

其二，珍惜时间。无论你选择工作还是继续进修，一时都有一时的任务，如果在读书的年纪看韩剧，该学外语却沉溺于小说，那么等真正用到它们时，你就只能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去“补课”，影响你早日实现事业发展与财务自由，进而，你离你想过的生活又远了一步。

其三，寻找增量，而不要急于切蛋糕。一个人不愿意首先付出，就无法取得别人的信任。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可以过得不错，但会失去更大的发展。

——姜忆楠（天津） 2015 届国际关系硕士毕业生、2013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一梦六年终须别，万语千言欲语休。无论身处何地，愿我们都能共忆这段旧时光！无论身处何事，愿我们都终将幸福快乐！

——石宇（山西） 2015 届国际关系硕士毕业生、2013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以前一直觉得毕业是一个很遥远的词，直到临近六月，突觉毕业加速而至，更加珍惜仍在南开的每时每刻。回顾南开四年，做了许多未曾做过的事，认识了许多真诚的朋友，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认识了一个复杂的自己。毕业在即，最不舍一众好友，希望天涯海角，有缘再聚首，初心不变，友谊长存。

——郭晓琼（山西）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四年荏苒，鼓瑟吹笙。众里寻她，津门南开。踌躇满怀，找那旧日的足迹。蓦然却料，此刻无声胜有声。

——黎富铭（香港）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大学四年，忽然而已，不敢说往事历历在目，因为白驹过隙，很多事情转瞬已成过去。四年时间，不短不长，但对一个人来说，大学本科四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这四年的经历可以说足以影响后面几十年人生的轨迹。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有付出也有收获，我也早已不是当年懵懵懂懂的那个新生。这四年中，我得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需要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危机感，时代瞬息万变，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当然或必然会发生。

我在南开收获的种种，必然会在今后的人生征途中发挥作用。我想对南开的栽培、师长的关怀又有同学朋友的友谊致以谢意。毕业时刻已经临近，但是前路依旧漫漫。

——杨家嘉（湖南）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散场转身，不写离殇，待佳期。我是爱南开的。

——孙跃（天津）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还有几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回首大学这几年，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里我要感谢我大学老师，同学以及所有在这四年中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们，正是你们的帮助和陪伴带给了我四年精彩时光。现在我们虽然马上就要迎来毕业，大家也将各奔东西，不过相信只要我们彼此间情谊长存，我们就永远不会真的分别。那么最后，就让我们向着这承载了我们青春岁月与美好回忆的校园告别，一起踏上新的充满希望的征程吧！

——宋勉（北京）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 国际关系系 2015 届部分毕业生毕业去向

姓名	年级	学位论文题目	指导老师	毕业去向
马逸群	2013 级硕	中国梦的国际影响	吴志成	香港浸会大学
姜忆楠	2013 级硕	中国的国际话语力研究	吴志成	南开大学商学院
李志宇	2013 级硕	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探析	韩召颖	中国农业银行 天津分行
张晓龙	2013 级硕	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徐振伟	新华社
董柞壮	2013 级硕	美国崛起过程中的海外利益保护	刘丰	南开大学读博
任娟	2013 级硕	非对称联盟管理 ——以冷战期间美苏为例	刘丰	天津市选调生
王宝盆	2011 级本	主场外交：内涵、形式与影响	吴志成	南开大学读研
赵姝婧	2011 级本	全球风险社会：成因与治理 ——以环境问题为例	吴志成	南开大学读研 (伯明翰大学项目)
张敬伟	2011 级本	战争如何结束的——讨价还价模型下 对 1990 年以来战争的分析	吴志成	英国杜伦大学
刘芮宁	2011 级本	美、日、俄核心利益比较分析	赵龙跃	清华大学读研
李昕宇	2011 级本	从乌克兰危机看中美俄大国关系调整 的新机遇：中美俄外交战略选择的动因 与影响分析	赵龙跃	香港理工大学

左锦涛	2011 级本	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对小布什政府外交的“理由-关系”分析	徐振伟	中国人民大学读研
彭紫嫣	2011 级本	冷战期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及影响	徐振伟	南开大学 研究生支教团
黎富铭	2011 级本	从“占中运动”来看 美国对香港的隐形渗透	徐振伟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杨家嘉	2011 级本	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总统决策分析	刘兴华	外交学院读研
宋勉	2011 级本	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障碍因素 及对策分析	刘兴华	英国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
程康	2011 级本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 话语权变化研究	刘兴华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郭晓琼	2011 级本	以 ISIS 为例试析次国家行为体 对中东国际体系的影响	霍特	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
江涵	2011 级本	乌克兰的国家认同危机及其影响	霍特	香港中文大学
廖帆	2011 级本	尼克松与美国对华缓和政策	霍特	英国爱丁堡大学
昔春梅	2011 级本	从中韩 FTA 看东亚一体化	霍特	韩国企业银行 (IBK)
王学旺	2011 级本	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国家间军事冲突	阎梁	南京大学读研
胡静雯	2011 级本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交人才 培养问题分析	阎梁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项鲁恩	2011 级本	美国对中东地区经济与军事援助浅析	阎梁	北京康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沈琳	2011 级本	浅探中以关系的特殊表现和未来走向	黄海涛	北京大学读研
鲁悦	2011 级本	宗教因素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黄海涛	英国伦敦大学
陈磊	2011 级本	全球化时代新兴国家崛起 与国际经济机制改革	杨娜	复旦大学读研
周泉	2011 级本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前景展望	杨娜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郭天语	2011 级本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新挑战及其影响	杨娜	北京国华置业 有限公司
崔乘振 (韩)	2008 级本	未来中韩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赵龙跃	韩国独岛研究所

## 【新视界人物纪念】

**姜忆楠**

2015 届国际关系硕士毕业生、2013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2010 年 9 月到 2015 年 4 月之间为系刊服务

我虽未在《新视界》诞生于班刊之际就加入其中，却也自大二开始就一直为《新视界》服务至自己学生生涯的终结，从无停息，对于《新视界》的感情不需多说。最后给为《新视界》奋斗的学弟学妹一句话：做一个靠谱的人，这是《新视界》对你们的要求，也是它能够带给你们的财富。

**董柞壮**

2015 届国际关系硕士毕业生、2013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2010 年 9 月到 2015 年 4 月之间为系刊服务

慨此日离刊而去，一缕情思无所寄，从今热血何处抛；  
待他年视界益新，五洲豪杰闻其名，当慰先驱英气豪。

**李志宇**

2015 届国际关系硕士毕业生  
2013 年 9 月到 2015 年 4 月之间为系刊服务

参与系刊的编辑工作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认真细致与踏实稳重的态度以及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我即将离开南开园，在此大胆向学弟学妹提几句肺腑之言：务必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在南开这片沃土上吸取“营养”疯狂成长；热爱生活，热爱亲人师友，保持健康的心态；多思考，善思考，要谋划好并实践好自己的人生道路。时光匆匆，望大家珍惜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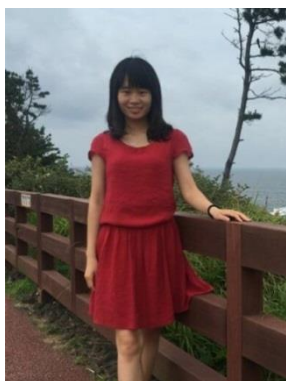


### 刘芮宁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2012 年 9 月到 2015 年 4 月之间为系刊服务

从大二进入系刊，到大四即将离别。惊讶的发现其实，时间才只有两年，我却感觉与它相处甚久。我在系刊学到很多，编辑的能力，访谈与约稿的小技能等等，这些是说的出的，还有更多说不出的感情。在系刊，有老师的关怀，有学长学姐的帮助，以及靠谱的学弟学妹们和一群忠实的读者。新的时刻即将来临，希望各位对系刊的热情不减，继续为系刊的发展和完善添砖加瓦，不断探索《新视界》的“新视野”，与君共勉。



### 于凯玥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2012 年 3 月到 2015 年 4 月之间为系刊服务

《新视界》是我所在时间最长、付出最多的学生组织，所以感情也是最深的。每次拿到新刊都怀着既喜悦又忐忑的心情，因为它不仅是工作成果的呈现，工作中的失误也会暴露出来。《新视界》的工作并不难，只要你怀着一颗热爱的心，抱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一贯严谨的作风，就能把它做好，而它给予你的回报将会更多。希望学弟学妹们能把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进行完善，新视界越办越好！



### 郭晓琼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2012 年 6 月到 2015 年 4 月之间为系刊服务

伴我走过大二到大四三年的系刊《新视界》，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它是一个虽不十分宽阔但却五光十色的平台，让人汲取知识技能、收获友谊、展现自己，让我们看到团队努力后收获的成果——每一期所有编辑部成员付出时间、精力制作完成《新视界》刊物。正因如此付出，我相信《新视界》也许被每个人收藏在心里不同的角落，但每个人的心里一定有独属于它的位置。临别之际真心企盼，希望系刊以后越办越好，内容更加精彩，受到更多老师同学朋友们的欢迎和喜爱。





### 程康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

2012 年 6 月到 2015 年 4 月之间为系刊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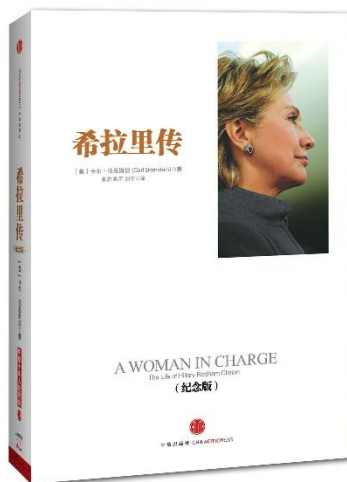
相聚总是短暂的，但正是这种短暂才能成就美好。《新视界》就像一盏明灯，在你刚入大学时给你以指引，让你知道国关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大学生活该如何度过。在《新视界》的时间里，我从一个最基础的编辑到责任编辑再到执行主编，从对 Word 一知半解到现在能熟练使用 Word 进行编辑，感谢新视界对我的帮助。

[整理：赵姝婧、丁敏潇]

[责任编辑：丁敏潇]

## 新书架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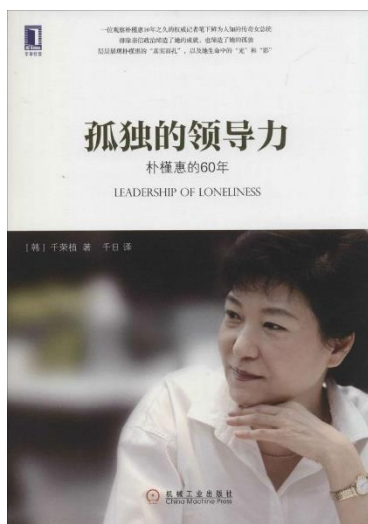
**【编者按】**自古以来,国家领导人中少有女性。而正是这些少数的女性领导人,为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是历史上的武则天、伊丽莎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是现当代的撒切尔夫人、默克尔等。当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正在积极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或许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女总统。本期新书架栏目以此为契机,专门挑选了几本最新出版的介绍国际政治中的著名女性领导人,或曰女性政治家的书籍。虽然这些书的总体理论色彩和前几期相比相对少一些,却也符合国际关系中女性主义的关注焦点,读来颇有一番趣味。



[美]卡尔·伯恩斯坦:《希拉里传(纪念版)》(张岩、魏平、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本书作者系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曾因报道“水门事件”而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作者从构思到撰写共耗时6年,力图全面、客观和公正地记录美国政坛上最耀眼、最具争议性的美国前“第一夫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的真实人生。全书时空跨度极大,从希拉里童年和学生时代写起,详细记述了她如何支持、协助克林顿成功当选总统,并讲述了媒体曝光率较高的“赖斯案”、“白水案”、“莱温斯基事件”的

相关细节,以及她曲折的总统竞选之路,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希拉里。



[韩]千荣植:《孤独的领导力:朴槿惠的60年》(千日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本书的写作起始于2003年,作者把朴槿惠在青瓦台度过的童年生活、父亲遇刺后变为平民、再到总统大选胜出的种种过程一目了然地展现给读者。作者看到了作为普通人的朴槿惠的孤独,也看到了作为政治人的朴槿惠身上的孤独。作者在书中始终坚持将普通人朴槿惠和政治人朴槿惠统一起来理解,而且还以把朴槿惠的个性所带来的肯定面与否定面放在一起考虑的态度思考问题。对朴槿惠而言,原则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个人。她认为,人总是会离开的。她的“无心论”境界之高令人不得不叹服。这些都是她在特殊的成长背景下形成的属于自己的哲学。本书把触角伸到过去,描绘出了朴槿惠的真实面孔。相比其他的各种记录,作者在本书中对朴槿惠的描述更加丰满,也更加让人信赖。



**首度解密美国外交绝密档案**  
一部了解当今国际政治的必读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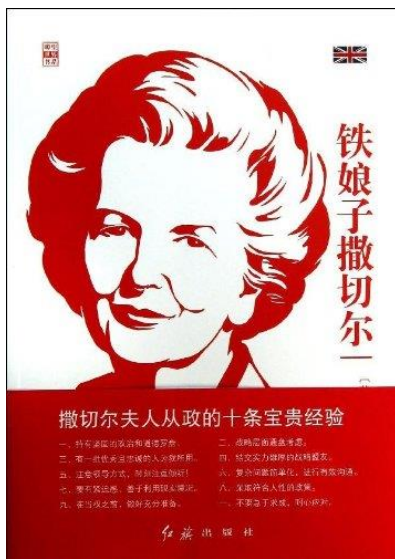
美国第一位黑人女国务卿 赖斯唯一亲笔从政回忆录

湖南人民出版社

[美]康多莉扎·赖斯：《无上荣耀》(刘勇军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年。

本书是赖斯回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八年从政生涯的唯一亲笔回忆录。2005 年，赖斯出任国务卿，被赋予更大责任，成为朝鲜六方会谈、伊朗核危机、巴以和谈、印度和巴基斯坦争端、北约东扩、台海危机等国际热点事件背后举足轻重的策划者甚至主导者。在本书中，赖斯首次披露了她如何在幕后操纵，处理一个又一个重大危机，以维护美国的利益。本书第一次让你有机会走进决定国际局势的秘密谈判室，了解当今国际要闻背后的真相

和细节。在赖斯流畅犀利而富有美国式幽默的笔下，你还将近距离领略布什、普京、奥巴马、布莱尔、卡扎菲、沙龙、阿拉法特等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风采和趣闻，并深切体会到美国所代表和追求的价值观与治国理念。



[英]约翰·布伦德尔：《铁娘子撒切尔》(邓继好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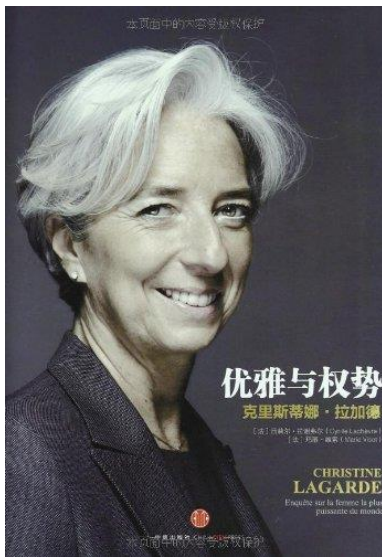
本书主角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包含有她任英国首相时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她退休后的方方面面。撒切尔夫人以一种有力的、不拖泥带水的方式，为世人提供了一份最不容置疑的铁娘子范本，她阐述了何为“撒切尔主义”及其真实含义。1978-1979 年的冬季英国经济萧条。在如此不利的起点上，撒切尔夫人接任首相一职；然而，在她历时 11 年的励精图治下，整个英国经济形势明朗，国家民众重拾自信。作者以简洁的篇章和短小精悍的引文，描述了撒切尔夫人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时体现出的果断风格、

处乱不惊、临危不乱惧和迷人的吸引力。布伦德尔将撒切尔夫人任期中的种种事件、英国国内外因素联系起来，解释了政治改革和当今英国政坛自不待言的政治现状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原因。这本传记并非仅仅讲述了撒切尔夫人的人生，更围绕着各重大事件，对相关理念、利害关系和背景进行了检视。



[德] 斯蒂凡·柯内琉斯：《默克尔传：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她的权力世界》（杨梦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

安格拉·默克尔于 2005 年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并在 2009 年和 2013 年的大选中成功连任。默克尔坚定、果敢、自信，素有德国政坛“铁娘子”之称。本书作者斯蒂凡·柯内琉斯是德国知名记者，自 1989 年开始持续采访默克尔，不仅得到了默克尔的充分信任，也多次随其出访各国，并且是唯一一位能够查阅默克尔私人资料馆的媒体人。作者用生动的笔触，从默克尔的童年讲起，不仅讲述了她爱旅行，喜欢交朋友，私下是个冷面笑匠的一面，还向我们展示了默克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萨科奇、奥巴马、普京等政治巨头进行斡旋的过程，以及她如何以睿智卓绝的战略引领德国冲出重重危机，重建辉煌。



[法] 西莉尔·拉谢弗尔、玛丽·维索：《优雅与权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孟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从世界最大律所之一的贝克·麦肯思律师行总裁到法国财政部长，再到 IMF 总裁，拉加德在一向由男性主宰的法律和金融界脱颖而出。本书主要讲述了拉加德任职法国财长期间的经历，包括她初上任时的窘境，以及凭借其独特的个性和处事方式终成为法国政治乃至世界政治明星的故事。拉加德任职法国财长期间正值次贷危机爆发，因此本书还透漏了欧盟主要国家在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的决策过程以及在救市计划中的博弈。

[整理：姚丽丽、胡阳阳]

[责任编辑：胡阳阳]

## ♣学术交流♣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做客“周恩来论坛”**

(转自南开新闻网)“中美之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彼此的信任、尊重与联系,我们也应当推进中美年轻一代的相互交往……”一席深色西装,一条“南开紫”领带,3月20日,美国前国防部长、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威廉·科恩做客“周恩来论坛”演讲“当前中美关系及其未来”。



演讲前校长龚克在商学院会见了科恩。副校长关乃佳,国际学术交流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商学院负责人陪同会见。龚克介绍了一年来南开的新发展、新变化,双方就当今世界局势,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

科恩分析了中美两国在全球的角色与定位,他说,美国不能扮演“直接干预他国政策”的角色,但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参与和帮助他国,如何在全球性事务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比如美国的军费开销上亿美元,但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不如将这些军费投放在国内设施的建设方面。同时,中国应当考虑在全球肩负的责任,考虑如何平衡各方势力。习近平主席目前大力整治腐败,这是明智之举,这会让中国更加自信,有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树立和今后的发展。

关于中美关系,科恩认为,应当利用彼此充足的信息和资源,找到一条相互合作的道路。比如食品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健康安全等方面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双方可以探索解决问题的合作之路。在回答学生现场提问“中国的强大是否成为美国的威胁”时,科恩再次强调,中美之间可以成为“同盟者”甚至“竞争者”,但绝不是“敌人”。

威廉·科恩于2009年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2011年受聘天津市市长顾问(海外),目前还担任美国科恩集团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科恩已经8次访问南开并在周恩来论坛发表演讲。

**莱克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刘志 摄影:李金潼、迟永)4月3日,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大卫·莱克(David A. Lake)做客南开大学周恩来论坛,并给师生们带来了两场精彩讲座。讲座分别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志成教授、韩召颖教授主持,南开大学

师生代表踊跃参加。

第一场讲座的题目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莱克教授指出,理论的作用既有学术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理论界发生了三次著名大辩论,或者说是范式之争。这些范式在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有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折中主义和中层理论都是不错的选择。莱克教授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大辩论与其说是范式之争,不如说是认识论之争。他预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将呈现出以下趋势:一是范式之争将趋于平淡,二是对中层理论以及问题解决的相关理论将会得到重视,三是对因果过程的强调。

第二场讲座的题目是“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首先,莱克将“等级制”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他认为,政治系统中存在着强制和权威两种权力形式,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无政府和等级制两种形态,等级制有经济和军事两种维度。其次,莱克阐述了美国视角下的等级制。当前,美国同中国、俄罗斯、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的关系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的特征;而在拉美、欧洲等地区则呈现出等级制国家间关系。再次,莱克总结了美国等级制的教训。他认为等级制是一种动态的、连续的协调过程,存在着利益偏好的问题,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在等级制边缘容易产生危机。最后,莱克采用等级制的视角对未来中美关系做出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也将寻求建立自身的等级制,为了保证全球和平,中美应当秉持开放的原则承认和尊重对方的等级制范围。

大卫·莱克(David A. Lake),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当前国际关系学界最具声望的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 意大利驻华大使受聘南开客座教授并做客周恩来论坛

(政府学院网站新闻)4月9日,意大利驻华大使白达宁先生受聘为我校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并做客周恩来论坛围绕“中意关系”展开演讲。

致聘仪式前,校党委书记薛进文在省身楼会见了白达宁。副校长关乃佳,国际学术交流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负责人陪同会见。薛进文对客人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南开大学发展历史、学校规模、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情况,感谢白达宁大使为南开和意大利高校交流合作做出的贡献。

致聘仪式在省身楼报告厅中举行。大使一行走入报告厅落座后,由我校学生合唱团清唱

一首《美丽的南开我的家》和一曲《塞尔维亚理发师序曲》作为简短的欢迎仪式，专业级水准演唱赢得热烈掌声。薛进文为白达宁颁发致聘证书并佩戴校徽，关乃佳主持仪式，中欧论坛创始人、我校客座教授高大伟介绍了白达宁的简历。



在受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后，白达宁表示非常荣幸，他说，中国对于欧洲、意大利来说，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和意大利同为文化超级大国，两国教师、学生间应当更多交流，更加全面了解对方。

在关于“中意关系”的演讲中，白达宁首先介绍了意大利的优势与困境。他说，今天的意大利，拥有 6200 万人口，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九，是欧洲第二大工业强国，欧洲第二大农业强国，每年贸易顺差 430 亿欧元，这是好的方面。同时，意大利面临着三大困境：意大利体系竞争力下滑，欧洲战略政策、欧元等多边环境及意大利体系的结构缺陷。

白达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介绍了中意两国的“对话”。他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对话不断加深，两国关系也变得愈加亲密和友好。在政治上，意大利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保持在联合国立场一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欧盟、意大利都不能不考虑与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积极的关系。

在经济方面，双边贸易巨大发展，意大利企业结构对中国企业具有资本转移、专业技术方面的贡献。但同时，意大利对中国存在结构性贸易逆差，他认为，未来两国的主要任务是消除经贸合作中的不平衡。白达宁提到，2014 年，意大利向中国发放了 40 万份签证。意大利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也意味着两国能有更多的贸易合作以及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更全面的融合。

在文化方面，白达宁说，中国和意大利作为两个“文化超级大国”，分别是孔子儒家学说和西方文明的摇篮，希望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积极发展孔子学院和但丁学院，积极传播汉语和意大利语及两国文化。“我们需要更多的交流，更多意大利人来中国，更多中国人到意大利，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中意两国语言、文化的传播。”

2004 年，中意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年间，两国在众多领域开展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当前，为推进两国关系推出一些新的举措，如举办商务论坛，未来还可以成立文化论坛，在农业、医疗、城市化、农副食品、航天航空等五大领域优先发展合作关系。今年恰逢中意建交 45 周年之际，米兰世博会也即将举办，中国积极参与其中，世博会为加强中意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提供中意契机，两国未来可以有更好的图景。“让我们共同

见证 2010 上海世博向 2015 米兰世博的交接!”

演讲最后,白达宁与南开大学意大利留学生合影留念,叮嘱他们好好学习汉语,为两国交流及文化传播做出积极努力。

白达宁大使 1974 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政治学系,并于 1975 年开始外交生涯,自 2013 年 1 月 5 日起任意大利共和国驻华大使。

## 世贸组织问题专家来访南开大学

(政府学院网站新闻) 4 月 8 日下午,著名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专家、欧洲大学研究院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全球经济项目主任伯纳德·霍克曼和国际经济法学专家、美国科德尔·赫尔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坎宁安受邀访问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接见了两位专家,



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和国际学术交流处等负责人,会见中两位专家愉快地接受了我校的邀请,成为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佟家栋副校长亲自为两位专家颁发了聘书。

伯纳德·霍克曼是欧洲大学研究院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全球经济项目主任(全球治理项目),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伯纳德·霍克曼毕业于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欧洲大学研究院之前,曾任世界银行国际贸易局局长、发展研究部国际贸易处处长、世界银行研究院贸易培训项目主任等职。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1988-93)谈判期间,伯纳德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秘书处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多边贸易体制、经济发展、服务贸易、和优惠贸易协定等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论著,在 WTO 研究领域影响很大。

理查德·坎宁安是科德尔·赫尔研究所所长,也是美国著名的国际贸易法律专家,美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律师事务所 Steptoe & Johnson LLP 的合伙人。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坎宁安先生不仅代理美国企业和政府处理多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的主要案件,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提供有关国际贸易政策和法律咨询,包括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市场准入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政府采购、标准、出口管制、和有关服务贸易的税收问题。他曾任韩国政府建立与美国和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咨询专家。



##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周恩来论坛演讲“全球气候抗战”

(政府学院网站新闻)“我们当前面临着全球变暖、海平面升高、极端天气等的威胁,这些现象正变得越来越频繁与极端,而这主要归咎于人们生产生活、交通等产生的温室气体大量排放。”5月16日,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在南开大学演讲时,对全球气候变暖表示担忧。



他呼吁,必须共同抗争气候变化——人类没有其他出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法比尤斯对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召开表示十分乐观。“科学研究的大环境改观了,科技有了极大的进步。绿色科技更成本更低也更方便了,私人企业在做到绿色发展的方面也非常活跃,他们意识到绿色发展模式能够带来高盈利。”法比尤斯说,“更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两国在去年11月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愿意在减少碳排和对抗气候变化上作出自己的努力,这对其他国家有很好的带动作用。”

“在我有一次访华时,有人告诉我‘危机’的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危’‘机’并存。如果我们不重视气候问题,那最终会演变成‘危’,而当我们不懈努力之时,‘机’就能出现了。”法比尤斯信心十足地说,“去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中法两国在过去50年内一直走在国际关系前沿,我非常有信心两国能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再次携手充当先锋角色。这次会议不是有可能成功,而是必须要成功。”

历数法比尤斯在南开大学的演讲,他关注的话题总是事关全球。2009年4月27日,法比尤斯初次访问南开大学并受聘为南开大学名誉教授,并作题为“今日欧盟”的演讲;2011年3月12日,法比尤斯再度访问南开,提出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南开大学与法国鲁昂高等商学院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并在南开大学发表演讲表示,21世纪再不会是某一个大国的“独角戏”,全球合作、共同发展才是趋势;2014年2月24日,法比尤斯第三次访问南开大学,受聘为南开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首席教授”,并发表题为“21世纪全球治理”的演讲。

洛朗·法比尤斯1946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国国立行政学校,这是法国顶级培养国家高级文官的学校。1981年至1983年,任法国财政与经济部长,1983年至1984年任法国工业与研究部长,1984年至1986年任法国总理,2000年至2002年任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此外,他于1988年至1992年、1997年至2000年两次出任法国国民议会主席。2012年,他正式出任本届法国政府的外长。

## ♣ 师生活动 ♣

**新老管理层业务交接暨新章程讨论会成功举办**

(通讯员: 江昊宇) 2015 年 5 月 19 日,《新视界》新老管理层业务交接暨新章程讨论会在范孙楼 440 成功举办。《新视界》的全体新老管理层和部分编辑部成员出席讨论会,此次会议由现任主编胡阳阳主持。

本次会议主要对 2014-2015 年度的《新视界》章程进行细致讨论和完善,参加讨论会的全体成员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前任主编刘芮宁和其他管理层成员为新章程的修改提出众多宝贵且实用的建议。经过全体与会成员的讨论,最终正式通过 2014-2015 年度《新视界》章程。

新章程由宗旨、组织业务、组织结构与人事职责、考核与评价以及成员发展、退出、换届与章程修改五部分构成。其中,章程对《新视界》内部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整个编辑部将按照职能专业化原则划分为学术组、宣传组、联络组和后勤组四个部门,各部门分别承担组织分配的栏目编辑任务和履行相对应的部门功能,由原先的执行主编统筹改为各部门独立自主内部协调。在考核与评价部分,新增“优秀团队”和“优秀编辑”评选,进一步激励编辑部成员的积极性。另外,新章程涉及到微信公共平台建设的内容,微信公共平台是《新视界》适应新媒体发展的产物,该平台将在本学期下半年作为《新视界》的核心业务进入各位国关学子的学习生活中。

新章程将从 2015 年秋季号起正式实行。《新视界》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完善的发展模式,新一届管理层领导的《新视界》将立足根本、锐意创新,专注于作国关系各年级的“连接器”,为各年级同学搭建学习、交流与经验分享的平台,以原创、优质、实用和启发性的信息,满足国关系同学对平时学习、升学和就业等咨询需求。

**《新视界》编辑部成功进行换届选举**

(通讯员: 江昊宇) 2015 年 4 月 12 号,本刊编辑部在范孙楼 116 会议室举行了主编、副主编和副主任的换届选举。2012 级本科生胡阳阳当选为新一任主编,2011 级本科生赵姝婧当选为新一任副主编,2012 级本科生宁鹏举、2013 级本科生江昊宇和 2013 级本科生李天翼当选为新一任副主任。



本次换届选举共有 7 名同学参加竞选, 1 名同学竞选主编, 1 名同学竞选副主编, 5 名同学竞选副主任。7 名同学在选举投票前进行了精彩的竞选演讲。除了感谢《新视界》对自己的帮助和展示自己的优秀能力外, 7 位同学分别阐述了对《新视界》未来发展的建议。他们希望《新视界》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 以纸质版系刊为基点, 多元化发展。还有同学希望大胆改革编辑部的组织结构, 以创新带动活力。这些同学的想法都非常新颖、切实, 为《新视界》的发展提供新的构思。最终, 通过现场匿名差额投票、等额投票和场外短信投票的方式, 确立了最新一届的《新视界》管理层。

在新一届管理层的带领下, 《新视界》一定会继续保持特色, 锐意创新, 开阔国关人的视野, 展现国关人的风采。

## ♣校外短讯♣

### 北京大学

●2015 年 3 月 21 日由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正式开幕。主题是: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范士明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贾爱英主任到会并向全体与会人员致辞, 北京大学国关学院李寒梅教授、南开大学宋志勇教授、复旦大学张浩川教授分别从各自专业角度对本次大会的召开提出了期望和要求。

●2015 年 3 月 31 日下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与美中政策基金会美国国会助手团在未名湖岛亭会议室座谈。该团一行 19 人, 主要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与共和两党重要议员的办公室主任和立法主任等组成。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于铁军副教授和王栋副教授以及本硕、国际项目部分学生参与座谈。会议由王勇老师主持, 双方就中美关系、AIIB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对朝政策以及我国

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2015 年 3 月 25 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题为《欧洲如何应对欧债危机》的主题报告会, 欧盟委员会经济与金融事务司马科·布提总司长(副部长级)担任主讲嘉宾。国际关系学院陈绍锋副教授主持了报告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内外师生 80 余人参加了本次报告会。欧盟委员会经济与金融事务司 Peter Bekx 和 Moreno Bertoldi 先生, 欧盟驻华代表团经济与金融处处长 Annika Melander 女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源教授等参加了报告会。

●2015 年 3 月 31 日, 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华盛顿美洲对话组织(Inter-American Dialogue)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提供赞助的“中拉关系 2015: 超越互补”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外交部拉美司、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

学历史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等机构的中方代表,以及来自华盛顿美洲对话组织、秘鲁驻华使馆、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拉美开发银行(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美中商会(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等机构的外方代表,共计 4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2015 年 4 月 17 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境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管理”。本届论坛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教授、中国进出口中国进出口银行信贷审批委员会委员李福胜教授、中电投云南国际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蒋立哲副主任和商务部研究院蒋姮副研究员

●2015 年 4 月 21 日上午,墨西哥前外长、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豪尔赫·卡斯塔涅达(Jorge Castañeda)前来北京大学为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做了题为“新兴市场与新兴大国”的讲座。墨西哥驻华大使温立安(Julián Ventura)先生、墨西哥驻华使馆政治处主管亚历杭德罗·阿尔卡德(Alejandro Acalde)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范士明副院长、郭洁副教授、陈长伟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董经胜教授、中国社科院拉美所郭存海博士、秘鲁《商报》记者柯裴(Patricia Castro Obando)、中央民族大学张青仁博士等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2015 年 4 月 26 日,由《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变迁”

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2014 年 5 月 8 日,应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美国研究中心共同邀请,美国负责东盟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福克斯(Michael Fuchs)访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与学院师生就“当前的中美关系”座谈。此次座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主持,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范士明教授、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王栋副教授、吴湘宁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晨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等 40 余人参加了座谈。

●2015 年 5 月 20 日上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成功举办题为“中国是否符合‘全球大国’的标准?——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讨论”(What is Global power and in what ways does China have it)的学术专题报告会。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华威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熊·布思林(Shaun Breslin)担任主讲嘉宾。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主持了报告会。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贸易处参赞吕天豪(Thomas Langelaar),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丁斗教授、王栋副教授、陈绍锋副教授、郭洁副教授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部分硕士生、博士生 20 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2015 年 5 月 14-15 日,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

斯学会在美国华盛顿成功举办 2015 年度“中美民间战略对话”。此次二轨对话主题为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在两天的对话中, 参会中美专家就中美对国际秩序的看法, 中美共享利益与责任, 对全球秩序的潜在挑战, 亚太安全与未来国际秩序, 中美对东亚政治、经济、安全架构的愿景的异同, 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合作, 中美经济议程和现代治理体系比较, 危机管理与危机预防机制, 美国经济形势, 以及 2016 年美国大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此次对话还特别邀请美国财政部负责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官员就 2015 第七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吹风。

#### 清华大学

●2015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戴维·莱克 (David A. Lake) 应邀来国际关系学系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莱克教授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关系学学者, 于 2006 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迄今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 并出版了《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等一系列极具影响的学术专著。3 月 31 日晚 6 点, 戴维·莱克教授与国际关系学系教师和部分研究生座谈, 就学术思想和学术合作进行交流探讨。出席座谈的有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社科学院党委书记兼国际关系主任史志钦教授、社科学院副院长陈琪教授等师生。随后, 莱克教授在新水利馆 300 为国关系及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关于美国

国际关系理论的精彩讲座。活动由国关系庞珣教授主持, 史志钦教授出席讲座。

#### 复旦大学

●在今年 2 月 16-21 日于美国新奥尔良市举行的国际研究协会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 ) 年会上,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 唐世平教授于 2013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获得了 ISA 的“年度最佳著作奖” ( ISA Annual Best Book Award )。

●4 月 10 日, 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应教育部的邀请,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亚洲校园”项目暨“亚洲风险管理专家”团队, 应邀就项目发展进行了专题报告。项目主任、外事处副处长敬义嘉教授和日本神户大学双学位学生加藤纱贵分别进行报告, 为三国教育部官员介绍了项目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 并与三国专家进行了热烈的现场互动。东道主交通大学的团队也参加了汇报。

●2015 年 4 月 7 日晚, 杰罗姆奖学金 ( The Jérôme Lohez 9/11 Scholarship ) 颁奖仪式于法国驻沪总领事官邸举行。法国驻沪副领事、杰罗姆奖学金基金会设立者德宁 ( Dening Lohez ) 女士、法国驻沪总领馆相关工作人员、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扶松茂副教授、国际办公室刘倩洁、梁静敏和张云翔老师出席颁奖仪式,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部分中外学生参加该活动。

### 中国人民大学

●2015年3月26日,韩国前国务总理、国会议员李海瓚先生在明德国际楼408会议室应邀前来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为了东北亚之梦”的讲座。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主持。讲座开始之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陈岳教授为李海瓚前总理颁发客座教授聘书,聘请李海瓚前总理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2015年3月20日-4月11日应学院邀请,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专家,《剑桥战争史》主编方德万教授访问学院,并以“全球化和中国”为题为广大师生作了4场系列讲座。系列讲座由李晨老师主持。

●5月11日至15日,中国人民大学PPE(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复合型本科专业)项目代表团对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伦

敦大学学院(UCL)的PPE项目进行了深度的交流访问和考察。PPE项目代表团团长为哲学院院长姚新中教授,成员有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闫瑾副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经济学院周文副教授、哲学院原理博士、哲学院教务科副科长张时坤和国际关系学院教务秘书曹司彬,以及正在牛津大学进行访学的哲学院韩东晖教授。英国是PPE项目的发源地,它始创于牛津大学,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为英国培养出了多位首相、政治商业精英和知名记者。人民大学PPE项目委员会主任姚新中教授表示,之所以选择这三所英国大学进行访问,是因为这三所大学处在英国的PPE教育不同的发展阶段,既带有英国典型的大学教育风格,又有着各自的教育理念、教学优势和特点,而这些优势和经验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开展PPE项目所应当学习和借鉴的。

[整理: 赵天畅、刘芮宁、李安琪]

[责任编辑: 李安琪]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5 年 3 月——2015 年 6 月)

(文章按照第一作者姓名拼音顺序排列,相同作者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同一作者发表多篇文章时,只做一次介绍。)

### 1. 刘丰:《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 期。

**摘要:**定性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由于它综合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种主流研究方法的优点,并且擅长处理社会现象中普遍存在的复杂因果关系,因此它已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和应用。定性比较分析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形成了清晰集分析、模糊集分析与多值分析三项主要分析技术,而且新的有关时序分析的技术也在开发之中。在国际关系学界,定性比较分析的应用成果主要集中在战争、冲突和威慑等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定性比较分析的实际操作过程可以分为研究设计、软件计算和结果表达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包含了若干特有的步骤和技巧。由于综合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优点并弥补了它们的明显缺陷,定性比较分析具有很强的方法优势,但仍存在案例敏感性高、条件变量的数量限制、变量取值缺乏客观标准、无法有效处理时序问题等不足。

**关键词:**定性比较分析;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 2. 罗马诺·普罗迪、黄海涛、刘兴华:《新丝绸之路与中美欧关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摘要:**<正>我非常高兴来到南开,这是我第三次访问这里。我第一次来天津是在 1984 年,那时你们台下的大多数同学尚未出生。我非常喜欢到南开来,如果你们认为我表现还不错的话,希望你们下次再请我来,因为每过几年,我都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希望与大家分享。接下来,我将就“新丝绸之路”谈谈我的看法。我将会谈到国际大环境之下的丝绸之路建设以及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欧洲当前到底在做什么?欧洲发生了什么问题?我当然是从欧洲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

**关键词:**新丝绸之路;中欧关系;中美关系;国际大环境;天然气价格;石油储备;地区迁移;石油化工产业;消费经济;内部权力

作者简介: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男,南开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政治家,曾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总理;黄海涛,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刘兴华,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3. 吴志成:《理性认识当今国际体系的变化》,《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摘要:**〈正〉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志成教授发表的《国际体系仍然处于多极化进程中》(《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7 期)一文认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相互依赖日益增强、大国关系更加复杂的当今时代,观察和分析国际体系的变化、特征与形态,必须保持理性冷静和战略定力,立足于较长时段国际形势的全局、整体、主流和大势,综合考察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制度安排、大国关系变化和主要国家战略意愿等诸多因素进行审慎研判。

**关键词:** 国际力量对比; 国际制度; 大国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 国际形势; 综合考察; 国家战略; 定力

作者简介: 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4. 吴志成:《中国周边外交需更加重视战略谋划》,《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1 期。**

**摘要:**〈正〉周邻稳则国家安,周边安全在国家整体安全和外交全局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遵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在外交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战略谋划; 总体布局; 国家主权; 美国全球战略; 核心利益; 经济合作; 海陆; 黄岩岛; 命运共同体; 区域基础设施

**5. 吴志成、陈一一:《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2 期。**

**摘要:** 领土问题是现代国家产生以来影响国家间关系与地区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因素,领土安全则攸关国家生死存亡。在既有的各种国家间争端和矛盾中,领土争端最常见、最易于复发且最有可能引发战争行为。作者在具体梳理和评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综合性考察战争起因的“走向战争”理论模型为评估框架,总结了影响领土争端复发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若干假设:政体开放度较高则争端复发率较低、具有军事冲突过往经验则争端复发率较高、冲突双方含有大国则争端复发率较低、双方相对实力差距大则争端复发率低、与外部国家存在联盟则争端复发率较高、经济合作水平高则争端复发率低。结合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后发现,与领土争端复发显著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联盟、军事冲突的过往经验、主要大国、争端协调方式、争端双方经济合作水平、争端双方实力对比和政体类型,其中,外部联盟、军事冲突的过往经验、争端协调方式三者对争端复发的影响最为明显。

**关键词:** 领土争端; 反复爆发; 走向战争模型; 争端协调

作者简介: 陈一一,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6. 吴志成、李金潼:《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摘要:**〈正〉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志成、李金潼发表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政治学研究》2014 年第 5 期)一文指出,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深化,环境污染、金融危机、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扩散,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迫切呼唤更多行之实效的国际公共治理方略。面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国从自身核心利益与实际能力出发,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

**关键词:** 政治学研究; 中国视角; 核心利益; 领土争端; 跨国犯罪; 全球性问题; 义利; 金融危机

作者简介: 李金潼,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7. 吴志成、袁婷:《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历史演进与理论探索》,《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摘要:**〈正〉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志成、袁婷发表的《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论析》(《外交评论》2014 年第 3 期)一文认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根据和平发展目标,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成功实践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更好地以大开放促进改革深化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的开放战略。

**关键词:** 互利共赢; 促进改革; 经济全球化; 对外开放领域; 战略论; 中国特色; “中国威胁论”

作者简介: 袁婷,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8. 吴志成、李金潼:《践行区域合作共赢与全球协商共治的中国方案——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当代世界》,2015 年第 5 期。

**摘要:**〈正〉“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接亚非欧商贸与人文交流的主要通路,曾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贸易、政治与文化交流。进入新世纪新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加速,古老的丝绸之路历久弥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主动因应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出共同构筑“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

**关键词:** 区域合作; 国内国际形势; 文化交流; 中国综合国力; 主要通路; 民族复兴; 古代中国; 经济发展水平; 生机活力; 国际舆论环境

9. 徐振伟:《粮食危机与农业的未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摘要:**随着全球饥饿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全球总人口的增长,人们对于粮食危机的担忧正逐步变为现实。但从各种数据来看,全球粮食的人均产量完全可以满足人类需求,不至于使人类陷入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对此唯一正确的解释只有分配的不均、全球的贫富分化以及各地区局部的贫富分化导致了分配的不均,这正是粮食危机的真正原因。转基因技术被一些人认为是解决粮食危机的良方,但该技术学术界尚有巨大争议,其安全性难以保证。粮食危机的背后伴随着各种政治性的博弈,其代表即欧美等国广泛推行的农业补贴政策。许多学者呼吁中国政府效仿这一政策,认为农业补贴可以刺激粮食增产,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然而,大量的农业补贴带来的高失业率却被众人所忽略。

**关键词:**粮食危机;转基因;农业补贴

作者简介:徐振伟,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10. 杨雷:《“一带一路”战略的策略运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4 月 10 日。

**摘要:**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蓝图正式亮相。通读全文后,笔者认为该文件具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内容宏大,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气度;第二,强调合作共赢,吹响了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号角;第三,在中国,多部委联合发文不是新鲜事,但是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这一意义重大、引发国际关注的文件却是第一次。

作者简介:杨雷,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11. 杨雷:《乌克兰危机与美俄新冷战》,《和平与发展》,2015 年第 1 期。

**摘要:**对于美俄两国目前是否陷入新的冷战,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两个大国,美俄的矛盾将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在乌克兰危机的演变过程中,美俄两国关系中的冷战思维十分明显,这不仅伤害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也阻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并在东欧地区形成了近似“新冷战”的格局。如果认可这种新冷战格局的出现,那么对于其发展趋势,我们可以从美苏冷战的历史中找到参考,但是俄罗斯不会步苏联走向解体的覆辙。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俄罗斯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而乌克兰作为被新冷战所争夺的对象,它将很难摆脱领土被撕裂的命运。

**关键词:**美俄关系;新冷战;乌克兰局势;世界格局

12. 袁燕、刘晨阳:《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与 2014 年后的 APEC 进程》,《南开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摘要：**2014 年是 APEC 成立 25 周年。在过去 25 年里，APEC 在多个合作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随着国际和地区环境的演变，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促使 APEC 各成员共同努力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伙伴关系，以进一步提升 APEC 的影响力和亚太区域合作的水平。作为 APEC 的重要成员，中国将为推进构建新型亚太伙伴关系做出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APEC；亚太伙伴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者简介：**袁燕，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刘晨阳，男，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主任。

**13. 赵龙跃：**《“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观念更新与规则构建》，《光明日报》，2015 年 4 月 30 日。

**摘要：**在对外开放新阶段，我国面临的规则标准限制和争端越来越多。建设“一带一路”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挑战，如果不有的放矢逐一应对，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作者简介：**赵龙跃，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2 期

1. 邢广程：《理解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第 4-26+154 页。
2. 唐永胜、李冬伟：《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第 27-36+155 页。
3. 陈志敏：《中国的外交创新是否需要外交革命》，第 37-51+155-156 页。
4. 余潇枫、周章贵：《中印跨界河流非传统安全威胁识别、评估与应对》，第 52-70+156 页。
5. 刘毅：《关系取向、礼物交换与对外援助的类型学》，第 71-94 页。
6. 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第 95-117 页。
7. 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第 118-136 页。
8. 宋伟、宋卓如：《联盟的维持与瓦解：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第 137-153 页。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 期

1. 张宇燕：《美元、石油与制裁》，第 1 页。
2.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第 5-25+155 页。
3. 苏长和：《世界秩序之争中的“一”与“和”》，第 26-39+155-156 页。
4. 顾炜：《地区战略与大国崛起时对周边小国的争夺——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

启迪》，第 40-60+156-157 页。

5. 曾向红、王慧婷：《不同国家在“保护的责任”适用问题上的立场分析》，第 61-89+157-158 页。

6. 刘丰：《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第 90-110+158-159 页。

7. 马国林：《反思赫德利·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第 111-126+159 页。

8. 杨攻研、刘洪钟：《政府债务削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自发达国家长期历史的启示》，第 127-154+159-160 页。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2 期

1.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4-10+156 页。

2. 阿米塔夫·阿查亚、董贺：《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第 10-15+156 页。

3. 莫盛凯：《权力转移与预防性合作》，第 16-40+156-157 页。

4. 陈拯：《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第 41-64+157 页。

5.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第 65-95+157-158 页。

6. 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第 96-110+158-159 页。

7. 吴志成、陈一一：《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第 111-136+159-160 页。

8. 保健云：《分布理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第 137-155+160 页。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3 期

1. 高海红：《布雷顿森林遗产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第 4-29+156 页。

2. 张亚斌、范子杰：《国际贸易格局分化与国际贸易秩序演变》，第 30-46+156-157 页。

3. 王明国：《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第 47-73+157-158 页。

4. 卢凌宇、林敏娟：《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第 74-102+158-159 页。

5. 汤蓓：《规则制定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武力使用》，第 103-121+159 页。

6. 陈兆源、田野、韩冬临：《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 1982-2013 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第 122-148+160 页。

7. 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与欧亚地区优势竞争力的转移》，第 149-155 页。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4 期

1. 李东燕：《联合国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第 4-22+154 页。

2. 柳华文：《联合国与人权的国际保护》，第 23-42+154-155 页。

3. 徐奇渊、孙靓莹：《联合国发展议程演进与中国的参与》，第 43-66+155-156 页。

4. 高奇琦：《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第 67-87+156-157 页。

5. 潘亚玲:《西方干涉决策的规范性转向论析》,第 88-102+157-158 页。
6. 张旗:《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第 103-121+158-159 页。
7. 杨昊:《全球公共物品分类:外交决策的视角》,第 122-136+159 页。
8. 臧雷振、陈鹏:《选择性偏差问题及其识别》,第 137-153+159-160 页。

#### 《当代亚太》2015 年第 1 期

1. 张蕴岭:《如何认识和理解东盟——包容性原则与东盟成功的经验》,第 4-20+156 页。
2. 聂文娟:《东盟对华的身份定位与战略分析》,第 21-37+156-157 页。
3. 包广将:《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与流失的逻辑:本体性安全的视角》,第 38-62+157-158 页。
4. 贺刚:《目标寻求、身份稳定与行为体的本体性安全——以冷战后的北约为例》,第 63-78+158 页。
5. 姜鹏、斯捷潘尼杜什卡·波波夫:《规范变迁与身份再造: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第 79-97+158-159 页。
6. 熊谦、田野:《国际合作的法律化与金融制裁的有效性:解释伊朗核问题的演变》,第 98-130+159-160 页。
7. 谢晓光、周帅:《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东亚货币关系的演变:国际货币权力结构-进程视角》,第 131-155+160 页。

#### 《国际观察》2015 年第 2 期

1. 樊勇明、贺平:《“包容性竞争”理念与金砖银行》,第 1-14 页。
2. 郭树勇、史明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可能——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设立看世界秩序变革》,第 15-29 页。
3. 章玉贵:《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金融资本力锻造》,第 30-42 页。
4. 赵继臣:《金砖银行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第 43-53 页。
5. 叶自成、陈昌煦:《从美国“软实力”到中国“柔实力”——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评析》,第 54-70 页。
6. 王存刚:《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致路径——以秦亚青为个案的研究》,第 71-80 页。
7. 翟崑、余凯茜:《“亚太-中东”联动对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的制约》,第 81-99 页。
8. 戴启秀:《乌克兰危机对德俄关系及全球格局的潜在影响》,第 100-113 页。
9. 金永明:《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研究》,第 114-125 页。
10. 陈友骏:《论日本积极和平主义的实质》,第 126-138 页。
11. 陈拯:《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兴起、特征与挑战》,第 139-157 页。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1. 张蕴岭:《亚太经济一体化与合作进程解析》,第 1-11 页。
2. 崔宏伟:《美欧 TTIP 谈判与中欧关系》,第 12-28 页。
3. 梁雪村:《错置的议题:西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得与失》,第 29-48 页。
4. 孙萌:《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以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为例》,第 49-64 页。
5. 沈逸:《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原则之争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第 65-79 页。
6. 孙学峰、刘若楠、欧阳筱萌:《等级视角下的美国单极体系走向》,第 80-103 页。
7. 赵洋、袁正清:《国际组织与国际干涉行为》,第 104-122 页。
8. 熊李力、潘宇:《乌克兰困局:俄罗斯外交的延续性与断裂性》,第 123-137 页。
9. 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第 138-158 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11 期**

1. 袁鹏:《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第 1-9+63 页。
2. 李振广、吕耀东:《试评析日本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第 10-15+37 页。
3. 李益波:《浅析美柬关系的新变化》,第 16-22 页。
4. 刘青建、方锦程:《非洲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扩散问题探析》,第 23-28+59 页。
5. 宋颖慧:《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现状及其前景》,第 29-37+63 页。
6. 刘建飞、郭芳翠:《试论处在“最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第 38-44+64 页。
7. 薄燕、高翔:《2015 年全球气候协议:中国与欧盟的分歧》,第 45-51+64 页。
8. 王朔:《评欧元存在的条件及其前途》,第 52-59+64 页。
9. 许开轶:《亚洲安全:观念、挑战与前景——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 2014 年年会综述》,第 60-62 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12 期**

1. 林利民:《2014 年国际战略形势评析:怎一个“乱”字了得?》,第 1-9+36+65 页。
2. 牛新春:《中国国际身份刍议——国际横向比较视角》,第 10-16+65 页。
3. 李秉忠:《库尔德人建国活动的进展及其面临的挑战》,第 17-23 页。
4. 郑腊香、张自楚:《试析奥巴马对华经济外交》,第 24-29+51+65-66 页。
5. 傅勇、王建伟:《伊核谈判与美伊战略妥协前景》,第 54-70 页。
6. 方旭飞:《美国对马杜罗政府政策初探》,第 37-43 页。
7. 张继业:《试析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第 44-51+66 页。
8. 刘飞涛:《关于中美战略分歧管控的思考》,第 52-57+66 页。
9. 靳小勇:《“南海争端与东南亚国际关系”研讨会综述》,第 58-59 页。

10. 杨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研讨会综述》,第 60-61 页。

### 《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1 期

1. 傅莹:《2014 年是世界秩序转折之年》,第 1-3+65 页。
2. 陶坚:《多视角观察国际走势》,第 4-5 页。
3. 刘建飞:《2014: 世界仍然在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运行》,第 5-7 页。
4. 金灿荣、王博:《从六个事件看 2014 年国际形势》,第 7-8 页。
5. 傅梦孜:《世界经济尚待回稳增长的拐点》,第 9-10 页。
6. 赵晓春:《把握国际关系未来走向的几个重要问题》,第 10-12 页。
7. 李向阳:《中国周边环境的发展趋势》,第 12-14 页。
8. 张健:《2014 年欧洲形势回顾与前瞻》,第 14-15 页。
9. 江时学:《2014 年拉美形势中的喜与忧》,第 16-17 页。
10. 胡仕胜:《2015 年南亚热点透视》,第 17-20 页。
11. 牛新春:《中东仍然是 2015 年全球政治中最黑暗的地方》,第 20-21 页。
12. 时殷弘:《中国对外战略的最新变迁:从“战略军事”为主到“战略经济”为主》,第 21-23 页。
13. 何兰:《审时度势应对“中国世纪”的战略思考》,第 23-25 页。
14. 吴志成:《中国周边外交需更加重视战略谋划》,第 25-27 页。
15. 林利民:《中国国际战略宜稳扎稳打,切忌急于求成》,第 27-28 页。
16. 潘亚玲:《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力变化以及中国之应对》,第 29-34+40+66 页。
17. 叶建军:《美军“国防创新行动”评析》,第 35-40 页。
18. 严帅:《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第 41-47+62+66 页。
19. 罗国强、陈昭瑾:《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剖析——结合中国〈立场文件〉的分析》,第 48-54+66 页。

### 《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2 期

1. 袁鹏:《2015 年国际形势:否极泰来还是走向深渊?》,第 1-2 页。
2. 达巍:《2014 年国际乱象评析:太阳底下原无那么多新鲜事》,第 3-4 页。
3. 张运成:《2015 年世界经济需关注的几个“量”》,第 4-6 页。
4. 李伟:《从“伊斯兰国”肆虐看国际反恐新困境》,第 7-8 页。
5. 邢广程:《2015 年的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的选择》,第 8-10 页。
6. 王文峰:《美国外交是否正进入“后奥巴马”时代?》,第 10-12 页。

7. 林宏宇:《中美博弈对未来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第 12-13 页。
8. 王鸿刚:《2015 年中国对外战略如何落实?》,第 13-15 页。
9. 贾庆国:《新时期呼唤新理念、新做法:对我国外交的几点思考》,第 15-17 页。
10. 冯仲平:《把脉欧洲,引领中欧合作》,第 17-19 页。
11. 吴洪英:《中拉关系正在“升级换代”》,第 19-21 页。
12. 李永辉:《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关键性小国”:以斯里兰卡为例》,第 21-23 页。
13. 唐永胜:《在复杂的形势中寻求战略平衡》,第 23-24 页。
14. 蒋翊民:《美俄〈中导条约〉履约争议及其未来走向》,第 25-31+60+63 页。
15. 杨芳:《英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原因及其走势》,第 32-38+63 页。
16. 徐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新阶段、新挑战与新思路》,第 39-45+63-64 页。
17. 余民才、李博伟:《中国与南海仲裁庭的非正式合作及其效果》,第 46-52+64 页。
18. 李敏:《阿富汗局势现状与前景评析》,第 53-60+64 页。
19. 熊李力:《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第二届 UIBE 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综述》,第 61-62 页。

#### 《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2 期

1. 孙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第 1-11+141 页。
2. 刘振民:《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东亚伙伴关系》,第 12-15+141-142 页。
3. 阮宗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历史 赢得未来》,第 16-30+142 页。
4. 卢静:《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分析》,第 31-46 页。
5. 江时学:《美国与古巴改善关系的动因及其影响》,第 47-59 页。
6. 虞少华:《朝鲜半岛自主和平统一:基础与路径》,第 60-72+142 页。
7. 李福泉:《伊朗与阿拉伯什叶派关系》,第 73-84 页。
8. 宋黎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推进与问题》,第 85-102 页。
9. 姜跃春:《“安倍经济学”的困境与日本经济前景》,第 103-111 页。
10. 于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现状与完善路径》,第 112-126 页。
11. 魏民:《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问题与方向》,第 127-140 页。

#### 《美国研究》2015 年第 1 期

1.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第 10-33+5 页。
2. 赵可金:《民主的困惑: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政治逻辑》,第 34-53+5-6 页。
3. 宋国友:《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逻辑》,第 54-65+6 页。
4. 王传兴:《论人口迁移对美国政党体系演变的影响》,第 66-85+6 页。



5. 张业亮:《2014 年中期选举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第 86-104+7 页。
6. 温树英:《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改革及经验》,第 105-121+7 页。
7. 侯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大学(1917-1919)》,第 122-137+8 页。
8. 牛军:《世界的中国——评〈焦躁不安的帝国:1750 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 138-142 页。
9. 卢宁:《“美国兴衰与未来世界秩序”研讨会综述》,第 143-150 页。
10. 张勇安、黄运:《“首届长三角地区美国史研究交流”研讨会综述》,第 151-153 页。
11. 樊吉社:《“朝核、伊核与美国军控政策:现状与走势”研讨会综述》,第 154-155 页。

#### 《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6 期

1. 连玉如:《再论“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第 9-24+5 页。
2. 乔林生:《战后日本核政策再探讨》,第 25-39+5-6 页。
3. 赵光锐:《历史追溯与现实关切:德国学界西藏研究的新进展》,第 40-52+6 页。
4. 朱中博:《涉台外交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与思考》,第 53-75+6-7 页。
5. 冯峥:《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制度:互动模式及实证》,第 76-90+7 页。
6. 马国林:《国际社会的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第 91-104+7-8 页。
7. 本刊特约记者:《国际关系研究在台湾——张登及副教授访谈》,第 105-117 页。

#### 《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 1 期

1. 于铁军:《笔谈:日本战略文化与中日安全关系》,第 9-10 页。
2. 汤重南:《日本帝国的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第 11-20 页。
3. 徐勇:《近代日本的军政关系研究》,第 21-30 页。
4. 吴怀中:《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演变》,第 31-42 页。
5. 张沱生:《中日安全关系的现状与前景》,第 43-50 页。
6. 郭洁:《首钢秘鲁铁矿项目的历史与变迁》,第 51-73 页。
7. 金晓文:《墨西哥坎昆龙城项目的政治博弈及启示》,第 74-90 页。
8. 黄梅波、朱丹丹、吴仪君:《“后 2015 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第 91-112 页。
9. 李恒阳:《美国网络军事战略探析》,第 113-134 页。
10. 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第 135-153 页。
11. 蔡武:《以文化之光烛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第 154-157 页。

#### 《欧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1. 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第 1-20+165 页。

2. 于宏源:《知识与制度:科学家团体对北极治理的双重影响分析》,第 21-34+5-6 页。
3. 田德文:《解析英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第 35-48+6 页。
4. 杨解朴:《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路径解析:迈向新的灵活保障?》,第 49-63+6 页。
5. 刘涛:《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社会政策的 V 型转弯和政治光谱的中性化》,第 64-81+6-7 页。
6. 张金岭:《法国就业政策改革及其治理》,第 82-98+7 页。
7. 贺刚:《身份进化与欧洲化进程——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国入盟进程比较研究》,第 99-115+7 页。
8. 王帅:《英国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政策及演变(1989-1990 年)》,第 116-129+8 页。
9. 龚秀国、姚山:《中国公司对欧盟直接投资动因分析——基于“真实选择权”的视角》,第 130-143+8 页。
10. 马骏驰:《“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国际论坛”综述》,第 144-148 页。
11. 杨海峰:《新形势、新机制和新欧洲——第四届“海峡两岸欧盟研究论坛”综述》,第 149-153 页。

#### 《国际政治科学》2014 年第 3 期

1. 徐进、杜哲元:《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第 1-32 页。
2. 王铭:《唐代东北亚国家的“华夷”观念复制》,第 33-85 页。
3. 李少杰、赵可金:《中国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变迁》,第 86-113 页。
4. 巴里·布赞、迈克尔·考克斯:《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第 114-141 页。
5. 刘鹏:《缅甸的民主改革与美国的认可》,第 142-165 页。

#### 《国际政治科学》2014 年第 4 期

1. 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第 1-35 页。
2.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改革课题组、阎学通:《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机制》,第 36-63 页。
3. 崔立如:《中国外交面临命运共同体中的竞争——对〈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机制〉的评述》,第 64-68 页。
4. 贾庆国:《中国外交改革创新任重而道远——对〈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机制〉的评述》,第 69-73 页。
5. 山本美智子、张玮:《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的量化分析》,第 74-110 页。
6. 徐秀军:《学科史视域下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 111-145 页。

##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9, No. 2*

1. Ben-Nun Bloom, Pazit; Arıkan, Gizem; Courtemanche, Marie, "Religious Social Identity, Religious Belief, and Anti-Immigration Sentiment," pp. 203-221.
2. Toft, Monica Duffy; Zhukov, Yuri M, "Islamists and Nationalists: Rebel Motivation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Russia's North Caucasus," pp. 222-238.
3. Oberman, Kieran, "Poverty and Immigration Policy," pp. 239-251.
4. Enos, Ryan D; Hersh, Eitan D, "Party Activists as Campaign Advertisers: The Ground Campaign as a Principal-Agent Problem," pp. 252-278.
5. Sambanis, Nicholas; Skaperdas, Stergios; Wohlforts, William C, "Nation-Building through War," pp. 279-296.
6. McMahon, R Blake; Slantchev, Branislav L, "The Guardianship Dilemma: Regime Security through and from the Armed Forces," pp. 297-313.
7. Bachofen, Blaise, "The Paradox of 'Just War' in Rousseau's Theory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pp. 314-325.
8. Burns, Timothy W, "Philosophy and Poetry: A New Look At An Old Quarrel," pp. 326-338.
9. Finkel, Evgeny, "The Phoenix Effect of State Repression: Jewish Resist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 pp. 339-353.
10. Cederman, Lars-Eric; Hug, Simon; Schadel, Andreas; Wucherpfennig, Julian, "Territorial Autonomy in the Shadow of Conflict: Too Little, Too Late?" pp. 354-370.
11. Xu, Yiqing; Yao, Yang, "Informal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pp. 371-391.
12. Desmarais, Bruce A; Harden, Jeffrey J; Boehmke, Frederick J, "Persistent Policy Pathways: Inferring Diffusion Networks in the American States," pp. 392-406.

###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No. 1*

1. Guilhot, Nicolas, "Portrait of the realist as a historian: On anti-whiggism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26.
2. Weber, Cynthia, "Why is there no Queer International Theory?" pp. 27-51.
3. Peña, Alejandro M, "Governing differentiation: On standardisation as political steering," pp. 52-75.
4. Tansel, Cemal Burak, "Deafening silence? Marxism,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he spectre of Eurocentrism," pp. 76-100.
5. Langan, Mark, "Budget support and Africa-European Union relations: Free market reform and

neo-colonialism?” pp. 101-121.

6. Hagström, Linus, “The ‘abnormal’ state: Identity, norm/exception and Japan,” pp. 122-145.

7. Pinheiro, Diogo; Chwieroth, Jeffrey M; Hicks, Alexander, “Do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hibit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146-170.

8. Barkin, J Samuel, “Racing all over the place: A dispers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mpetition,” pp. 171-193.

9. Sharman, JC, “War, selection, and micro-states: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p. 194-214.

10. Hanrieder, Tine, “The path-dependent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ederalism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p. 215.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1***

1. Cian O’Driscoll, “Rewriting the Just War Tradition: Just War in Classical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pp. 1-10.

2. Valerie Morkevičius, “Power and Order: The Shared Logics of Realism and Just War Theory,” pp. 11-22.

3. Julia Bader, “China, Autocratic Patr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ina as a Factor in Autocratic Survival,” pp. 23-33.

4. Sarah Sunn Bush and Amaney A. Jamal, “Anti-Americanism, Authoritarian Politics, and Attitudes about Women’s Represent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Jordan,” pp. 34-45.

5. David Lektzian and Dennis Patterson,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inners and Losers of Sanctions,” pp. 46-58.

6. Tina Freyburg,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as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Socialization into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rough Cross-national Activities,” pp. 59-72.

7. Nick Dragojlovic, “Listening to Outsiders: The Impact of Messenger Nationality on Transnational Persua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73-85.

8. Colin M. Barry, Sam R. Bell, K. Chad Clay, Michael E. Flynn and Amanda Murdie, “Choosing the Best House in a Bad Neighborhood: Location Strategies of Human Rights INGOs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pp. 86-98.

9. Mark T. Buntaine, “Accountabil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Civil Society Claims fo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t the World Bank,” pp. 99-111.

10. Victor Asal, H. Brinton Milward and Eric W. Schoon, “When Terrorists Go Bad: Analyzing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Involvement in Drug Smuggling,” pp. 112-123.

11. Sam R. Bell and Jesse C. Johnson, "Shifting Power,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Preventive War," pp. 124-132.
12. Terrence L. Chapman, Patrick J. McDonald and Scott Moser,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Strategic Retrenchment, Power Shifts, and Preventive War," pp. 133-144.
13. Jeff Carter and Glenn Palmer, "Keeping the Schools Open While the Troops are Away: Regime Type, Interstate War,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pp. 145-157.
14. Hyun Jin Choi and Clionadh Raleigh, "Dominant Forms of Conflict in Changing Political Systems," pp. 158-171.
15. Sunhee Park, "Power and Civil War Termination Bargaining," pp. 172-183.
16. Neil Narang, "Assisting Uncertainty: How Humanitarian Aid can Inadvertently Prolong Civil War," pp. 184-19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9, No. 4***

1. Pieter Semeels and Marijke Verpoorten, "The Impact of Armed Conflic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Rwanda," pp. 555-592.
2. Judith M. Bretthauer, "Conditions for Peace and Conflict: Applying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Cases of Resource Scarcity," pp. 593-616.
3. Leonardo Baccini and Andreas Dür, "Investment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p. 617-644.
4. Arzu Kibris, "The Conflict Trap Revisited: Civil Conflict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pp. 645-670.
5. Edy Glozman, Netta Barak-Corren, and Ilan Yaniv, "False Negotiation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Not Reaching an Agreement," pp. 671-697.
6. Timothy M. Peterson, "Insiders versus Outsider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Trade Distortions,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pp. 698-727.

***World Politics, Vol. 67, No. 2***

1. Torben Iversen and David Soskice, "Democratic Limits to Redistribution: Inclusionary versus Exclusionary Coalition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pp. 185-225.
2. Paasha Mahdavi, "Explaining the Oil Advantage: Effects of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on Incumbent Reelection in Iran," pp. 226-267.
3. Ryan Grauer, "Moderating Diffusion: Military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rman Doctrine in South America, 1885-1914," pp. 268-312.
4. Mircea Popa, "Elites and Corruption: A Theory of Endogenous Reform and a Test Using British Data," pp. 313-352.
5. Elizabeth Carlson, "Ethnic Voting and Accountability in Africa: A Choice Experiment in

Uganda,” pp. 353-38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2***

1. Pouliot, Vincent; Therien, Jean-Philippe,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211-237.
2. Dunford, Robin, “Human rights and collective emancipation: The politics of food sovereignty,” pp. 239-261.
3. Hansen, Lene, “How images make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cons and the case of Abu Ghraib,” pp. 263-288.
4. Trubowitz, Peter; Harris, Peter, “When states appease: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pp. 289-311.
5. Oren, Ido; Solomen, Ty, “Wmd, Wmd, Wmd: Securitisation through ritualised incantation of ambiguous phrases,” pp. 313-336.
6. Bower, Adam, “Arguing with law: strategic legal argumentation, US diplomacy, and debates ove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p. 337-360.
7. Park-Kang, Sungju, “Fictional IR and imagination: Advancing narrative approaches,” pp. 361-381.
8. Muzaka, Valbona; Bishop, Matthew Louis, “Doha stalemate: The end of trade multilateralism?” pp. 383-406.
9. Riggiozzi, PAA, “Regionalism, activism, and rights: New opportunities for health diplomacy in South America,” pp. 407-42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4***

1. Michael Beckley,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 Defense Pacts,” pp. 7-48.
2. Charles L. Glaser,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pp. 49-90.
3. Gene Gerzhoy, “Alliance Coercion and Nuclear Restraint: How the United States Thwarted West Germany’s Nuclear Ambitions,” pp. 91-129.
4. Galen Jackson, “The Showdown That Wasn’t: U.S.-Israeli Relations and American Domestic Politics, 1973–75,” pp. 130-169.
5. Arman Grigoryan, “Concessions or Coercion? How Governments Respond to Restive Ethnic Minorities,” pp. 170-207.
6. Jack S. Levy, Jack Snyder, “Correspondence: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or Not?’” pp. 208-217.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2, No. 2***

1. Eleni Tsingou, "Club governance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financial rules," pp. 225-256.
2. Photis Lysandrou & Anastasia Nesvetailova, "The role of shadow banking entities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a disaggregated view," pp. 257-279.
3. Lucy M. Goodhart, "Brave New World?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pp. 280-310.
4. Kristen Hopewell, "Different paths to power: The rise of Brazil, India and China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p. 311-338.
5. Cameron G. Thies, "The declining exceptionalism of agriculture: identifying th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f agricultural trade protectionism," pp. 339-359.
6. Yang Jiang, "Vulgarisation of Keynesianism in China'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p. 360-390.
7. Helen Callaghan, "Something left to lose? Network preservation as a motive for protectionist responses to foreign takeovers," pp. 391-418.
8. Kendra E Dupuy, James Ron & Aseem Prakash, "Who survived? Ethiopia's regulatory crackdown on foreign-funded NGOs," pp. 419-456.

#### ***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1***

1. Randall L. Schweller, "Statement from the New Editor-in-Chief," pp. 1-4.
2. Stacie E. Goddard & Ronald R. Krebs, "Rhetoric, Legitimation, and Grand Strategy," pp. 5-36.
3. Vibeke Schou Tjalve & Michael C. Williams, "Reviving the Rhetoric of Realism: Politics and Responsibility in Grand Strategy," pp. 37-60.
4. Jennifer Mitzen, "Illusion or Intention? Talking Grand Strategy into Existence," pp. 61-94.
5. Stacie E. Goddard, "The Rhetoric of Appeasement: Hitler's Legitimation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38-39," pp. 95-130.
6. Ronald R. Krebs, "Tell Me a Story: FDR,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p. 131-170.
7. Jack Snyder, "Dueling Security Stories: Wilson and Lodge Talk Strategy," pp. 171-197.

####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8, No. 2***

1. Brantly Womack, "Editor's Choice: China and the Future Status Quo," pp. 115-137.
2. Timo Kivimäki, "Finlandization and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pp. 139-166.
3. Zhao Kejin, "The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p. 167-196.
4. Feng Zhang, "Confucian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pp. 197-218.

[整理: 郭 超、许译丹、杨至远]

[责任编辑: 杨至远]





及在什么样的时期内才能转变为海外影响力等经典命题。如今,中国正处在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如何利用政府力量促进国家发展,如何应对西方国家及周边国家的猜忌和阻挠,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权力到财富》对中国的兴起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李元婧** (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一转眼我已经大三了,《新视界》也陪伴我走过南开的三载春秋。《新视界》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的原则,已经走过了五年。书中既有“他山之石”、“学术论文”等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也有“海外国关人”、“英采飞扬”、“读编往来”等活泼的栏目,可以满足各个年级的不同需求。我大二最喜欢的栏目是“国关人物”,它不仅介绍了当代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简明扼要地对他们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即便是初学者也能有对他们有一个宏观的认识;现在我更倾向于《他山之石》,它选取了国外比较新颖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明年我可能就离开南开园了,但是衷心希望《新视界》越办越好,为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李冰莹** (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新视界》是我所学专业的系刊,通过阅读本刊物,我不仅能够及时了解最近时事政治,对国际政治动向保持一定的敏感性,而且可以领略本专业教师与其他相关专家对于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深入解读,可谓是我的良师益友。本期《新视界》中,我特

别阅读了《2015: 普京的日程》一文,使得我对于俄罗斯局势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希望贵刊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刊发相关主题的高水平文章。

**热心读者:** 我是政治学大类的大一新生,在政治学分专业的时候,我十分坚定地写下了“国际政治”四个大字。而最初吸引我进入国际政治领域的就是《新视界》。我清楚地记得,2014 年秋季刊,学长学姐们在迎新特辑中分享经验、畅谈体会,展现了国政人的风采,让我对以后的大学生活更加期待,面对未来前行的方向也有所准备,愈加坚定。同时,系刊上推荐了许多入门书目和访问网站,这都在学习方向上给予我引导,帮助我了解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通过阅读经典开阔视野,也避免了一些繁琐低效的读书学习。很开心在我大学伊始认识了《新视界》,很开心我选择国际政治。祝《新视界》蒸蒸日上!

**热心读者:** 作为一名大二并即将步入大三的学生,《新视界》已经陪我在国关这条路上走过两年了。说实话,当初国际政治专业并不是我的心仪专业,但是随着不断深入的学习,我发现国际政治也是特别有趣的,在这也特别感谢《新视界》的帮助。每期《新视界》都为我们提供内容丰富又高质量的国关知识,特别是《新书架》会为我们提供近年新颖又高质量的书籍,为我们增加课外阅读提供很多资料。谢谢《新视界》每位成员的努力,希望《新视界》能够越来越好。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 一、总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 二、中文注释

####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1 页。

2. 编著: 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68 页。

3. 译著: 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 在文献名之后, 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 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 如为三人以上, 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9 页。

####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著者, 文章题目(加书名号), 文集编者名称,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 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9-117 页。

##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 109-117 页。

##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 年 6 月 15-17 日,第 3 页。

##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 年 4 月,第 55 页。

### (三) 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3 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 2006 年 2 月 12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 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60 页。

##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 (二) 转引

####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4 日）。

##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 （二）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可参照相应文献的公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并请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